

第二批陕西省一流本科课程（线下课程）

附件材料——课程教案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专业类代码：0305

课程负责人：李飒飒

联系电话：13379393955

申报学校：榆林学院

填表日期：2021年5月20日

推荐单位：榆林学院



李飒飒

导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旨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来说，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因此，它也要讲历史。历史是一门非常美的学科，它的美有两种，大美和小美。大美体现在它跨越时空、揭示规律、彰显格局。小美体现在它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多角度分析与评判，充满思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既然讲历史观，就不能太纠结于历史的细节，而应讲出大历史，更多的是对底层逻辑和历史规律的总结，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围绕这一宗旨，结合日常教学，总结了一种教学模式——总分总问题链教学模式。总分总是阅读和写作过程中解析文章的一种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是先抛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再分层叙述，逐层深入，最后对文章加以总结。总分总也是人们最惯用的思维方式，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分总的结构方式可以有效把握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和规律。

总分总问题链教学模式以总分总结构方式为主线，借助“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问题链，将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有效整合。“为什么”是“总”，“是什么”是“分”，“怎么办”是“总”。总分总问题链教学模式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课程的专题与专题之间按照总分总问题链模式进行设计。第二个层面是每个专题里都是按照总分总的问题链模式进行设计。第三个层面是教学的组织与考核依然是按照总分总的问题链模式展开。实施过程中，教师负责两端，把握总的方向，也就是两个“总”即“为什么、怎么办”，学生负责中间端，也就是“分”即“是什么”。具体教学环节，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教师主要负责整体教学的组织和考核；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学习，完成知识层面的学习和平时成绩的形成；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完成查缺补漏、答疑解惑，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辅之以线上线下讨论，“历史情景剧”手机微视频创作与推广，经典文献的阅读与评比等方式，学生深度参与教学的整个环节，合力完成课程的教与学。

目录

1 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1
1.1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	1
1.1.1 课程性质	1
1.1.2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1
1.1.3 课程宗旨	1
1.1.4 课堂讨论	1
1.2 这门课主要讲什么？	2
1.2.1 课程简介	2
1.2.2 课程理论框架	2
1.2.3 教材结构	3
1.2.4 推荐书单	3
1.3 如何运用这门课所学知识？	4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提出的？	6
2.1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6
2.1.1 课堂讨论	6
2.1.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	6
2.1.3 世界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7
2.1.4 中国历史的演进形态	7
2.1.5 课堂讨论	7
2.1.6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8
2.1.7 多元思维能力的构建造就了清朝的兴起	8
2.1.8 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同时遇上西方崛起的挑战	9
2.1.9 案例分析	9
2.2 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会战败？	10
2.2.1 案例分析	10
2.2.2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	10
2.2.3 鸦片战争战败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2
2.2.4 如何规避清朝衰落的历史重演	13
2.3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盘是什么？	14
2.3.1 社会性质	14
2.3.2 历史任务	14
2.3.3 主要矛盾	15

2.3.4 实现方式	15
3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什么没有成功?	16
3.1 近代中国的演进轨迹是什么样的?	16
3.1.1 近代中国的开端	16
3.1.2 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16
3.1.3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6
3.1.4 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17
3.1.5 民国的初建	17
3.1.6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7
3.1.7.内战与危机	17
3.1.8 全面抗日	18
3.1.9 中国命运的决战	18
3.2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有哪些?	18
3.2.1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18
3.2.2 洋务运动的兴衰	19
3.2.3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20
3.3 改良的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	21
3.3.1 案例分析	21
3.3.2 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明治维新	21
3.3.3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戊戌变法	23
3.3.4 戊戌变法采取了哪些措施	23
3.3.5 戊戌变法的举措是否有效	24
3.3.6 变法为何会失败	24
4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既成功了又失败了?	26
4.1 中国人民为什么走上了革命之路?	26
4.1.1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26
4.1.2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27
4.1.3 革命能被“制造”出来吗	30
4.2 孙中山是如何进行革命的?	30
4.2.1 革命派怎么看待中国的形势	30
4.2.2 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之路	31
4.2.3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如何被推翻的	32
4.2.4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有哪些设想	33
4.3 从《临时约法》回望辛亥革命是如何失败的?	34

4.3.1 《临时约法》的诞生	35
4.3.2 宋教仁在《临时约法》中的伏笔	35
4.3.3 袁世凯假受《临时约法》	36
4.3.4 《临时约法》的陨落，军阀混战的开始	36
5 为什么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8
5.1 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开展的？	38
5.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38
5.1.2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40
5.1.3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40
5.2 五四运动何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	41
5.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42
5.2.2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43
5.2.3 五四运动的爆发	43
5.2.4 一场“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	44
5.2.5 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演进轨迹	45
5.3 历史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46
5.3.1 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	46
5.3.2 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	47
6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48
6.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何特别之处？	48
6.1.1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	48
6.1.2 澎湃的思潮	48
6.1.3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48
6.1.4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展现出的特色	49
6.2 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50
6.2.1 国共为何会有第一次合作	50
6.2.2 国共第一次合作带来了什么	51
6.2.3 为什么会发生大革命	52
6.2.4 大革命的风起云涌	53
6.2.5 蒋介石的反共政变	54
6.3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54
6.3.1 一味地妥协退让，大革命失败	55
6.3.2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5
6.3.3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56

7 中国革命新道路是怎样探索和开辟的？	57
7.1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及其统治实质？	57
7.1.1 国民党如何在全国建立的统治	57
7.1.2 如何评价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年民国	58
7.2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为何如此曲折？	58
7.2.1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58
7.2.2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58
7.2.3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59
7.2.4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61
7.2.5 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62
7.2.6 红军长征的胜利	62
7.2.7 毛泽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62
7.2.8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63
7.3 中国革命为何选择了毛泽东思想？	63
7.3.1 早年毛泽东的内在品性	63
7.3.2 读有字之书读无字之书	64
7.3.3 案例分析	64
8 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66
8.1 为什么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	66
8.1.1 《菊与刀》中的日本	66
8.1.2 “焦虑症”患者日本	67
8.1.3 南柯一梦的大东亚主义	68
8.1.4 挑衅的关东军	68
8.2 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69
8.2.1 九一八事变	69
8.2.2 华北事变	70
8.2.3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70
8.2.4 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	71
8.2.5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72
8.3 西安事变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枢纽？	73
8.3.1 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73
8.3.2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74
9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77
9.1 为什么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77

9.1.1 正面战场的四个阶段	77
9.1.2 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	77
9.1.3 敌后战场发挥的作用	78
9.1.4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	79
9.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80
9.2.1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80
9.2.2 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持久战	81
9.2.3 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81
9.2.4 埃德加·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	82
9.3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为何影响深远?	83
9.3.1 抗日战争的胜利	83
9.3.2 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	83
9.3.3 民族自决的新高度	83
9.3.4 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	84
9.3.5 中国共产党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85
9.3.6 抗战胜利后的局势	86
10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8
10.1 从底层逻辑看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何不同?	88
10.1.1 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88
10.1.2 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政治困局	89
10.1.3 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普世格局	90
10.1.4 从两场货币战争看国共两党的对决	93
10.2 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失败?	94
10.2.1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	94
10.2.2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95
10.2.3 政府威信和民心的丧失	95
10.2.4 美国对民国政府援助的失败	95
10.2.5 徒有其表的军事力量	95
10.3 历史是怎样选择的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97
10.3.1 中间势力的建国方案	97
10.3.2 中间势力的分化和中间道路的破产	97
10.3.3 多党合作与各党派协商建国	98
11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00
11.1 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何只是一个过渡期?	100

11.1.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100
11.1.2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00
11.1.3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102
11.2	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的?	103
11.2.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	103
11.2.2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104
11.2.3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05
11.2.4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07
11.3	社会主义为何会从理想变为现实?	108
11.3.1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108
11.3.2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109
11.3.3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期待	109
11.3.4	“冷战”格局下国际环境的影响	110
12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探索中的曲折	112
12.1	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	112
12.1.1	探索中的理论认识	112
12.1.2	探索中的经济建设	113
12.1.3	探索中的社会文化建设	115
12.2	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哪些失误和曲折?	115
12.2.1	事与愿违的“大跃进”	116
12.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17
12.2.3	曲折和失误造成的原因	118
12.2.4	正确看待曲折和失误	119
12.3	正反两方面的探索带给我们哪些经验教训?	121
12.3.1	探索中的经验与教训	121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开辟并接续发展的	123
1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开创的?	123
13.1.1	真理标准大讨论	123
13.1.2	十一届三中全会	124
13.1.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5
13.2	为什么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	126
13.2.1	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	126
13.2.2	改革开放的关键招数	127
13.2.3	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	128

13.3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辩证统一的？	129
13.3.1 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129
13.3.2 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131
13.3.3 必然性与能动性的统一	133
14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革	136
14.1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136
14.1.1 中国梦的提出	136
14.1.2 中国制造 2025	137
14.1.3 四个全面	138
14.1.4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139
14.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40
14.2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	141
14.2.1 中美贸易摩擦	141
14.2.2 制造业的转移？	142
14.2.3 打造新的世界工厂	143
14.3 新时代青年如何担当大任？	145
14.3.1 谈爱国	145
14.3.2 谈使命	145
14.3.3 谈奋斗	146
14.3.4 谈学习	146
14.3.5 谈创新	147
15 为什么说疫情防控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49
15.1 疫情防控如何检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49
15.1.1 疫情检验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和救治能力	149
15.1.2 疫情检验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能力	150
15.1.3 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越性	152
15.2 加强党的领导为什么是打赢战“疫”的政治保证？	152
15.2.1 战“疫”当中的党的领导	152
15.2.2 加强党的领导的逻辑	153
15.3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如何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55
15.3.1 战“疫”中的依法防控	155
15.3.2 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	155
15.3.3 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	156

1 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1.1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

1.1.1 课程性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历史学科的专业课，它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揭示历史中蕴含的规律。

1.1.2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均开设，大学阶段更加注重学习的系统性，共开设 5 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课”；“形势与政策”。

1.1.3 课程宗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来说，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因此，它也要讲历史。历史是一门非常美的学科，它的美有两种，大美和小美。大美体现在它跨越时空、揭示规律、彰显格局。小美体现在它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多角度分析与评判，充满思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既然讲历史观，就不能太纠结于历史的细节，而应讲出大历史，更多的是对底层逻辑和历史规律的总结，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1.1.4 课堂讨论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更多的展望未来，为什么还要学历史？大家一般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经验，学好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展望未来，更好的发展。这个问题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对应了三个时间段。过去、当下、未来。“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当下，“我们应该更多的展望未来”对应的是未来，“为什么还要学历史？”对应的是过去。人们的回答多集中在了“过去”和“未来”，缺少了对“当下”的认识。

在你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要如何设定呢？这首先取决于你对自己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需要对自己的当下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只有搞清楚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明白自己是谁，

当下在哪里，然后才能知道你要到哪里去，该如何规划未来。所以，越是一个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就越是一个需要回顾过去的时代。历史真正的功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未来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一个愿意学习历史的人。因此只有学好历史，才能把握好这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1.2 这门课主要讲什么？

1.2.1 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一门研究自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的课程。1840—1949 是中国近代史，1949 至今是中国现代史。这个概念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指出了这门课的大，它讲的是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

1.2.2 课程理论框架

中国近现代史中，无数仁人志士不惜生命的探索与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它也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把它简称为中国梦。

目标是缺乏操作性的，必须对其进行分解才好实现。我们将其分解成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第一个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已基本实现，第二个历史任务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正在进行时，预计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前后基本实现。近现代史中，有很多阶层对中国的未来进行过早期探索，但大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没有将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搞清楚。实质上，这两大历史任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联系在于二者相互促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有助于更好的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助于更好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但二者又相互区别，区别在于，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是有先后顺序的，必须得先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倒过来就不行了。

任务不会自我驱动，它需要推动力，我们把它称之为动力。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对，矛盾。社会历史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我们经常提的矛盾还有主要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进入新时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动力，那么，社会历史领域基本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呢。在阶级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有三种：阶级斗争、革命、改革。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改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革命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三种方式都有，但革命的方式更加突出，体现为一场革命史。根据革命的阶段、性质、目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段：1840—1919 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 至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为了好理解，我们也可以将前两段革命概括为流血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可以概括为流汗的革命。过去，前辈们为了下一代人的生存流血牺牲，今天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汗水，换来自己和下一代人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阶级斗争、革命、改革还需要具体的人来做，谁来做呢，它的主体是谁，对，人民群众。我们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杰出人物要发挥作用必须得依靠人民群众。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理论框架，也是我们的底层逻辑和规律性体现，我们讲的是唯物史观。同学们应该牢记这个理论框架，今后的课程就是对这个理论框架的展开与填充。

1.2.3 教材结构

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教育部指定的教材，2018 年的版本，与上一版相比修订较多，新增内容较多，主要反映在“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内容。总体框架变化不大，依然按照上、中、下三个篇章来编排，上篇讲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篇讲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边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总共 11 章的内容。授课不是按照教材的章节来设置的，而是按照专题来设置的。专题设置的方式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共计 15 个专题。

1.2.4 推荐书单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中共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谈到了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思想观念方面的新陈代谢、政治结构层面的新陈代谢。通过这三个层面新陈代谢的分析，作者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近代历史中找到了几条宝贵的历史经验。

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人口迅速地增加，不仅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了市场，提供了经营主体商人阶层，而且剩余人口流向海外，

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这一切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

思想观念方面的新陈代谢：中体西用的提出，没有真正把儒家学说与西方文化完全隔绝起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借助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延伸，新的思想观念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逐渐取代传统儒学，影响越来越大。

政治结构层面的新陈代谢：君主制与科举制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共和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显现出积极效应，政治结构的变迁同样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作者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近代历史中找到了几条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改革也好，变革也罢，任何极端否定本土历史传统的变革，任何盲目学习外来先进经验的变革，都可能对自身产生伤害，都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是从相互隔绝走向相互交流往来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试图封闭自己，而不是顺应各民族相互沟通往来的决策，都可能让自己失去发展的机遇和活力。但是，由于文化历史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必然要面对本土传统和外来经验之间差异悬殊的问题。日新月异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只有在本土传统和外来经验之间找到平衡并达成共识，才能在相互交流与沟通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历史进程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按照人的意志向前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时候确实是主宰者，驾驭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是臣服者，因为在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中，仍旧有很多人无法驾驭和控制的因素。即使是人类改造自然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和研究尚未知晓和无能为力的事情。人类必然要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把人的主观意志和自然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结合，去迎接未来世界。

最后，历史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所谓时代性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今天的人看待历史应该报以理解同情的态度，而不应该报以苛求前人，苛求历史的态度。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理解同情前提下的历史研究更能够客观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更能够在探索中少走弯路。

1.3 如何运用这门课所学知识？

为了更好的理解课程理论框架，尝试用它去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内在逻辑。首先我们从目标谈起，清朝后期正是因为迷失了方向，

没有新的目标驱动它继续向前发展，最后逐步沦为了两半社会的境地。因此，国家必须要有目标。一个好的目标往往来自对自己当下的准确定位，新中国是如何给自己定的位，那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开国元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做过大量的论述。大家比较熟悉的的就是他的“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这种提法也就标志着中国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不再依附于任何大国而存在，而且有了新的使命，就是要带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共同富裕。这样的定位也就决定了我们会制定什么样的目标，发展什么样的朋友圈。“三个世界”的理论到今天都有借鉴意义。

在此基础上，中国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大势，顺应了这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在 1978 年前后，工业革命出现了新一轮的变革，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这就需要将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外包，中国通过构建完善的供应链网络，承载了这一任务，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发达国家购买我们的工业制成品，我们购买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唯一做法，因为万一发达国家内部出现问题，不买我们的工业制成品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那就是带领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当下大力在推动的事情。我们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和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初级产品，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工业制成品。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也只能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做到，其他国家给你机会也未必能做成，而且这个制造业中心一旦打造成功，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就很小。

世界工厂的地位，承载了中国梦，分担了历史任务，找准了基本矛盾，通过改革的方式，发挥了 14 多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

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过去，定位当下，规划未来。这门课是对历史底层逻辑和规律的归纳总结，根据唯物史观，我们构建了这门课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个理论框架分析了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内在逻辑。希望大家准确把握这门课的理论框架，在今后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下意识的思考一下能不能用我们构建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解释、处理问题，用的多了就会内化为你的一种思维能力。大学期间，每一门课的学习都应该抽象出这样一个模型，然后不断地去验证、调整、重构这个模型，最后你会掌握多种思维模型，当你要做出抉择时，你可以将自己掌握的多种思维模型一次次的去套用、拟合，总会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也就成为了一个拥有多元思维能力的人。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提出的？

2.1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2.1.1 课堂讨论

有很多同学问到，为什么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搞懂什么是近代，近代这个词传统中国已经存在，它主要是指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历史时期，不过传统中国很少用古代、近代这样的词语来表征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会用朝代来划分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那么为何今天突然开始习惯用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来称呼特定的历史时期呢。这说明今天的我们口中所谈到的近代肯定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时间远近的表述，他有了更多新的含义。其实，今天所谈到的近代，它更多的暗示了一种西方本位主义下的话语体系，这里的近代泛指的是西方自 1640 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之后的历史，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时期，主要指资本主义时期。因为今天的世界依然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因此各国也不自觉的会用到西方世界的评价标准，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那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它必然不是中国自然而然从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它是传统中国在强力的驱使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的条件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附庸的这样一种畸形的历史时期，而且这种状态不可能自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做出改变它将成为一种稳态，因为这种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我们只能被动忍受。这就是中国的近代。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能长时间忍受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因为这种状态无时无刻都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从被欺负的那天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英勇反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为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这才换来了今天的新中国。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因此，我们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1.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

我们谈到的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不是广义上的世界，而是指对我们有极大影响的世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主要指的就是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早已有之，我们与它的接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因为时代限制，近代以来我们对它内部发

生的变化没有敏感的捕捉到，认识有所不足，进而造成了与世界的脱轨。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崛起。西方世界发祥于古希腊，14—16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之前有一段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时期。

16—18世纪，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标志着西方世界步入了近代。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席卷了欧美各国，极大的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在蒸汽机的驱动下，为了追逐无尽的财富，全球范围内开辟殖民地，扩大原料产地，拓展产品市场。19世纪末，西方世界进入寡头垄断时期，就是我们俗称的帝国主义时期，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大打出手，带来了整个世界的动荡。

2.1.3 世界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对其他非西方世界来说就是一场灾难。非洲是新航路开辟后的第一个受害者，非洲人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拉美国家在独立运动后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差，被迫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候，除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非洲腹地没有被西方世界看在眼里外，只剩下中华帝国这块肥肉还没有被染指。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西方世界。

2.1.4 中国历史的演进形态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首先请大家观看一段5分钟左右的短片，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看完短片我们来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形态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中国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上古时代，贵族时代，儒官时代，以及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上古时代更多都是一些神话传说，我们不多细谈。贵族时代主要指的是夏商周这个时期，血缘和礼是这个时代最为推崇的。儒官时代我们再熟悉不过，就是儒生士大夫那个时期，也就是封建帝制时期，儒家思想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支柱。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难用与其他三个时代相类似的评价标准来判定，或者说今天这个时期还没有太明显的特征，或者说这些特征还不够稳固，所以我们用问号来代替。那么，这四个时代又是怎么转变而来的，我们说靠的是期间的三次巨变，仰韶到龙山，战国到秦汉，清末到今天。这三次巨变的时间跨度也是比较大的，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清末到今天的这次巨变并没有结束，到底变到哪里去，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它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2.1.5 课堂讨论

谈到了清末到今天的这段历史，我们回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这一主题。鸦片战争前我们创造了中国封建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一蹶不振，进入了清末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巨变时期。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就绕不开了，清朝前期开疆拓土、励精图治，开创了康雍乾盛世，为何后期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对应着两个时间段，前期、后期。“清朝前期开疆拓土、励精图治，开创了康雍乾盛世”对应的是前期。“为何后期却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对应的是后期。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关注清朝后期存在的问题，却忽略了对前期的关注。不过，要理解清朝后期为何会衰败，不理解清朝前期为何会兴起怎么能行呢？清朝在前期能够兴起一定有它的缘由，一定有它的智慧所在，找着了这些，后期衰落的逻辑可能也就清楚了，要么是它丢掉了前人的智慧，要么是遇到了新的问题与挑战，要么是这些问题都存在。因此我们先来分析清朝为何会兴起这个问题。

2.1.6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一个基本的回答是：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清朝全盛时期疆域面积达到 1300 多万平方公里，与清朝接壤的所有国家（俄国除外）均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全盛时期清朝的经济总量能够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清朝后期人口达到 4 亿多。因此，我们说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国家收入主要来自地税、丁税；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政府力量特别强，对皇帝要求高；社会上，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社会分层比较严重；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清朝反对心学注重考证。这几个方面的特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清朝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这些特征才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不过，这个回答更像是结果，不像是原因，我们更关注的是清朝是怎样将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特征有效整合在一起的。

2.1.7 多元思维能力的构建造就了清朝的兴起

这是一张清乾隆时期的疆域图。我们知道，满洲人发端于东北，入关之后带来了东北和内蒙古的庞大领土。东北就不说，为什么还会有内蒙古呢，说明在入关之前满洲人已经征服了内蒙古，满洲人为什么可以征服蒙古人，这和它拥有的政治智慧有关。东北地区连接着草原和中原，因此满洲人也就培养了一种二元思维能力，既了解草原，也了解中原。只要拥有了草原骑兵，就能够控制中原，只要拥有了中原，就能用中原的财力统御草原的军事贵族。既能打，又能守，因此它可以统一长城南北。

后来，它将这套二元思维能力进行了升级，建立起了多元思维能力。先是打败了郑成功家族，收复了台湾，接着是打败了准格尔，将外蒙古纳入大清，接着再次打败了准格尔，把雪域高原纳入版图，再后来灭亡了准格尔，收复了西域，定名新疆。至此，清朝统一了中国，清朝的皇帝既是中原人的皇帝，又是蒙古人的大汗，它还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这个时候，皇帝就带有一种天下共主的身份了。因此，这种多元思维的政治智慧，就将汉满蒙回藏各个亚区域整合进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体系当中，进而造就了康雍乾盛世。那后来为什么会衰落呢？

2.1.8 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同时遇上西方崛起的挑战

我们把清朝兴起的原因做一个延伸，答案就出来了，总结为一句话：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遇上了西方的挑战。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主要是因为帝国的统治边界已经到了上限，很难再有新的发展动力，各种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和平已久，统治阶层已经很难再次掌握开疆拓土时期的政治智慧，多元思维能力自然要逐步衰减，直至丧失。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使得清朝整合中国封建社会的能力下降。

满汉钳制的制度设计带来了行政的无能，到最后没人敢主动作为了。官僚机构的臃肿带来了腐败的普遍，以和珅为代表。现代财政避险机制的缺乏带来了财政的窘迫，历史上中央政府往往是因为资金链的断裂引起了地方的挑战。尚武精神的丧失带来了满人和旗人的堕落，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已捉襟见肘，抵御外来侵略就更显无力。缺乏弹性的税收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人口达到了4亿。明朝是2亿，以前的王朝最多是1亿，4亿人前所未有。这就造成了但凡要出现替代劳动力的新技术，都会被人口所替代。文字狱的盛行使得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士大夫阶层丢掉了批判精神。

这些要素共同造就清朝处于一种自我锁死状态，靠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自救。同时也说明封建制度已经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严重阻碍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兴起。因此清朝没法逃脱历史周期律，而这个时候偏偏又遇上了西方的挑战。

2.1.9 案例分析

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在近代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剧烈的碰撞。在鸦片战争之前，这种碰撞已经悄然发生。我们来看一个案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礼仪之争。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强国，靠着武力和生产能力，大肆扩张海外市场，中国市场也必将成为囊中之物。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对全球贸易没有兴趣，从全国的通商口岸只有广州一处就能看出端倪。为了能够打开中国的通商之路，英国人也是煞

费苦心。

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来华，这一年乾隆满80岁，借着给乾隆贺寿的理由，使团希望完成全面通商的目的。乾隆帝自然是很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仪。但是马戛尔尼是不会答应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英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强国，而外交礼仪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场合，英国人不可能让步。不过为了完成使命，马戛尔尼也做出了让步，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国女王行跪拜礼，或者是中国的官员必须向他所带来的英国女王的画像行跪拜礼。那个时候接待英国使团的中国官员正是军机大臣和珅，这种有损中国形象的事情他是不可能接受的，马戛尔尼也就拒绝了行跪拜礼。接见了马戛尔尼使团之后，乾隆很不高兴，让他们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这次英国和平的交涉基本上是完全的失败。后来英国又派过一次使团来华，其目的和这次大致相同。但那个时候的皇帝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又是一次失败的外交。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道路走不通，但是钱还是得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鸦片走私贸易和蓄谋已久的两次鸦片战争。我们可以通过这两次的外交失败以及之后的鸦片战争总结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与英国之间关系的转变。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2.2 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会战败？

2.2.1 案例分析

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大家都比较清楚，英国商人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只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英国希望全面打开中国的市场，为其廉价的工业产品寻找出路，以赚取更多的利益。就当时的历史细节来看，不管是放在今天还是回到当时，面对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严厉的收缴措施是政治正确的举措。清政府能够委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鸦片走私贸易也正说明，面对英国的挑衅行为，清政府在当时作了政治正确的事情，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但是，在国际丛林法则之下，政治正确的未必就一定会带来正义的对待，即使是放在今天。鸦片战争的过程一波三折，最终以清政府惨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结束。

2.2.2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

分析一下清朝为何会战败，按理说仅从硬实力考量，清朝并不处于绝对劣势，

有些方面还处于优势，怎么会说败就败了呢。接下来我们简要分析一下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有哪些。

从政治方面来讲，虽然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民朴素的爱国情怀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但其实，相较于现代国家，传统中国，大家对国家的认同普遍是较差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强的国家概念、民族概念，没有主人翁意识。这个国家唯一需要对其负责任的人是皇帝，如果皇帝没当好，那国家的命运就岌岌可危。这场战争开打两年了，道光皇帝突然问大臣们，英国在哪里。皇帝的世界观都如此浅薄，可见当时的国人对英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仗还怎么打。反观英国，英国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组织方式就像公司一样，每一位英国人都是公司的股东，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出资，盈亏自负。这样英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是极其高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钱袋子。在战争开打之前，英国对中国做过系统的考察和战争准备，做到了起码的知己知彼。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以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政府的财政来源比较单一，再加上连年镇压农民起义，财政亏空及其严重，很难应付一场全新的战争。反观英国，英国是贸易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多样，财政运行机制高效，基本能够做到将钱用在刀刃上，而且这场战争是英国首先开打的，它的战争动员与组织都在中国之前。

不管是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清政府在这场战争开打之前都处于劣势，但战争的输赢在战场上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输赢是打出来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军事方面的对比。

武器装备方面，清军虽然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不是绝对的劣势，只是相对而言的劣势，因为大家的武器装备都属于同一级别，没有差开代。具体来讲，清军的战船小，质量差，无力出海迎战。清军的火炮质量低劣，实战中没有优势。清军的枪支与英军有差距，局部战场士兵配发的还是刀矛弓箭。

军人素质方面，清军的将领往往不是全才，这跟传统中国不重视武将的作用有关，士兵的素质就更加堪忧，很多人把当兵看作是一份稳定的工资，能不出力就不出力，老百姓对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反观英军，已经建立专门培养军官的学校，军官的能力比较全面，士兵也是专门培养出来的，除了理论素养较高外，单兵作战能力不输清军。

最后，我们来看双方的军队数量。军队数量上是清军唯一占优势的地方。但是中国国土面积大，交通运输能力差，很难高效的将士兵运到战场上，而且鸦片战争很多是海战，陆军发挥不出作用，即使是在陆战中我们也不占优势，经常是英军以多打少。

可见，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来看清朝是落败的。但这些都不是落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依然是制度层面的。我们主要从四个层面分析一下。第一层

面是决定性战斗，说白了就是强调摧毁和杀戮。中国的传统军事哲学，包括这个孙子，讲究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能通过政治外交或者威胁取胜，就别费事打仗。可西方这套是反过来，先把你打服了，打垮了，打的没还手之力再说。通过制造几场决战，严重杀伤对手，摧毁失败者的战争潜力。

第二个层面是技术与理性的回报，说白了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研制高科技武器，保证自己的技术优势，自己人没事儿，死的全是敌人。从历史上看，盔甲，马镫，火器这些战争史上的高科技，原产地都不是西方，但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在西方国家手里发扬光大。

第三个层面是资本主义化的杀戮。听起来很唬人，其实也很好理解，第一个就是注重金融，钱袋子永远比敌人厚。第二个就是抢，以战养战。纵观一部西方军事史，主动打出去的多，被动防御的少，打完了，就要掠夺战利品，弥补这个战争开支，顺带大赚一笔。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从来不是文明的，是血腥的。

第四个层面是纪律。这个就不用多解释。军队打仗，组织纪律性很重要，对西方尤其重要，因为它人口相对少，每次和周边国家打仗，都是以寡敌众，所以更要强调这一点，少数人，捏成一个拳头，击败数量更多的敌人，才有胜算。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磨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比勇气，要靠谱，因为勇气这个东西不稳定，可组织纪律性，说白了是一种习惯，习惯养成了，哪怕身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这个士兵也会遵照命令，统一行动。

总而言之，从近代开始，西方的这种战争模式，跟药方一样，是药三分毒，现今的世界，各种战乱，动荡，十之八九，也是西方近代以来扩张霸权的结果，我们更多的是要加以反思和批判。

2.2.3 鸦片战争战败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政治方面我们不再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领事裁判权基本上是清政府拱手相让的。领事裁判权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到底应该遵循哪国法律，谁来惩处的问题，清政府为了撇清麻烦，主动把这种权利主动交给了外国人。这是清朝在不知道现代政治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之举。

经济方面在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下，中国再也不能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被迫流离失所，这为近代中国的动乱埋下了伏笔。中国也被迫沦为了半封建的国家，老百姓头上压的大山越来越多。

文化方面，儒家思想的正统性收到极大的冲击，中国人曾经共同的精神世界受到无情的践踏。今天我们再难有像传统中国那样比较稳固的价值观。虽然当下

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真要让每一位中国人打心眼里认同这种价值观，身体力行的去执行，任重道远。毕竟，一个精神世界已经被毁掉了，再想去建立一个，何其之难。

2.2.4 如何规避清朝衰落的历史重演

鸦片战争战败的原因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里，那么，如何才能规避清朝衰落，避免外敌入侵的历史重演。我们说，清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它用一种中国层面的普世价值，一种多元思维的方式整合起了汉满蒙回藏各个亚区域，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进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繁荣。繁荣之后天下太平了，不需要这种多元思维方式了，因此就逐步丢掉了前人这种多元思维的政治智慧，使得自己陷入了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进而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难逃衰落、外敌入侵、灭亡的命运。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世界秩序正在进行重构，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共同去面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应该使用多元思维的模式去思考问题，民族主义这些二战时期人类的智慧已经很难适用新的形势，解决新的问题，世界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思想来整合大家。

中国给了世界一种方案，称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的意思是指人类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再用传统零和博弈的方式构建世界秩序。如果依然按照旧有模式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永无休止。比方中美关系，一个是超级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秩序，于是很多人预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它的根据来源于人类的历史，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有一战，还把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斯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家。但修昔底德可并没总结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它只是说雅典的权势不断增长，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使战争无法避免。结果后来被美国总结为修斯底德陷阱这套理论，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说明它还停留在冷战的思维当中，因此中国一定要警惕美国挖的这个陷阱。

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提倡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问题，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化解矛盾，共同向前发展。这就是一种多元思维的模式，而目前人类创造的最能代表这种多元思维模式，最能反映普世意义上的价值，并能够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效整合在一起的学说只剩“共产主义”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探索与实践。

因此，今天要规避清朝衰落、外敌入侵的历史重演，就要站在这样一个多元

思维的视角与高度看问题，用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去整合全世界的资源，进而定位好自己的存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多元思维能力的构建造就了清朝的兴起，进而使清朝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遇上了西方的挑战带来了清朝的衰落。只有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用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多元思维模式才能够规避清朝衰落的历史重演。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以这样一种多元思维模式看待这个世界，分析和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3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盘是什么？

2.3.1 社会性质

基本盘就是近代中国的大前提、大背景，一切努力必须得围绕它而展开，脱离了基本盘，近代中国是没有出路的。鸦片战争使清政府不再是独立的封建政权，处处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干涉，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反侵略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重重矛盾，使西方国家灭亡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本主义没能独立发展起来。这是近代中国半封建的性质。

我们要格外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也就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个性质，简称两半社会，对它的理解越深，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把握越发清晰。这就好比你对一个事物的定义理解的越深刻，对它的把握就越精准一样。

2.3.2 历史任务

中国近现代史中，无数仁人志士不惜生命的探索与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它也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把它简称为中国梦。目标是缺乏操作性的，必须对其进行分解才好实现。我们将其分解成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第一个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已基本实现，第二个历史任务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正在进行时，预计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前后基本实现。近现代史中，有很多阶层对中国的未来进行过早期探索，但大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没有将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搞清楚。实质上，这两大历史任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联系在于二者相互促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有助于更好的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助于更好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但二者又相互区别，区别在于，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是有先后

顺序的，必须得先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倒过来就不行了。

2.3.3 主要矛盾

任务不会自我驱动，它需要推动力，我们把它称之为动力。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对，矛盾。社会历史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我们经常提的矛盾还有主要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进入新时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3.4 实现方式

社会历史领域基本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呢。在阶级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有三种：阶级斗争、革命、改革。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改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革命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三种方式都有，但革命的方式更加突出，体现为一场革命史。根据革命的阶段、性质、目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段：1840—1919 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 至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为了好理解，我们也可以将前两段革命概括为流血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可以概括为流汗的革命。过去，前辈们为了下一代人的生存流血牺牲，今天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汗水，换来自己和下一代人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阶级斗争、革命、改革还需要具体的人来做，谁来做呢，它的主体是谁，对，人民群众。我们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杰出人物要发挥作用必须得依靠人民群众。

3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什么没有成功？

3.1 近代中国的演进轨迹是什么样的？

首先来看近代中国的演进轨迹是什么样的。近代中国指的是 1840—1949 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历史，谈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根据每个时期的历史特征以及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将近代中国划分为以下 9 个阶段。

3.1.1 近代中国的开端

从 1840 年起，止于 1864 年。这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遽变化做出初步反应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重大事件有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间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反映后一方面的，包括林则徐的销烟、魏源的《海国图志》著作和太平天国起义。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变化。

3.1.2 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起自 1865 年，止于 1895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步成型期，也是中国朝野酝酿变法和改良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主要史实是中国边疆危机和中法越南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后一方面的主要史实是洋务新政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教案频发，改良主义思想主张的提出和革命活动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沿海沿江某些城市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向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转变的现象。这个时期大约 30 年，除了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外，大体上是相对平静的时期。清政府高层腐朽，观念落后，失去了一次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的机遇。

3.1.3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起自 1895 年，止于 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主要史实是帝国主义抢占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及有关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反映后一方面的主要史实有知识分子上层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等下层社会义和团反帝运动。由于戊戌维新运动通过新闻媒体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广泛社会动员，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声有色的思想解放运动。

3.1.4 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起自 1901 年，止于 1912 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帝国主义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清政府企图自救而失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成长，其政治代表人物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谋求中国的新出路失败了，袁世凯取得政权，并在体制上部分回到清朝统治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中国青年大规模地赴日本留学，东京形成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群体，西方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留日学生大量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思想活跃。

3.1.5 民国的初建

起自 1912 年，止于 1923 年。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割据战争的大部分时期，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并转趋上升的时期。1915 年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称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也在这一年。护国运动发生，袁世凯死亡。由于此前清政府新政的鼓励，由于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对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鼓励，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暂时后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赢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继续增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最终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的基本标志。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都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帝国主义背景的军阀混战，则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的基本标志。

3.1.6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起自 1924 年，止于 1927 年，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到国民党“分共”、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发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国民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洋各派系的争权夺利以及旧军阀政府的垮台，明显地标志了中国社会的上升趋势。引导辛亥革命成功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的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合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内战，引起社会分化，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3.1.7.内战与危机

起自 1927 年，止于 1937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和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出现，是中国再次呈现两个政权对立的标志。这个时期，完成了北伐，发生了张学

良易帜，国民党政府谋求全国的统一和建设；大革命失败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打击，由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结果形成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出路的新探索，出现了中共早期斗争的曲折局面。在上个时期由旧的阶级矛盾掩盖着的新的阶级矛盾，在这个时期突出地展现开来。日本实施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打破了中国实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也改变了国共两党内战的局面，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治斗争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安事变是一个关键因素。

3.1.8 全面抗日

起自 1937 年，止于 1945 年。日本全面侵华，妄图独霸中国，使中国全部殖民地化，想做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内想做而未做到的事。在广大沦陷区，先后出现过三个代表日本侵华利益的伪政权：伪满、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但时代变化了，日本的侵略引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国共两党面对日寇侵略，共御外侮，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过十四年抗战，赢得了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它是标志中国社会向上发展趋势的典型事例。这一次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中国近代史的转折具有根本意义。

3.1.9 中国命运的决战

从抗战胜利到 1949 年 10 月。这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尊严，因此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到了起步条件。中国人把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时机到来了。

3.2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有哪些？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主要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通通都失败了，我们会重点分析戊戌变法。首先我们简单概述一下这三次早期探索。

3.2.1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大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从历史时代的特点来观察，它发生在中国因为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初步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它的矛头所向，虽然主要是从清朝皇帝到各级地主官僚，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而深入内地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完全是像陈胜、吴广以来的那样单纯的农民战争，当然它也不同于 1927 年以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太平天国为旗帜的这场农民战争迫使外国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明确了支持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方向；这场战争又迫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农民造反是“心腹之患”，外国侵略是“肢体之患”，从而调整了对待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之间的政策。因为这种大政策的调整，就影响到国内政治结构的转变，中央权力下移，汉人官员当权，正规军无能而湘军、淮军兴起。这些转变不仅直接影响了此后政局的发展，影响了中外关系发展的格局，也影响了此后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谈两点。第一，太平军一把手洪秀全没有军事才能，不掌握军权，二把手有军事才能，掌握军权，这样的结构非常的不稳定，这为后来的天京事变埋下了伏笔。第二，洪秀全禁止儒学让他得罪了清朝的全体知识分子，失去了大量潜在的中层官员，让各地乡绅对天国的抵抗更加强烈。常年无法振兴经济，让他失去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最后，他还失去了一个原本最有可能支持他的盟友：西方列强，也就是说洪秀全把该得罪的和不该得罪的群体都得罪了，孤立无援，最终导致失败。

3.2.2 洋务运动的兴衰

洋务新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地主阶级当权派切实体验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力，面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汹涌潮流而发起的，号称“自强新政”，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自救运动。洋务新政首先抓军用工业，造枪造炮，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保证政权稳定，随着农民起义的逐渐平复，当然也有保卫国防、对付外国侵略的动机。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原先设计的所谓“自强”，所谓的加强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均化为泡影。因此我们说洋务运动失败了。

洋务运动虽然是从清政府办军用工业开始的，但办军用工业还不能说是追求现代化，只有在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创办“求富”性质的民用工业后，才意味着清政府开始追求发展生产力，追求现代化。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引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阶级。与此相适应，一批西方社会科学书籍被翻译过来，一批洋务人才被培养出来。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或者认为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

洋务新政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把洋务新政的开展与稍晚些时候日本进行的明治维新相比较，这种局限性就更明显了。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不是由朝廷统一部署的在全国推行的运动，而是由部分中央的和地方的大臣经朝廷同意而推动的运动，守旧的、保守的、反对的势力很大，很普遍，难以取得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办企业模式，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面也起过

一定作用，但对民间企业的发展却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与日本明治政府主动提倡、推动民间企业的发展大不相同，因此成效差异很大。由地方督抚大员推动的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形成了相关地方权力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与军事权力相结合，为此后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速度，延缓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会。甲午战败表明，中国由地方官员推动的洋务新政大大落后于日本明治政府推动的改革、维新运动。而且洋务新政所涉及的“御外侮”的目标完全未能达到。中央政府不能主动转变观念和提出措施，是甲午战争前后 30 年间丧失许多发展机会的基本原因，也是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效果大相差异的基本原因，当然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的基本原因。

洋务活动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发动洋务活动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同统治阶级中的另一派顽固派一起，共同决定、执行着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国策。位居政权顶端，实行折中控制的是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是必要的，这种引进在客观上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缓慢演变，对于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引进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洋务派在办洋务企业时虽也有抵御外敌、收回权利等对外的动机和表态，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而且难免有掩饰之嫌。洋务派不可能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李鸿章只准自己办洋务，却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的侵略，他们并不想真正抵抗，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近代先进武器，形成不了保卫祖国的城墙。北洋舰队在当时不是武器装备落后，至少与日本海军相比，在某些方面还是先进的，但是为了“避战保船”，匍匐港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了日本的战利品。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精神状态不如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掌握国家权力的洋务派官僚们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卖给外国侵略者。所谓抵御外敌，就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外关系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相安无事”，中国正急速地面临殖民地化的深渊。

3.2.3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二

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

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他们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这也是一个幻想，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改革，一是担心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再起，二是担心列强侵略加剧。用什么办法预防？就是把皇帝捧出来，希望皇帝变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继续歌舞升平了。这样，维新派就把自己的维新事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全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维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业走向失败，是肯定的。但是他担心农民起义和列强侵略，却朦胧地意识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项历史任务，这是其聪明之处。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于，把预防的办法寄托于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错了。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3.3 改良的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

3.3.1 案例分析

关于戊戌变法，我相信很多同学对它一定会感到惋惜，好好的改良运动，为什么 103 天就戛然而止了。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首先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台湾作家李敖的作品，《北京法源寺》。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但书中的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小说的主题就是戊戌变法。李敖先生自己谈到：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来说，书中只有一个女性，而且还是个坏人，就是慈禧太后，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性，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并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北京法源寺》这部历史小说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

话剧导演田沁鑫根据李敖的同名小说创作了话剧《北京法源寺》，同样很精彩。在这里我给大家找来了这部话剧的一段节选视频，大概十分钟左右。通过观看，你可以深刻理解戊戌变法的时空背景。

3.3.2 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明治维新

要理解戊戌变法，日本明治维新是绕不开的，因为戊戌变法就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临被瓜分的威胁。国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小国竟然打败了曾经的天朝上国的事实，不得不去认真寻找背后的答案，答案正是近代日本开展的明治维新。因此，学习日本的经验就成为眼下最为现实的一条道路。那我们就要对比一下，这两场看上去很像的维新运动，结果为什么天壤之别。

首先我们来看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明治维新，其实跟中国的原因是一样的，内忧外患，不得不变。具体来看，那个时候的日本，封建制度出现了危机。新兴地主、农村商人和城市中的特权商人都在逐渐强大，但传统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却在走向没落。

新兴地主就是那些因农民没法过活，变卖土地给他们，进而新兴积累起大量土地财富的这一部分群体。但你要知道这些人虽然有了大量的土地，可能不能长久的占有这些土地还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农村商人是那些靠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发展起来这样一部分群体，他们同样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也是极力打压商业行为的。城市中的特权商人就是那些高利贷者，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和统治阶级保有一种暧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来就不是稳定的。这些新兴阶层非常希望通过国家的变革将自己积累的财富合法化了，他们有变革的经济动力。传统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却在走向没落，这句话怎么理解。

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农民阶级，这一群体从来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尤其到了王朝晚期。这里的统治阶级主要指的是军人阶层，那个时候的日本处于转型期，出现了很多的新兴阶层，这些人通过新的生产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唯独军人阶层没有。他们不允许参与任何新的财富创造活动，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军人阶层，只有一份死工资。别人都在涨工资，而这些人却一点都没有起色，心里当然不平衡。因此，作为传统统治阶级的军人阶层面对走向没落的命运，也极力想通过变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两拨人一拍即合，一拨人有钱，一拨人有枪。

外患同样是因为西方的扩张，同样是面临外来侵略，日本的反应和中国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我们也好理解，日本的体量以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中国不在同一层面，面对外来侵略中国可以选择无视，日本却只能选择主动门户开放，因为它没办法做到无视，无视意味着亡国灭种。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出身于下级武士阶层的一批爱国日本人意识到：为了应付民族危机，必须实行开国进取政策，并把外国势力驱逐出去。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又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为此，他们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日本进行了“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明治维新在开始之前，日本作了大量的准备，而这场准备不是简简单单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通过革命扫清了阻碍变革的

一切力量，助推了变法的顺利进行。而我们的戊戌变法自始至终都像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3.3.3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戊戌变法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戊戌变法，首先也是因为清王朝面临统治危机。这块内容上个专题我们已经展开分析过了，在这不做赘述。其次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到来。哪怕仅仅是为了保命，当然这个保命指的是不被农民阶级推翻，清政府也必须得进行改革。至于西方列强，这个时候大多官员知道自己与列强的差距所在，是不敢与其真正为敌的。即使是戊戌变法，真正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哪怕这个清政府成了洋人的附庸也无所谓。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国家走向衰败的时候往往没法做到力挽狂澜，相反会加速其灭亡。这个时候需要的往往是来自底层的，自下而上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又是以国家政治稳定为前提的，如果政治没法稳定，那自下而上的力量将会选择用暴力来取代政权，进而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扫清障碍。

3.3.4 戊戌变法采取了哪些措施

戊戌变法仅从发布的文件来看确实是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文件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政策指导。

政治方面提出开放言路；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任用新人；废除拖延的陋习，删改旧条例，另行制定新规则，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建设铁路；发展农工商；奖励发明；允许满人经商。教育方面提出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新式学堂，致力于中西学的研究。各省会的书院改为学院，府州县学改为中学堂，乡学改为小学堂；设立编译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附属医学堂；出版官办报纸；举行政治经济特科考试。军事方面提出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开支，裁减绿营，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射，改试枪炮。其他方面提出高级官员游历外国；改进和简化法规。

这些指导性的文件也就是在官僚系统里走了一遍，没人真正把它当回事过。为什么没有人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在看慈禧老佛爷的态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困难大得多，远不是日本可比的。中国是另外一套政治文明的发源地。自从汉武帝结合了儒家的思想和秦朝的官僚制，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构造，中国就发展出了一种“超稳定”的政治结构，两千年里，这套体制一直被中国人反复运用，还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大挑战。在这套自洽的系统内部，根本就没有位置留给康有为这种即大胆又急于求成的变革。

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变法没有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比如忽视了慈禧太后的

支持，以为有光绪皇帝支持就够了，这在政治上显然非常不成熟。同样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改革派对保守派官员打击面太大，而对像李鸿章这样的潜在的改革派也没积极争取，最后导致势单力孤，陷入被动。

改革的急于求成也必然带来考虑的不够充分，改革诏令倒是下了不少，但是效果很差。比如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改考策论，既没做好宣传，又没给学了大半辈子八股的旧文人做适当安排，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当然是阻力重重，很难成功。当改革推动不下去的时候，又想通过绑架光绪皇帝发动政变来夺取慈禧太后的权力，进而为变法铺平道路，最后反被慈禧太后倒打一耙，一击毙命。其实慈禧太后并不是不支持变法，可她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定，是否能够平衡官僚系统里的各种力量。

3.3.5 戊戌变法的举措是否有效

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废除了百日维新中所采取的很多改革措施，仅仅保留了一小部分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等方面不会触及其统治利益的措施。例如，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省会的学堂可以继续存在，地方和乡级的中小学也可以继续运作等。总体而言，戊戌变法中的举措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没有实现变法目的，因此我们说变法失败了。

3.3.6 变法为何会失败

最后，我们综述一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变法无外乎希望用新制度来替代旧制度。从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来看，要想取得变法的成功，首先，变法者要有一套革新的观念并对此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其次，变法者要将革新的观念转化为制度固定下来，这就要求变法者握有足够大的权力；最后，变法需要看准时机，即变法要得到社会大众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可，从而为变法提供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只有革新的观念而无法将其转化为制度，那么观念只能停留在脑袋里，只有转化成制度才能变成现实确定下来。在观念转化为制度的过程中，权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时机不对，就算有权力把观念转化为制度，这样的制度也无法深入人心，更无法稳定下来并持续下去。因此，观念、制度和时机三者缺一不可。明治维新成功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样面临着内部忧患和外来压力，日本能把握时机先进行政治上的变革，随后掌握实权推行经济上的改革，确立了一套技能巩固变法成果又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而中国先试图通过在经济、军事、技术方面效法西方来解决内外危机，在行不通时才转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无奈维新领导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有利的时机，观念无法转变为制度，最终导致变法夭折。清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本质性

的改变，最终清王朝弊病积重难返，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已经无法通过改良的方式得以摆脱，不得不走上革命的道路。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什么我们重点谈了戊戌变法，更多的是为了回应当下。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同样也是一次变法，因此，戊戌变法带给我们的教训一定要好好消化，这样才能更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4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既成功了又失败了？

4.1 中国人民为什么走上了革命之路？

4.1.1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被日本独占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形势，俄国、法国、德国等国看在眼里，急在行动上，共同发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着急要改变现状，就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提供了机会，结果仓促上马的维新变法以失败而告终。这个时候顽固守旧派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完成了顽固势力的总动员，这些人把持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面对被瓜分的危机蠢蠢欲动，四处寻找反扑的机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给了他们大展身手的机会。

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掠夺大清帝国之实，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首都北京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再次被西方列强攻破，被占领长达一年之久。联军烧杀抢掠，中国损失惨重。慈禧太后同光绪帝逃到了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联军占领北京和俄国在满洲的扩张使中国面临瓜分的威胁，并加剧了国际间的猜忌和竞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也卑微可悲地一落千丈，跌入谷底。《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它规定禁止进口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和其它的炮台，外国部队在公使馆区驻扎，给予列强在北京至内河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利，所有这些损害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并限制了中国主权的自由实施。《辛丑条约》还规定国内的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五年，以作为对士绅阶层的惩罚，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莫大干涉。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其 39 年中每年按 4% 的利息，总数达九亿八千多万两，超过原先数目的两倍以上。赔款必须以外币而不是用中国白银做出偿付，这招致每年在兑换上的几百万两的额外损失，特别是在银价大跌的年份中。例如，中国在 1903 年不得不支付 5350 万两，而不是原先一致同意的 4250 万两。北京的外国公使从此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外交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而清朝的威望跌入谷底。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虽不至于使中国经济瘫痪，但却抑制了它的增长。

在国际社会中，八国联军的残暴表现，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至高无上的形象，中国人的自豪和自尊被击得粉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由蔑视和敌对变成畏惧和奉承。为了苟延残喘，满族朝廷作了一些三心二意、肤浅的宪政改革。很

多汉人目睹了满族政权毫无希望的领导能力后，转向了革命，革命成了国家的唯一希望。孙中山提倡的、一直被有身分的中国人当成非法行动来回避的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个时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

4.1.2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对慈禧太后来说，义和团事件是一场痛苦的经历。她经常流泪，后悔地说：“没想到我会变成皇帝的笑柄！”。慈禧太后对政治的敏锐和精明的本能使她意识到，除非自己表露出某些后悔的样子和制定政治改革的措施，否则就难以重新得到外国的尊敬和国人的敬仰。1900年8月20日，当她还在逃亡的时候，慈禧太后屈尊发布了一道上谕，就中国的不幸而责备自己。朝廷在西安重建以后，她表示要实施一场由自己主导的改革。慈禧太后以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几乎雷同的改革。

这次改革持续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从1901年开始至1905年结束。这计划是掩饰她在义和团事件中耻辱角色的一次精明的尝试，其伪善泄露在这样的事实中：她一边公开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官员的建议，一边私下里暗示她对外国事物的深深厌恶。军机处因此机智地劝告官员们不要轻言采用西法。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做出了三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1、废除了科举考试，2、建立了现代学校，3、派送学生出国。

1905年，清朝的改革计划在日本于日俄战争中获得辉煌胜利之后，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大专制强国被东方的小君主立宪国打败，是立宪政体有效的证明。于是清政府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拉开了序幕。1908年8月27日，竟然颁布了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效果怎么样呢？非常不好。这个宪法，不但没实现国家富强，反而让清政府迅速崩溃了，3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也就彻底灭亡了。

为什么别的国家立宪，就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到了晚清，这事儿就行不通呢？答案就在宪法的名字里。我们来看这六个字：“钦定宪法大纲”，“钦定”，这说明立宪的主体是皇帝，是皇帝颁布的，那受益者肯定还是皇帝；再看“大纲”，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它还不是完整的宪法，只是一个还不完善的、原则性的、和宪法有关的文本。简单地说，这部宪法，有很严重的问题。其实，当时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宪政，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宪政，这个宪法，不是深思熟虑，而是个应激反应。

为什么要立宪呢？最直接的原因，还是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对中国人的触动很大。两个外国打仗，中国人一直专心在看。不仅朝廷在看，在野士绅，尤其是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在看。日本一胜利，他们就跑出来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中国要强大，非立宪不可。这

个结论，说的也没错，但一场战争的胜败，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整体战略、武器装备、军队士气，甚至地缘条件等等，但康梁偏偏不看这些客观的方面，把战争的结果强行归结到立宪层面，这就比较片面了。但在当时，他们在国内朝野上下，声望非常高，李鸿章生前，甚至在慈禧太后面前公开承认，自己赞同康有为的一些主张。慈禧也没有惩罚他。不过，尽管这属于强行解释，康梁毕竟也是一片好心，他们想推动的君主立宪，终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快要实现了。

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清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一些积淀的。5年前，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一路逃到西安，李鸿章去签了《辛丑条约》，这才恢复了和平。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官员呼吁，立宪才能救国。慈禧就派了30多岁的镇国公载泽到海外去看看，立宪立宪，到底怎么个立法。这个载泽到美国、欧洲和日本转了一圈，回来汇报说：立宪有两种，美国、法国那样的共和立宪，要废除皇权，肯定不行；君主立宪大方向可以，但是英国版的虚君立宪，把皇权架空了，也不行；再有就是德国和日本的实君立宪，有议会，但皇帝权力也很大，这个好。尤其是日本一衣带水、文化相近，应该学习日本。

但是载泽不知道，慈禧太后更不知道，日本的宪法，根本就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载泽在日本考察宪法，问的谁呢？伊藤博文。甲午战争里，伊藤博文是日本首相，签马关条约，也是他执笔，载泽肯定不喜欢他。但是谁让他主持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呢？载泽还是耐着性子好好问。但是他好好问，伊藤博文没好好答，他讲了一些，也保留了一些，而保留的才是根本。《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是一部“实君立宪”的宪法，皇帝有很大的权力，但国会也有专门的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也能约束皇权。可是伊藤博文给载泽讲课，专门挑巩固皇权的方面讲，限制皇权的方面，一句也不提。这就导致，载泽在筹划大清的宪法方案时，受到误导，他还以为有一种宪法范式是专门用来强化皇权的呢。伊藤博文这样做未必就是不怀好意，也可能是他的策略选择，专捡客人喜欢听的说，而让清政府接受立宪是他的目的。因为在当时，日本朝野有一个基本共识，日本有责任导引中国，向日本看齐，这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这当然也符合载泽和大清皇族的心思，也为他们在法理上壮了胆。但是在方向上，可以说伊藤博文指了一条错路，把晚清皇族给带偏了。

就这样，清朝从1905年开始考虑立宪问题，3年过去了，在大家的迫切期待中，靴子终于落了地：《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了。这个宪法其实是把那些本来就由皇帝享有的无限权力，写成了条文。它不是一个“国民权利宣言书”，反而是一个用宪法语言草草打扮了一番的，“皇帝权力宣言书”。然后清政府把它昭告天下，说这就是宪法。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只是顶着宪法的空壳子，里面还是皇权专制那一套。在宪法没出台之前，大家都怀着殷切的希望，结果一看正文，心全凉了，不但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把以前没挑明的事，一条一条地都给定了性。

这个定性，影响极坏，适得其反。立宪之前，保守派和改革派还能分庭抗礼，既然这个立宪强化了皇权，那改革派当然就是受伤害的一方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这些重要的军政大事的背后，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一群汉族官僚。他们建功立业，当然就有很高的声望。同时，在外国的冲击下，民间也有一批人积极应变，在商业、教育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再加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朝野那些同情维新派的人士，这一整个群体，是清朝最后 10 多年里，最积极推动变革的人。他们拥护现有体制，也呼唤改革。汉族官绅之前积累了力量，当然也就要求通过立宪，把这种力量兑换成政治权力。但是同样是要立宪，他们的期待值，和皇族是冲突的。他们想通过立宪，争夺更多的权力。能力大的当重臣，能力小的可以当个议员，而皇族呢，是要借立宪这么个机会，把权力夺过来。

从政治上看，这不是向前走，反而是往后退了。这说的是基本立场上的分歧，在实施层面上，矛盾只会更激烈。1905 年准备立宪之前，张之洞和袁世凯建议，取消科举，兴办新学，学校里主要教西方的知识。慈禧太后听从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科举是历代政府吸纳新生社会力量的机制，能够笼络知识分子、选拔政治人才。旧机制没了，应该有个新机制来替代它吧？当时的改革派精英，就寄希望于立宪。这样社会上的新生政治力量，就可以通过选举，进入到体制内部。

从这点上说，期待立宪，其实也是期待国家能有一个更大幅度、也更有效的政治吸纳机制。但这个宪法文件就明白昭告天下，废除科举以后，不但政治上不开放吸纳，还要变得更封闭。比方说，过去六部尚书的职位，满族和汉族官员人数基本是一样的，但《钦定宪法大纲》打着改革的旗号，建立了内阁，内阁成员一共 13 人，满族官员有 8 人，其中 5 人还是皇族。许多原来汉族官绅的官位，被收回去，重新分配给了年纪轻轻、手无寸功的满族贵族。

本来汉族官绅是拥护清朝改革，反对革命的，但这么一来，等于满清政府主动和他们划清了界限。3 年后，武昌起义一爆发，把持地方都督巡抚位置的汉族官员们纷纷宣布独立，立宪的时候排挤汉族官绅，真到了要紧关头，昨天的朋友就变成了今天的敌人。事实上，但凡涉及到核心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主持者对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对改革的目标、路径和手段有精心的设计，对政治资源有严格的掌控，还要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心里有数。

再看晚清这场以立宪为名的体制改革，主持者始终懵懵懂懂，对于什么是立宪、立宪的后果、怎么安置各方力量，都一无所知。爱新觉罗家族在打进山海关的时候，能够认真听取汉人的建议，改革不恰当的政治和军事措施，一下子就坐稳了江山。可是他们的子孙，政治素养堕落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次立宪，本来是清政府保全自身的最后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就在一片私心和无知中被轻易错过了。名为立宪，其实上南辕北辙，把政治开放搞成了政治封闭，甚至政治排

挤，这就是自掘坟墓了。

4.1.3 革命能被“制造”出来吗

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的分析，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某些激进分子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具有广泛的历史必然性。历史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革命往往是由当权者的种种极端行为所引发和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几乎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如在承平年代、清明社会，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对于民众的影响是有限的，更掀不起导致动荡社会的风浪。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通过变革来缓解危机、缓解矛盾，则潜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飓风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由此可见，革命不是人为的，更不是主观上想革命就能革命，革命的发生绝对不是几个革命家振臂一呼制造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就是说，革命是形势逼出来的，是大势所趋。

4.2 孙中山是如何进行革命的？

4.2.1 革命派怎么看待中国的形势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历史主要是连续不断的国耻纪录：从 1842 年《南京条约》至 1901 年《辛丑条约》的一长串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朝贡国的丧失，以及清政府的内政欠缺生机，都证实它完全无能力在现代世界中保护中国的荣耀。以前所引以为豪的天朝上国如今沦为两半社会，1644 年作为征服者进入华夏的满人在公众面前丢尽脸面。当朝廷在求生的绝望挣扎中，以改革与立宪之借口制造排汉的政策时，它的丧钟便已敲响了。在王朝的急剧衰败中，这种公然的歧视政策加剧了被统治者的反抗。

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中，反满情绪自始至终从未消失，清初汉人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反复不停地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活动并未导致异族统治的立即覆灭，但革命的萌芽却在地下组织与秘密会社中保持着活力。各种由明朝遗民发动的运动、三藩之乱、天地会的活动、白莲教叛乱，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都表现了无休止的民族或种族反抗趋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

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均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独立、人权、平等、自由等观念风靡于中国青年的思想中。而且，意大利与德意志在 1870 年民族统一的成功，也为前

瞻的中国人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推动他们采取相类似的行动。此时，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了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力。

孙中山认为，封建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年，而政府的本质却没有改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孙中山注意到，中国历史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紧随每一个混乱时期之后的是众多王位争夺者漫长而又无情的争斗，直到最后一个胜出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无辜受难，历史模式周而复始的循环着，要打破这一循环和为那些有识之士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以共和制或联邦制来代替君主制。在这种制度里，所有人都可实现其希望，行使其权利，并担任省与国家的领导。为实现这一目标，孙激励全中国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到民族革命中来，以推翻帝制与满清王朝，并引进近代共和制，摆脱外国的干涉与侵扰。

孙中山看到，尽管西方列强拥有繁荣、独立与民主，但他们也为工业化的问题所困扰。劳资纠纷、罢工、高工资要求以及财富在少数资本家和多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都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尽管中国尚未工业化到可目睹同类难题的地步，但资本主义的种子却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以来便已播下。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另外，鉴于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带来持久的土地问题，孙提倡平均地权，从而实现远古时代“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理想。总之，孙中山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见的。

4.2.2 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之路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 1866 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随长兄到檀香山，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 1892 年毕业，成为医学博士。他在学校所结交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1884 年的中法之战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刺激。1894 年的中日之战带给他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准备组织袭击广州，当作革命的根据地。事情败露后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孙中山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

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的职员设局，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到他学校老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4.2.3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如何被推翻的

革命，需要勇气，一种不只能面对死亡的心理威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还要知道自己冒险犯难可能不为人知、会白白牺牲的勇气。1910年11月13日，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现在的槟城，一群中国人聚集在这里开会，开什么会？他们要革命。他们的组织叫同盟会，但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已经革命七次都失败。同志转向的越来越多，募到的款越来越少。所以这次会议开始前，气压很低，云层很厚。有人想提议放弃革命的路线，没想到会议一开始，会中年纪最大、四十四岁的同盟会会长孙中山竟然率先提出要倾全会之力，再发动一次革命起义，他坚信这次一定能一举推翻清廷。副会长黄兴，三十六岁，他听了孙中山的话，立刻附议，他愿意亲自打头阵。会长秘书胡汉民，三十一岁，他也赞成。香港同盟会的会长赵声，二十九岁，是清廷新军的军官，同样赞成，而且表示只要起义成功，大部分新军都会加入。

南洋的华侨富商邓泽如也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办法筹。本来意志消沉的同志，这下都激昂起来。问题是要在哪里起义？孙中山其实早想好了，他顺势发布自己的构想。这次行动由赵声担任总指挥，黄兴担任副总指挥，集合五百个同志，起义的地点在广州。这次11月13日的会议，决定了第二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最悲壮的广州起义，也称为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最精英的同志热烈响应这个计划，参加人数从五百人增加到八百人。他们很多都是二十来岁，家世良好，受高等教育的人中之龙。

但人算不如天算，首先失算的是，孙中山在美国筹办的机关枪，因为帮忙付款的致公堂不肯付钱，所以货出不了港。致公堂是在美国的华工组成的秘密组织，是从反清的“洪门”衍生的地下会党。他们此时已对革命失去信心，所以只是口头上敷衍孙中山，根本没有打算要出钱。所以最重要的军火武器到不了革命党人的手中。再失算的是，有一位同盟会同志温生才单独行动，4月8日跑去刺杀广州的水师提督李准，结果错杀了广州将军孚琦。这下清廷提高警觉，加强戒备，调动大批清军开进广州。

革命党人只有四百多人，更糟的是武器很薄弱，黄兴率领的敢死队只有数量极少的驳壳枪、若干把短枪、数百把小刀和三大箱炸药。而且同志多是书生，起义前就有人拿枪走火，打伤自己的左腿。在一片混乱中，3月29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广州起义开始了。起义以悲壮的失败告终，却也敲响了清朝统治者的丧钟。被处死的革命党人，清廷下令曝尸街头，不得收尸。革命党人想尽办法得以把烈

士的尸体收殓，共收得七十二人，合葬在“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从此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的烈士中最著名的当数林觉民。这当然是因为他写了名垂千古的“与妻诀别书”。他在受审时，面无惧色，侃侃而谈，但因为他是福州人，讲的官话很难懂，而审他的两广总督张鸣岐是山东人，双方等于鸡同鸭讲。结果林觉民使用英文答辩，后来干脆用纸笔现场书写，张鸣岐看林觉民文采不凡，如此人才，想开脱于他，希望他为大清效力。林觉民一心要为革命牺牲，希望唤醒国人，当然宁死不屈，慷慨赴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其中分别都是谁？可能多半只知林觉民一人。这就是我们说的革命者的勇气，明知道所做所为，日后无人闻问，但既已看破生死，更当看透名利，义无反顾。正是这种义无反顾才有了后来的保路风暴，才有了武昌起义，才有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革命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族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及西藏人。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和国成立，其间仅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它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但革命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令孙中山感到沮丧。他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的反对，情愿同袁世凯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孙中山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民主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州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民国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帝制的企图铺平了道路。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4.2.4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有哪些设想

在对革命事业失望至极之时，孙中山的精神世界也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但他没有彻底的消沉下去，而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写作当中，为后人留下了他对中国建国方略的设想。孙中山从三个方面对未来的国家进行构建，心理建设、物质

建设、社会建设。

他认为首先应该是“心理建设”，因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却与孙中山的主观愿望大相径庭：封建专制虽倒，军阀专制愈演愈烈，以前的种种建设宏愿没有能够实现，军阀势力在不断地瓦解革命阵营，而革命党内部的思想也是极其混乱。许多革命党人信心丧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建国方略理想太高，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心先整顿革命党人的思想。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建设无成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的思想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根源又是受了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观念的影响。为此孙中山指出，在“知易行难”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轻知怯行的心理，正是这一心理导致了革命的屡次失败，而且对革命后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孙中山认为“行易知难”，热情地倡导革命党人首先行动起来，“以行求知”，以此来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成功。孙中山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

孙中山构想的建国方略第二步是“物质建设”。为此，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着力于督办全国铁路，曾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实现“十年内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的宏愿。在此过程中，他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实现富强非振兴实业不可，振兴实业应由交通入手，而发展交通又以铁路为先。“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诸多方面的庞大建设蓝图，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建设十万英里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要治理河流、兴修水力。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移民。

孙中山构建的建国方略第三步是“社会建设”，很早之前孙中山就提出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民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但民国建立后，不仅北洋军阀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甚至一再出现复辟帝制的闹剧，真正的民主政治始终没有建立。孙中山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民智未开，民权未张，广大民众如同盘散沙，不懂利用集会、结社等方式行使民主权利。因此，国家有必要教育民众、广开民权，完成社会建设。孙中山的建议对今天依然有借鉴价值。

4.3 从《临时约法》回望辛亥革命是如何失败的？

4.3.1 《临时约法》的诞生

英、法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都颁布了成功的纲领性宪法文件，比如《大宪章》《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1912年，中华民国也颁布了这样的一部文件，名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不过，虽然编写的时候参照了国外的先例，内容上也符合现代宪法的标准，但这部宪法还是很快地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呢？

宪法能不能引领一个国家的政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没有统一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袁世凯掌控的北洋系，两方势力在政治上明争暗斗，这就让《临时约法》成了一部斗争的宪法，而不是治国的宪法。一旦政治斗争失败了，宪法当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出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革命的影响力，还只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在北方，皇帝还没有退位，还有一支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军虎视眈眈。为了避免发生内战，团结袁世凯，孙中山就说，谁能敦促清帝退位，谁就当大总统。有了这句话，袁世凯就去劝溥仪退位，他也确实做到了。眼看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他人之手，国民党的许多元老，能不着急吗？宋教仁年轻的时候在日本学习过法律，是党内的宪法专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军事上打不过你，我总可以用宪法来和你斗吧？

4.3.2 宋教仁在《临时约法》中的伏笔

《临时约法》最急切的目标，就是防止袁世凯坐上大总统的位子以后，依靠手里的军权搞独裁。所以宋教仁在起草的时候特别小心地埋了伏笔，一方面在法律上架空袁世凯，另一方面，就是要为自己将来竞选总理铺好台阶。这个总理职位又是从哪来的呢？我们现在知道，有的国家，比如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有的国家，比如德国，总统就是个虚职，总理才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当时南京的临时政府实行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孙中山就是一个实权大总统。他要把给袁世凯的本来也是这个位置。但宋教仁在宪法里做文章，把实权大总统改成了虚位大总统，增加了实权总理这个职位。他以为这样一来，袁世凯最终除了一个虚职，什么都得不到。宋教仁不光是这么设计的，也是这么做的。起草完宪法之后，他马上开始整顿同盟会，成立了国民党，掌握了党的组织大权。和袁世凯的谈判一成功，他就到全国各地游说、演讲，宣传国民党的主张，为国民党在下一届国会大选中造势。

宋教仁的愿景很简单，就是依靠选举，国民党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然后他就能代表国民党当上实权总理，彻底在宪法的层面上打败袁世凯。武斗打不过长江，文斗却有希望在全国获胜。宋教仁的这个设想，是以一支笔和一张嘴去匹敌袁世凯的千军万马。这种风度，当然是英武潇洒的。宋教仁就凭着这种英武潇洒的气

度，硬是把《临时约法》搞成了一个机关重重的斗争工具。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宋教仁武斗拿不到的东西，文斗也没拿到。

4.3.3 袁世凯假受《临时约法》

袁世凯不是读书人，他是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他是清朝驻朝鲜的代表，曾经指挥军队击败过入侵的日本军队。后来清政府苦于军队战斗力低下，又选中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操练一支新式军队。他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官场的套路，粗野的军人，他有制服的办法；文人雅士，他也有笼络的手段。他身上还有一种极度进取务实的精神。在晚清那个新旧博弈的环境里，袁世凯非常乐于利用新鲜事物为自己服务。他编练新兵，用的是外国的方法；管理城市，用的也是西洋的章程。当很多旧官僚还在热衷于道德文章的时候，袁世凯已经牢牢地在政治上建立了声望，还训练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队北洋军，牢牢把控在自己手里。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旧官僚里最开明，也最有执行力的。但袁世凯终究还是个清朝官僚。当他进入到现代政治的领域时，就只能凭着最初步的直觉和最切身的经验行事了。对于共和、约法、国会这些东西，他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对他有利，就可以采用，反之，就可以抛弃。

在南北对峙期间，孙中山提出，只要袁世凯能促成共和，接受《临时约法》，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这对袁世凯来说，是非常划算的买卖，他当然马上就答应了。当袁世凯接受了共和政治和《临时约法》时，南方革命党中的很多人，就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宋教仁就壮志满怀地去全国游说、演讲，准备在国会里夺权了。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总统当上了，共和办不办得成，《临时约法》要不要遵守，那还两说呢。他只要牢牢握住手里的兵权，心里就不慌，共和、约法、议会这些东西，就顺着时势，边走边看。

4.3.4 《临时约法》的陨落，军阀混战的开始

一开始，宋教仁的策略是占了上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多数席位，国内的话语权也牢牢掌控在他们手里。对于《临时约法》，袁世凯基本上束手无策。可是后来，有个叫有贺长雄的日本法学家一点拨，袁世凯的胆子马上大了起来。有贺长雄说，南方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根本不足为惧。袁世凯既然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那北京共和政府的权力，就不来自南京的国民政府，而是来自于清政府的主权让渡。所以，南方革命党人搞的《临时约法》，对袁世凯和北方国民政府，在法理上就没有约束力。袁世凯恍然大悟，原来法统渊源不是个问题啊。他就放心大胆地宣布国民党非法，关闭了国会，然后重新搞了个《中华民国约法》，自己提拔自己为终身大总统，然后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私心，走上了称帝的不归路。倒行逆施带来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

其实，出现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民国初年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革命党和北洋集团似乎活在不同的时代。革命党人受西方影响，满脑子原则和道理，处处壮怀激烈；而北洋派是从清王朝内部发展出来的，观念和和经验基本上还都是古代的。就是这样的两派人，在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合作开创了共和政治的局面。这场合作，固然有很多的权谋、诈术，但是，其中也不乏真挚、耐心与妥协。正因为有这些积极因素，国体转换才基本平稳，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流血牺牲。所以，有人也把这次国体转换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但让人惋惜的是，最初的耐心和妥协没有维持多久。袁世凯非常熟悉政治权谋，他本来答应到南京就职大总统的，但他出尔反尔，自导自演了一出兵变的假戏。他和革命党人说，不是我不来，是我一离开北京，军队就要哗变。孙中山和宋教仁只好答应他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到后来北洋集团意识到宋教仁的竞选行为构成了威胁时，又使用了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暗杀了宋教仁。再后来，袁世凯干脆解散了国会。这都是北洋集团缺乏耐心，一意孤行的证据。

但革命党就完全没犯错误吗？宋教仁当年是个 30 岁的年轻人，相当单纯。他对自己过分信任，又对对方过分不信任。他主持《临时约法》时，专门动手脚为袁世凯设套。他以为袁世凯会和他一样有宪法意识，一样有契约思维，哪怕是在无知的情况下答应了，也会照做到底。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时约法》本身就是革命党人对北洋集团的一种傲慢。他们认定袁世凯只会带兵，不懂现代政治。当宋教仁信心满满地去发表竞选演说时，他可能觉得袁世凯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太高看了自己，小看了对手。

民国初年最根本的宪法问题，和哪个国家都不一样，不是限制王权，也不是加强各省的凝聚力，而是如何把革命党和北洋系这两大势力团结在一起。《临时约法》最大的缺陷，不在于编写上的具体法条，而在于它逃避了这个根本问题，反而把合作导向了斗争这条路。斗争的结果是革命再起、军阀混战，好一个民不聊生的民国。因此，我们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5 为什么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5.1 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开展的？

胡适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他是近代白话文的倡导者，有一次，胡适在讲课时大力赞美白话文的优点，有一位同学不服气，起身问：“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没有。”胡适露出招牌的微笑。“肯定有！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胡适让同学们根据他的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十五分钟后，胡适让学生报告用字数目，选出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这份确实写得简练，只用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同学问。“干不了，谢谢！”

白话文运动掀起的不仅是一场文学革命，更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就像 1517 年马丁·路德点燃宗教革命。宗教革命打破了《圣经》只能用拉丁文记载、书写的禁忌，从此可以用德文、英文法文来翻译。意思就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自己惯用的语言文字来理解《圣经》，上帝的旨意不再只有罗马教廷可以传达、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促成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5.1.1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民国初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但并未发生社会革命。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但是中国的社会跟传统时代相比没多大变化。结果就是，新的政治制度没法从社会层面获得支持。可以想象一下，你给一群留着辫子的人讲人民主权，他们能听懂多少，没几个人能听懂的话，新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民国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剧。

很明显，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抛弃导致中国衰弱的因素，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有些学者认为自春秋战

国时期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这场发生在 1917—1923 年的思想革命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高峰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促成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来看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外民族主义和民主情绪格外强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和取消秘密缔约的理念，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1917 年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 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这次革命暴动最初是因为米价暴涨，引起渔村妇女抢米开始的，所以被称为“米骚动”。“米骚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给予日本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相比之下，中国却饱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苦，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1915 年 5 月 25 日，袁世凯与日本缔结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个条约分为五项，前四项中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最阴险的要算是第五项，日本要求中国在日本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百分之五十的军火。为了抗议二十一条，旅日中国留生成批回国，而中国商人也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二十一条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逼近灭亡的恐惧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衰退的时期，这场战争也给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却为中国本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机。1912 年新建立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由士人变为实业家的张謇担任工商总长，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这些内外有利因素使得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与股份公司这些领域。

这些新兴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些人不同于旧式的不关心政治的商贾和懒惰的农民，而是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决心保卫国家利益。这些人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经济得以扩展。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和广州都成为大都市，那里养育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阶层中至少有一千万人接受了或多或少的近代教育，他们拥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决心，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混乱的双重苦难中“救国”。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正是这些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 1919 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劳动大军的迅速崛起。还有那些本来在国外学习的回国留学生，特别热衷于引进变革。最杰出的回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回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和鲁迅；从美国回国的胡适和蒋梦麟。这些人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熟悉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陈独秀在 1915 年，蔡元培在 1916 年，胡适在 1917 年分别归国。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引进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5.1.2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主要领袖包括：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基本口号：民主与科学。谈到民主与科学，今天的人再熟悉不过。但如果我们仅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民主和科学实质上已然破产。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民主与科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评价标准，人类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是及其复杂的。其次，今天的社会也并不是按照民主与科学的设想来运行了。别的不说，仅从目前疫情时期的人间百态大家也能够深刻体会得到。民主与科学今后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它只是看上去很美。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对传统思想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引进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全盘西化。

5.1.3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陈独秀是安徽人，年轻时曾接受全面的国学教育，1896 年考中秀才。1902 年和 1906 年，两次东渡日本，但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07 年去了法国，受到法国政治和文学的强烈影响。尽管不是同盟会成员，但却在 1910 年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随后因为牵扯到了二次革命，逃往日本。1915 年，回国反对二十一条，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随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致力于唤醒国内的青年来摧毁死气沉沉的旧传统，创建一种新文化。

陈独秀号召年轻一代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并且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民族的觉醒。他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中国罪恶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儒家更成为罪恶聚集的地方。他认为，儒家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根除。他厉声疾呼打破保守主义，以便为新文化的建立营造空间。陈独秀对传统主义的大胆攻击，在陈腐的思想界开启了新的景观，也使他很快在受教育的青年中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蔡元培，浙江人，1889 年和 1892 年分别考中举人和进士，并成为令人钦羡的翰林院编修。1907 年去了德国，在来比锡大学学习。四年后，及时回国参加了

民国革命，孙中山政府委任他为教育总长。袁世凯接任总统后，他辞掉了这个职位。1912年夏，重返德国，呆了大约一年。随后三年，在法国度过，为中国留学生和劳工管理着勤工俭学项目。1916年，他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后，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加入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

这个时候的北大具有保守的传统，教授大多来自官场，学生无心向学，只把学习当作出仕的敲门砖，大学的轻浮气氛和师生的散漫士气是声名狼藉的。担任校长一职之后，蔡元培便警告他们，大学是学习的地方，并不是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他提出：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不独致力于介绍西方文明，还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不但要保存国粹，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之重估。大学教育不是旧时科举考试的替代品。容许绝对的学术自由，保证不同理论与观点的自由表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北大成为令人振奋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同政治理念的教师汇聚一堂，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北大以数量众多的著作与思想生活而闻名，国内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加入教师队伍中。1917年，陈独秀获聘为文学院院长，胡适从美国回国后成为文学教授。1918年，李大钊被委任为图书馆馆长，毛泽东成为其助理。

胡适年轻时接受的也是国学教育。1909年从中国公学毕业后，获得政府资助到美国学习，先后获得康乃尔大学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数据之上，这种态度明显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儒家与现代世界是毫不相干的。他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

从实用主义出发，他提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验和解决，逐步地改造社会。在他的支持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因为两个“先生”都来自西方，因此他提倡完全西化，“到西方去”是他的要旨。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汇，而他的追随者则疾呼“打倒孔家店”。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坚持认为文言文死气沉沉，这种死的语言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文学。

胡适建议用白话文来写作，并且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清晰、有活力的文体。白话文就是要让人人都能懂、能用中文。文学的力量不再集中在少数士大夫阶级手中，这样也更容易接受西方来的思想、文化。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带动思想的自由。白话文运动能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八股文废除后，中国学生缺少可仿效的明确样板，在追求新鲜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被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吸引了很短一段时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他们很快便追随新的潮流。

5.2 五四运动何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

5.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先来看国际秩序在 20 世纪初的变化,这些变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一战一方面让列强关系重新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赚了一大票,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不考虑实力对比就别谈理想。但是单纯从实力出发,各国就会天天掐架,打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在列强之间构建力量均衡,大家发现谁也打不倒对方,也就认账了,只能坐下来谈了。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了力量均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因为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过它会打这么久,规模这么大,死伤的人这么多。过去人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战争是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但是一战打到后来,已经和政治目标没啥关系了,各个国家全都是咬牙硬挺着,只是在比谁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谁获益更多。这种战争已经很荒唐了,所以,人们都觉得现实主义不靠谱了,需要有新的理念来替换它。

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这就出现了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俄国的列宁主义。威尔逊和列宁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关于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俩人的主张区别很大。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到处欺负弱小民族。只要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不再有人挨欺负,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就爆发了战争。但是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所以还得对外转移矛盾,还会继续爆发大战。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消失了,阶级矛盾也化解了,人类就大同了。列宁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列宁的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5.2.2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在一战前，根本轮不到美国人来指点国际秩序，那会儿的美国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经有欧洲国家因为财政紧张想要裁撤驻外使馆，纠结了半天，最后裁撤了驻美使馆，保留了驻土耳其使馆，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国更重要。但是到了一战后不一样了，欧洲国家全都打得鼻青脸肿，战争中都欠了美国人一屁股债，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会上就不得不让美国人来指点江山一把。但威尔逊主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根本没法落实。因为英法两个战胜国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它们俩好不容易把德国打败了，正盘算着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一大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依照现实主义逻辑，殖民地可以随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义，这事儿就不能干。两国都不敢公开反对威尔逊，毕竟欠了美国人的钱，但是暗地里就是各种拆台。巴黎和会就开成了明面上理想主义，暗地里现实主义的套路。这套路让中国特受伤。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自身命运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想着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就行了。

巴黎和会上理想主义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对命运的期望值调得非常高。再来看看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日本这会儿也很犹豫，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了。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在一战中为了拉拢日本，早就暗中承诺，战后可以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肯定是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这事儿肯定就不能干了。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它渴望着自己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它认为山东的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中国这边是无法忍受的。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巴黎和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

5.2.3 五四运动的爆发

当巴黎决定的消息到达北京时，中国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信任粉碎了。学生为威尔逊的背叛行为而激愤，发誓以血保卫山东。5月4日，几百名归国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民族危机和民族受辱时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向凡尔赛发电报，抗议这个不公正的决定；另外，向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督促他们，如果有有关山东

的条款不修订，就拒绝条约。他们也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游行，向外国公使提呈请愿书，转递巴黎。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大批学生，人数激增到五千人。巨大的横幅在人群上空飘舞，上面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和“诛卖国贼曹汝霖”的字样。当游行队伍经过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时，游行群众的秩序消失了。学生冲进曹汝霖住宅，这时曹已经逃掉，学生们就将怒气撒向了住宅中客人，其中有一人正是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的怒火最后真演变成了一场大火，曹汝霖的住宅被烧，姗姗来迟的警察逮捕了部分学生。

逮捕事件引起的极度反响，北京学生总罢课，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罢课很快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的学生当中，全国的店主、工厂工人和商业机构的雇员也参加了游行。一场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紧随而至，人们停止购买日货和乘坐日本汽轮，而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在公众持续增加的压力下，5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上千封电报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条约，并且威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惩治他们。北京军阀政府混乱不堪，无力采取明确立场，于是将签约的决定留给了代表团本身。

为了防止代表屈服于外来压力或者政府的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以确保无人离开其住所。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两年后，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5.2.4 一场“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获得激进分子的欢迎。到底是选择渐进式社会变革还是选择迅速根本的变革，一场大辩论很快便爆发了。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提倡研究和解决具体及实际的问题，“一点一滴”进化式地改善社会。李大钊与在他之后不久的陈独秀，则主张效仿苏俄的形式，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治社会转型。

胡适在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文章中，督促国人避开那些高谈阔论和无所不包的“主义”，因为那些“主义”一无所是，而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造的丧钟！”。他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和漫无目的的革命，而建议自发的和逐步的改造，以消除社会进步的五大敌人：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混乱。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回答道，“主义”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总方向”，是必须的。他谈到：“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问题都解决希望。就以俄国而论，沙皇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1919年年中，陈独秀还不像李大钊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承认“与其模棱两可地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如提倡教育和工人解放的实际问题”。但到1920年底，他也成为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信政治行动的功效。他谈到，“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

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自相矛盾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社会和政治问题亟须迫切和直接的解决，但胡适及其追随者在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后，竟钻研起文学批评、古代史和考据这些不大实际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主义”和提倡根本变化的人走到工农中，直接研究他们的问题。很明显，胡适没有看到实用主义是稳定的美国社会的产物，那里容许自由检验问题和实行改造，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

5.2.5 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演进轨迹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巴黎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认为西方的物质主义，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五四运动使得国人彻底抛弃了威尔逊主义，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的关键词。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而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国家，要顺利进行现代国家的转型，首先必须要完成政治上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度里，革命是唯一的选择。

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毛泽东形容这场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所策动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同样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水岭，它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篇章，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发展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

命和文化革命的终极目标。

5.3 历史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5.3.1 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

近代中国从被西方炮舰轰开国门，又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到终于确立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方向，饱尝传统儒学的士子们从众多的思潮之中，终于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浪潮，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蕴含了怎样严密的历史逻辑，又如何与历史现实相统一，很多学者上下求索。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由此也开启了中国对资本主义追求的历史。由“师夷长技”为发端，经洋务派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戊戌维新人士力求变革封建体制，以适应新生产方式的发展，直至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资产阶级共和理论在一部分思想家心中日趋全面，日臻完美。然而，其结局却与愿望者根本相反，资产阶级共和理论在中国因无法生存而最终破产。

这种资本主义道路探索的失败所展示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内部机制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既无资产阶级理论生存的内部土壤，更无资产阶级理论生存的外部环境。这作为一种历史基础的显现，为新的道路探索确立了历史指向，它要求从错误的道路上返回，重新思考，重新选择。

既然中国在承受着资本主义不够发展和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痛苦，又承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那么在这一历史与社会交替转换的关键时期，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文化传统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罪恶及其历史终结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必将作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基因转换的最终归结。这无疑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追求大败所显示出的历史指向。

近代中国伴随着资产阶级理论的大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拔地而起，形成别具风貌的社会思潮，贯穿近代史始末。它承继了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又根植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当中，艰难地孕育奋力地前行，内在地导向于社会主义。从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抨击封建统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并论证中国未来的理想社会，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其思想核心是土地问题。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强调按劳分配和平等的概念。为近代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追求美好、公有平等的理想环境，成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内在而直接地导向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行进过程中，遇到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挫折和危机。

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文化带入了失

败，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所形成的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巴黎和会上明争暗斗，合约订立后更加剑拔弩张，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倒了战后疲惫的西方世界，其结果是：人民受的苦比战争最黑暗的时候还要多，西方学者疾呼欧洲现在已成了世界的病夫。社会意识形态上，大战给西方人民带来了虚幻、悲观和颓废。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和平理想的破灭，更加重了精神的苦痛。欧洲大战引起的西方文化危机，严重震撼了中国思想界，促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反思，思想观念也经历着急速的变动，出现了启蒙思想的新取向。这一新取向的发展使中国思想界直接趋向于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变动无疑是在整个世界文化变动的背景下，在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动的结果。从此，社会主义如排山倒海而来，势不可挡。

5.3.2 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

正当中国面临新的选择时，由四股力量所组成的历史强力开始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集结凝聚：中国 80 年来资本主义追求的失败经验和教训，历史地指向于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演进，维系着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危机；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一起被中国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而被接纳。中国人急迫地希望不经过革命而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走上无政府的改良主义道路。于是，在北方开展了广泛的工读互助和新村运动；在南方毛泽东则发动了湖南自治运动。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只能解决社会的物质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精神问题，后者的解决只能用互助办法，以人道主义和勤工主义精神来改造掠夺主义经济制度”，声称“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就能实现。这种理想与幻想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然而，这些实践只是截取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却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由此理论基础所推导出来的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因而很快就失败了。经此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而且还有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以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阶级斗争。从而，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系统性、成熟性、可操作性，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凸现出来。加上十月革命的成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它作为一种美好的榜样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从此，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强力的推动下在中国骤然兴起，进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

6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6.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何特别之处？

6.1.1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但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许多先进的知识青年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这表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

6.1.2 澎湃的思潮

最早在中国提出并推动建立共产党的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18年秋，李大钊创建新潮社，不久又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几乎同时，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信里讲，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党，就是共产党。恽代英在武汉利群书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叫“波社”，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在四川，吴玉章、杨公等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成员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后，有的是个人加入，有的是整个组织都参加了。这个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不是偶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当时的共同要求，是客观的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的产物，是有历史必然性的。1920年初，第三国际维经斯基来华，分别与李大钊、陈独秀就成立党支部问题进行商谈。这个时候，正式建党的事宜被提上了议程。

6.1.3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召开。代表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虽然确立了党的名称、纲领、具体工作计划。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不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有事没有出席。陈独秀派了周佛海作为代表，李大钊派了张国焘作为代表。

陈独秀和李大钊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不过他俩对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看法却存在分歧。陈独秀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贬低农民大众的看法。他认为：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因此，进步的城市力量应充当运动先锋，而落后的农民应顺服的跟从。而李大钊却持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他们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我们必须强调农民是重要一部分。李大钊对乡村的纯朴有着天生的热爱之情，而厌恶城市生活的腐化。他督促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解放农民，激发他们的革命能量。实际上，他在农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国的解放。1918年，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遭军阀张作霖处决后，毛泽东坚持农民斗争，将其导师的理念付诸实践。

6.1.4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展现出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展现出跟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特色。1920年的5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三件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始投身工人运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不仅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注意把它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6月，党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是军阀，提出解决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批评了社会上对时局的错误认识。同年，党的二大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纲领。这是破天荒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从此，前进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说清楚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跟以往中国历史上其他政党第一个不同，是它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

第二，它从成立时起，就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知识分子在工厂放工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处对工

友演讲，却没有多少人搭理。后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新的做法，到工厂里面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发现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开展工人运动。以后就到农村里来开展农民运动。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到社会底层去，到基本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是中国的以往任何政党没有做过的。

现在有些人提出怀疑，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称这个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其实，确定什么人是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不取决于他的出身或本人成分，而是取决于它代表着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使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周围的一切，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些主张。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农村里诞生的，是在城市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先在城市里面从事工人运动，有着广阔的眼界，养成严密的组织性，以后才到农村里面去，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斗争的。他们的思想是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和很强的组织力，并且用来改造农民意识，这是同旧式农民战争区别的根本所在，也是它最终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第三，把党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它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刚建立的时候，党员很复杂，12个代表中间，有的始终坚持革命，成为党的领导人，像毛泽东、董必武，有的是为革命牺牲了，有的是中间脱离党了，有的是成了叛徒，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以后参加共产党的，也有一些人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甚至会蜕化变质，但这不是主流。总是不停地大浪淘沙，最后把党真正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组织。没有那么一个核心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也不可能带动千百万群众来实现这么一个共同理想。在今天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来武装大家。一定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展现出来的这样几个特征，正好回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开天辟地大事变。

6.2 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相共始终的。

6.2.1 国共为何会有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 1921 年 7 月成立的。最初还是很弱小，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毕竟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他们打倒，必须联合一切赞同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这是国共合作能够实现的客观基础。那时，国民党也不很景气，在屡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大实力，内部成分相当复杂，还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也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有一定的威望。它的前身同盟会领导过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此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直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军阀势力，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第二，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可以高举国民革命的大旗，可以允许革命力量公开活动，可以合法地开展工农运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第三，国民党有一批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人士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柳亚子等。通过他们，还可以团结一大批中间分子。共产国际对促成国共合作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国民党方面看，它深受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国内冲突的困扰。孙中山长期关注社会主义，他从西方国家得不到任何援助，而苏联却从财力、武器、军事政治顾问等多方面给以援助。国民党过去是不搞群众运动的，因此缺乏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弥补了它的不足。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像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6.2.2 国共第一次合作带来了什么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是以 1924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国民党带来了强大的力量。经过共产党的帮助，使它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经过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强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各民族平等。在民权主义里，强调中国的权力应该为大多数人所共有，而不是少数人所专有，甚至提出不能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在民生主义里，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大原则。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合作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影响及于邻近的湖南、江西等省。没有这个条件，北伐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合作还训练了一支党的军队。黄埔军官学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重要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放在和军事训练同样的地位，以革命精神来武装学生。这支军队当时是很有革命朝气的，有严格的纪律，同群众的关系也比较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既有共产党的重要将领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也有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胡宗南、杜聿明等。

这次合作还改组国民党，大大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它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存在，连北京、天津、南京、浙江、两湖等地都没有，更不用说边远地区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它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到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几个省外，都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不少省市党部的负责人由共产党员担任，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很多是在共产党人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就没有后来国民党那样大的局面。

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也是有帮助的，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深入人心。党在广东可以公开从事活动，更便于党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在 1923 年 6 月确定实行国共合作的三大时还只有党员 420 名，1925 年 1 月已发展到 994 人，到这年年底增加到 1 万人。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这些，都为迎接北伐战争的来到做了重要准备。可惜的是，那时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帮助国民党上，却忽视了争取领导权和自身建设发展的问题。党的活动主要在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而国民党右派却牢牢地抓住了政权和军权，一旦羽翼丰满，翻过脸来收拾你，革命就将遭受严重挫折。

6.2.3 为什么会发生大革命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回答：这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同中国人民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人民革命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但是，中国近代这个基本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常常表现得很尖锐，为什么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大革命时期那样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潮，还需要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作一点具体分析。那时候，欧美列强刚刚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政治和经济危机，从 1924 年起统治秩序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他们在远东卷土重来，不等价交换的倾销商品大量涌入，对中国工矿事业的掠夺和控制大大加强，英、美两国表现得尤为积极。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曾有很大发展，战后初期还有相当发展，但到 1924 年以后就处处感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丧失了原来有过的那种顺利发展的条件，发展速度明显迟缓下来，逐渐陷入困境。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社会上大多数人直接感受到这种压力。国内的反帝情绪、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五卅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现象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不断扩大。国家实际上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各省份则由那些专横跋扈的军人统治，这种状况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愈演愈烈。1920 年发生直皖战争，1922 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些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战争，至于地方性的更是年

年不断。在军阀之间争夺造成的连年战火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起码的保障，更谈不上其他了。为了和平统一，推倒军阀统治，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变革现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强烈的共同愿望。

这次大革命能够发生的决定因素，是这时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国共共同喊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响亮口号，它们有着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广泛地发动工农运动，对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这样说：一场革命大风暴的出现，只有人民的痛苦和失望是不够的，它总需要能给人以一种新的信念和希望，把人们团聚起来。它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否则有了机遇也无法抓住，所以这一点是关键。

6.2.4 大革命的风起云涌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以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为起点，五卅运动的起源是当年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商会和其它民间团体达成了初步解决方案，随后遭到日籍工厂主人拒绝。工人继续进行第二次罢工，5 月 15 日又派八名代表与管理层谈判。这种对抗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暴力冲突，导致一人被杀，另外七人受伤。英国控制的工部局不但没有惩罚开火的日本人，反而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许多中国工人。5 月 22 日，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工人为被屠杀者举行公开追悼会，并发表街头演讲，谴责日籍工厂主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逮捕，这引发了 5 月 30 日南京路上三千名学生的游行，抗议英日的暴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英国中尉捕头下令手下开枪，杀死 11 名中国人，射伤几十人。此外，约 50 名学生被捕。“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议、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直到 12 月，当英国籍巡捕房总巡捕及捕头被解职，以及工部局给死者和伤者赔偿 75000 中国银元，众怒才得以平息。

五卅惨案之后，民族主义骚动在国内不同地方风起云涌，与帝国主义爆发冲突，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高潮。它传到南方，发生了有 25 万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府也发动了两次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叛变，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全力投入群众运动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共产国际代表一开始便认为国民党力量大而共产党力量还小，一再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甚至认为共产党这时只能充当“苦力”。接着，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取得重大胜利。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已控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支配的两湖地区。11 月，又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对盘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部的决定性胜利。随着北伐进军的顺利进行，中国南部各地的工农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如果没有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单靠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群众性运动高潮，还难以发展成那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当北伐胜利进行时，蒋介石乘北洋军阀势力兵败如山倒的有利形势，大量收编投奔过来的旧军阀军队，抢占地方政权，使自己的实力得到很大扩充。共产党却与此相反，除原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外，不去掌握军队，甚至严厉取缔共产党人参加地方政权，因而不能在有利形势下积聚更多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阵地，使力量对比日益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

6.2.5 蒋介石的反共政变

就在看起来一派大好的形势下，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逐渐抬头了。国民党本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的成员从左到右都有。有相当一批人虽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反清革命，但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工农运动的兴起。在这个队伍中，还有一大批政客、旧军人和野心分子。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一直有一部分人反对这种合作。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刺后，他们的反共活动更趋猖獗。但最初它还没有能影响全局。起关键作用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本来并不高，在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地位的提高，是国共合作以后的事。他最初把自己装扮成坚决拥护国共合作的“左派”，办事果断认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战争的胜利，他的地位一步步上升，羽毛逐渐丰满，反共面目便逐渐显露出来。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受共产党影响的中山舰船长绑架蒋介石的企图失败，蒋介石解除了很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重要试探，另一方面逼走当时貌似“左派”、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把国民党的大权集中到他手里。这次试探得手后，他的胆子更大了，这年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通过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把共产党人排除出国民党领导岗位之外。

陈独秀却选择了一再的让步，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由此引起与蒋介石的破裂，一味主张退让，以为退让便可以使对方满足，使矛盾得到缓和，以便北伐的继续进行。这样，便丧失了重要的时机。北伐前夜，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仍需要继续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所以，他没有立刻实行破裂，有时甚至还做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但当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转折。在北伐顺利开展，帝国主义撑腰和北方官僚政客以及南方金融家的支持，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共活动就逐渐明朗化了。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宣布“清党”，大量搜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自行建立南京政府。

6.3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6.3.1 一味地妥协退让，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的叛变，说明大革命已到了生死关头。原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这时已迁到武汉，表面上是个左派政府，实际上很不可靠，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它的成员中，有少数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等，而大多数是对蒋介石专断独裁不满的政客和军人，和被大势卷入、待机而动的人物。刚从海外归来、以“左派领袖”姿态出现、口头说得漂亮的汪精卫，更是一个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政客。武汉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做好可能的全面破裂的应变准备。那样，虽然由于力量对比的关系，不一定能避免失败，至少可以多保存一些力量，为日后的斗争造成较好的态势。可是党没有这样做。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现在更需要巩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把武汉政府包括汪精卫在内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原来害怕同蒋介石破裂，现在又害怕同汪精卫破裂，认为一破裂就没有力量了，革命就要失败。

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力主武汉政府继续北伐，与自陕西东下的冯玉祥部队汇合，希望得到冯玉祥帮助。这时，武汉的经济局势和军事局势都日益恶化。北伐军在河南经过苦战，迎出了冯玉祥。但冯玉祥看到武汉政府的处境不佳，倒向了蒋介石。尽管共产党中央力求拉住汪精卫，共产国际派来的路易甚至把国际发来的应对当前事变的密电给汪精卫看，武汉政府仍在7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宋庆龄、邓演达等被迫出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大革命从此失败，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6.3.2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大革命为什么失败？这有客观的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在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世界资本主义这时正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能够集中较多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中国的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动政治经验丰富，绝不是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摧毁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年轻，理论准备、实际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都不足，客观形势却迫使他们必须立刻投身到这样一场大革命中去，并且站在斗争的前列。共产国际离中国那么远，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了些好主意，也出了不少不正确的主意。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当时就取得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条件是不具备的。

从主观的指导思想来看，在党的初期，特别是敌对力量和同盟者的力量都明显地大于自己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主要错误是右，也是投降主义，大革命时期正是这样。尽管在后来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过某些幼稚的“左”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中央虽然对蒋介石的作为有时也有所警惕，但同样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害怕太刺激

蒋介石、汪精卫等而导致破裂，总认为退让就可以使国共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就可以维护团结。结果，让国民党右派看准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气焰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大；共产党却把自己的手脚重重束缚起来，有时也看出一些问题，但一到关键时刻就犹豫畏缩，不敢放手发展进步力量，不敢在必要时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于是，已有的阵地一个一个地丢失，还抱着种种幻想，没有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等到对方一翻脸，几乎全军覆没，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仍可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世界上曾经有不少政党造成过相当大的声势，但在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下，便失败以致溃散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大革命失败时，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低潮，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不行了，仿佛已陷入绝境。但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把斗争顽强地坚持下去，并且把工作做得更扎实，很快又重新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6.3.3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大革命失败带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不到两年半，到大革命失败也只有六年。这样年轻的党，在成立后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推动起这样大的革命高潮，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历史场面，确实是极不寻常的。但大革命的失败也让中国共产党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这又让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又成了“左”，不顾实际情况，不讲斗争策略，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结果严重孤立了自己，一味蛮干，同样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有了这两方面的沉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包括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才有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用无数共产党员的鲜血为代价所换来的。

7 中国革命新道路是怎样探索和开辟的？

7.1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及其统治实质？

7.1.1 国民党如何在全国建立的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继续北伐，我们把它称为二次北伐。二次北伐过程中，各军阀互相妥协，尤其是东北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炸伤不治身亡，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国民党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国家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北伐所取得的国家统一只是徒具表面罢了。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而可以继续享有权力。蒋介石急于要达成全国统一而与这些军阀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授予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换取他们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这些军阀被称作为“新军阀”，他们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只要与南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地与南京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

以李宗仁和李济琛为首的桂系，控制广西、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份。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华北和西北省份占据优势地位。张学良控制着东北（满洲）和热河。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将势力扩展到河北、绥远和察哈尔。这些军阀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用来扩张地盘，也用作自保。他们抽走了一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

除了有这些新军阀的麻烦外，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持续争斗；而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则代表了一股第三势力。蒋介石在党内地位逊于胡汉民、汪精卫两人，因此他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宜之计，定出交替支持左右两派的权术。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又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比方我们熟悉的中统、军统。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各户相互监视、相互告发。为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

出版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7.1.2 如何评价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年民国

尽管局势如此不济，民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得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同时也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 80% 以上。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未实现。

财政上表现为及其的不负责任。国民政府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这些税收主要用来发展军事和偿还债务。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经济的崩溃。

表面上看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用外强中干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7.2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为何如此曲折？

7.2.1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白色恐怖致使党员人数锐减。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中共党员 26000 多人。自动脱党，叛党的不计其数。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 57900 多人，锐减到 10000 多人。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员从地上爬了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首，独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7.2.2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 年 7 月中旬，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改组会议，陈独秀提交了辞职书。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 2 万多北伐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他们控制了南昌城三天，随后国民党军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就在这时，中共领导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组。在 1927 年 8 月 7 日召开于汉口的一次紧急会议上，陈独秀因提倡“投降主义”而遭罢免了党的领

导权，由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身分接替。那个时候的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取代中央委员会角色的新设机构。李立三被推选负责宣传工作。新的领导集体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认为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在中央的委派下进入了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指导下，起义农民捣毁了粤汉铁路的一些路段，控制了湘省的几个地方，开展土地革命。但这第一次起义远算不上成功，在政府军的进攻下，毛泽东被迫撤退到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整顿队伍。瞿秋白认为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的纯粹的农民暴动，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秋收起义的失败使毛泽东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为加强武装暴动，莫斯科派聂伊曼前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7年12月11日，广州爆发了一场暴动。共产党人控制了广州城三天，建立了“广州公社”和一个苏维埃政权。但这个胜利维时很短暂，在政府军和广州工会工人的联合进攻下，暴动遭突然镇压了。这些意在夺取城市控制权的起义，最终均以失败告终，这些失败都与党内的左倾思想泛滥密不可分。

7.2.3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随着这些城市暴动接连失败，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开始呈现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四军，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党代表。从此诞生了闻名遐迩的朱毛领导。7月，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在陕西，刘志丹和高岗也创立了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

为避免国民党的袭击，也为了与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同地举行，1928年7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批判，而瞿秋白则因他的左倾偏离主义受到抨击。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湖南农村的活动得到了认可。大会号召推翻国民政府及摧毁其军事力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及没收地主财产；通过驱逐帝国主义者以达成中国的统一。大会选举向忠发担任总书记，李立三担任宣传部长。党的总部机关仍秘密留在上海。

在农村，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几个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是萌芽时期的作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是形成时期的作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成熟和发展时期的作品。

蒋介石在1927年驱逐俄国军事顾问后，越来越多地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发展

军队，从此一个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逐渐开始成形。通过这些顾问的努力，蒋介石发展起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德式中央军。从1930年到1934年，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4月，均告失败。主要是应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

在农村，共产党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并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这些举措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城市，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旨在占领中国的文学舞台。左联的成员抨击国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批评英美学派的作家，讴歌苏俄文学和左派创作。左联代言人是著名作家鲁迅。左联通过本身众多的出版物赢得了对文学界相当有力的控制。鲁迅的《阿Q正传》，矛盾，老舍，巴金。造就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学氛围，这段时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说教喻世意识；作品都反映社会现实。他们通过讽刺、挖苦和同情来揭露旧社会的颓废和落后。也许，在一个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传统也在不断与现代性对抗的转型时期，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控诉和社会抗议。

随着革命运动的低潮，运动由城市转向农村，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中央的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大。赣南、闽西根据地连城一片，形成了拥有2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那个时候毛泽东和朱德在农村的活动，没有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着独立的、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活动，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或驻上海党领导人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些成就要归功于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原则：农民大众的支持、高效的党政机关、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自给自足。但是这些成就一直受到党内左派的冲击。

7.2.4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苏联控制下的党中央与毛泽东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难以调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各类土地一视同仁地平均分配给小地主、富农和贫农，而政治局委员们却坚持要彻底剥夺地主，并按牺牲富人偏袒穷人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指责毛泽东持落后的农民思想，阶级意识动摇及薄弱。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倾向于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红军在根据地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薄弱点”，确保“各个击破，每战务歼灭敌军或大或小之一部”。通过“急速迂回包抄”，红军可以迷惑敌人，赢得战斗。

相反，政治局则坚持打阵地战以保卫根据地，并向白区推进而非等待敌人入侵红区。在日本侵略的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宣称他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支由有愿意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军队，而政治局则拒绝与改良派合作，主张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便当需要来临时，红军能担当起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崇高职责。毛泽东和左派之间的隔阂非常之大，因此要达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结果后来，左倾思想掌控了中央的主导权，土地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共发生了三次左倾泛滥做大，进而严重影响土地革命战争的进展。

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提倡广泛的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但是以盲目的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的失败。

第二次是李立三在 1930 年的左倾错误，同样是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先打下一两个省，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太好了。并且要求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全力的配合，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结果可以想象，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红军主力也在攻打大城市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引起了当时正在参加中原大战的蒋介石的警觉，所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他立刻调集重兵开始了五次围剿作战。

第三次可谓是最严重的一次，王明的左倾错误，当时因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了严重破坏，被迫转移到了苏区，在王明的错误思想指挥下，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后果自然是长征了。从军事角度来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得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 90%，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 100%，教训是极其惨痛的。1934 年 10 月 15 日，长征正式开始，11 月 10 日，瑞金沦陷。

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1、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2、共产国际对中共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3、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

缺乏，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的结合起来。

最初指挥长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政府军的狂轰滥炸，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这些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能在前四次反围剿中战胜国民党，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败得那么惨。此外，他们对李德的傲慢和专横作风也很不满。他们认为，李德的做法俨然是总司令，而他实际上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负责的党总书记博古与他沆瀣一气排挤他人。

7.2.5 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1935 年 1 月 15—17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议。1、吸取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2、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后来组成了，周、毛、王三人团。（王稼祥）。遵义会议的作用：1、结束了左，确立了正确路线；2、它是标志中共由幼稚走向了成熟的会议；3、挽救了党、红军、中国革命。因此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7.2.6 红军长征的胜利

娄山关战役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懋功会师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方面军在懋功东南达维乡喜遇四方面军感人场景。1935 年 9 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这就是昆仑山，一个毛泽东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回顾长征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创作了《念奴娇·昆仑》《七律·长征》。六盘山是红军长征后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保安县的吴起镇。在这场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所辖的部队只剩下了八千人。此后，由贺龙、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其它队伍陆续到达，加上当地的中共武装，队伍扩充到三万人。1936 年 12 月，中共首脑机关迁到了延安，毛泽东在那里以自己为核心整顿了党和军队，并从事理论著述。

7.2.7 毛泽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

内战爆发。1947年3月18日傍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的川口村东渡黄河，共计行程2000余里，历时一年零五天，途经榆林8县33个村。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在转战期间，党中央和毛主席运筹帷幄，在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

7.2.8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长征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保存与历练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宣传了政治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史诗般的经历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质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7.3 中国革命为何选择了毛泽东思想？

7.3.1 早年毛泽东的内在品性

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它也离不开毛泽东本人的一些贡献。毛泽东思想里面反映了毛泽东本人性格方面的特征，尤其是他早年的内在品性，反映了他早年生活的一些体悟，实践中的一些反思。毛泽东出生在1893年的湖南韶山，父亲是农民出身，也做一点小生意，家境还是比较宽裕的。早年毛泽东体现出了一种同情劳苦大众、反抗封建强权的品性。比方说，父亲经常让他去村里人家收一些粮食，回来的路上，看到饿肚子的老百姓，他就把收到的粮食给分掉了，又担心回去父亲收拾，就撒谎说他掉池塘里面了。遇到灾荒的时候，老百姓来向毛泽东的父亲借粮，父亲说自己家也没有余量，毛泽东就很不高兴，因为他家明明有粮食。那个时候，反对父亲就意味着反对父权，这是反对封建强权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志向远大，真诚而守信，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这与他好学的品性密不可分。刚开始他在私塾学习，1905年科举考试取消了，父亲就希望毛泽东不要读书了，当他的帮手。毛泽东不愿意，1910年，他离开家乡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怀着激动心情，临行前他写下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以作告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东山小学，接着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1911年他就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因为他发现学校里老师教的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段时间他把湖南图书

馆的书读了一个大概。后来呢，父亲不支持他了，断了他的粮。没有了经济收入了，他只能又去考那些不花钱的学校，1912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特别重视社会调查和国情研究，他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呢，毛泽东还特别注重体育锻炼。中国最早的关于体育方面的论文，出自毛泽东之手。他讲体育锻炼不仅仅是强壮身体，更多是对个体意志和情操的一种磨练。他喜欢爬山、游泳、风浴、雨浴。夏天深夜、狂风暴雨、雷鸣闪电，独自一人，冲上岳麓山顶，然后再冲下来。有一次，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毛泽东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遍体湿淋淋地来到了山下蔡和森的家里。蔡和森的母亲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为了体会把一个人放在大山里，狂风暴雨也不迷路的感受，借以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培养情操。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操场围墙上，肯定会有这样一条标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出自毛泽东。

7.3.2 读有字之书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特别强调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指的就是社会这本大书。他的这些文章，《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等，都是他用脚写出来的。他是在实践与调查当中感悟出的这些道理。学生时代，每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大家需要做一些学校布置的社会调研，毛泽东也要做。毛泽东的调研可以称为游学，就是不带干粮，不带钱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借此来体验生活，了解社会，提高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感知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最早的探索者、实践者和集大成者。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其真理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立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以此发动和指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成功。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实现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和基本的线索都蕴含在他早期的思想发展之中。毛泽东早年所具有的文化思想、平民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而深刻的现代化观、民众观和国情观，无疑是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完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

7.3.3 案例分析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诗人，书法家。在这众多的身份当中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他本来的身份，那就是读书人这个身份，

正是这个身份造就了他的一生。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著名散文家梁衡写了一篇文章，叫《文章大家毛泽东》。这篇文章分析了毛泽东的文章的一些特性，包含了思想与气势、说理与用典、讽刺与幽默、通俗与典雅、功过与才艺。

文章谈到：写文章讲究，形、事、情、理、典。毛泽东的文章一应俱全。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年，红尘过后，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也能增加一点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8 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8.1 为什么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

8.1.1 《菊与刀》中的日本

研究和描写日本文化特性的书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菊与刀》是其中名气最大，也最特别的一本。这本书的作者叫作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二战末期，战场上，美国对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一是要不要在战后的条约里废除天皇制度？二是美国有没有必要全面占领日本？作者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利用她能够在美国访谈到的日本移民，以及收集到的各种日本历史、政治与文化资料，勾勒出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从而对前面两个问题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回答。不应该废除天皇制，美国不应该全面占领日本。美国政府采纳了她的建议。1946年，作者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出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菊与刀》。

作者首先从日语里提炼出一个概念，叫作“恩”，恩情的恩。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欠下了某种“恩”。当然，所有的恩里面，最大的是皇恩。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有幸生在日本，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欠下了对天皇的恩。这些恩情跟纯粹的感激之情还不一样，感激之情可以是你自发的，但“恩”是要你偿还的，它是社会风俗期待你承担起的义务和责任，它是很沉重的，因为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你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作者说，“恩”这个概念特别能够解释日本人为什么特别极端化，特别容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也特别容易牺牲自我，因为“恩”对他们来说负担太重了。

尽管日本人对忠孝的重视可以说来源于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核之一，也就是“仁”。在中国价值体系里面，“仁”是所有道德的核心，忠孝的基础是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换句话说，臣子对皇帝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只有皇帝是仁君，才值得臣子付出绝对的忠诚。但是在日本文化里，“仁”的地位是很低的，“仁义”一般是用来形容黑社会成员之间的感情，类似于中国的“江湖道义”。日本人对天皇和自己主君的忠诚越是无条件，越代表他们的品格纯洁高尚，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区别。对于两个彼此之间不存在亲属或者上下级关系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恩”，但是有另外一种类似的关系，就是“情义”。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恩”可以是绝对的、无限的，但“情义”是有限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一个正派的人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恩”，也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情义”。谁要是不能够做

到这一点，他就应该感到耻辱。报不了“恩”不配做人，报不了“情义”会丢人，也就是让名分蒙羞。而“丢人”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如果感受到了别人的羞辱，有可能会去冲上去拼命。

人类社会一般而言有两种文化，一种叫罪感文化，一种叫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特点是，道德归根结底是个人内心的事。犯错的人如果感到内疚，可以通过认错和坦白来缓解内心的道德负担。另外一种则是依靠外在社会强制力来引导人们向善，这种文化叫作“耻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特点是，道德是靠羞耻心来强制的，要是他的错误被公之于众，意味着极大的耻辱。在耻感文化中，如果一个人犯了错，他最主要的情感是懊恼，懊恼别人怎么发现了他，而不是内疚自己怎么犯了错。当然，这种懊恼可以很强烈，强烈到让他自杀，但懊恼跟内疚完全不一样。在耻感文化中，犯了错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者坦白，也并不会感到内心的解脱。显然日本的文化属于耻感文化的范畴。

8.1.2 “焦虑症”患者日本

日本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只能向外部学习。早期是向中国学习，后来又向西方学习。学习者的位置让日本始终有一种精神焦虑感，因为总得仰视别人，总感觉自己矮人一头。日本想方设法克服要这种焦虑感，寻找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它尝试过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为了克服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日本开始追随西方，要脱亚入欧。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陷入西方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于是日本又想了第二个办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转回头来寻找大东亚主义，和西方的白人相对抗。日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国家规模不够大，注定会失败。而在这期间，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发生的第一场大的战争，是公元 663 年的白江口之战。当时正是盛唐，大唐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一仗把日本给彻底打服了。日本认定大唐是最高端的文化，随即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到唐朝来学习各种制度和他文化，把日本按照唐朝的样子改造一番。曾经作为日本首都一千多年的京都，就是完全仿照大唐的洛阳城建设的。可是再怎么学，只有中原这边才是中华，日本这边依然是夷狄，它又没法把自己搬到中国来。当时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这个事情痛苦万分，以至于痛哭流涕。明朝灭亡后，满清入关建立新的朝代，日本发现了一个摆脱中国精神影响的机会。这回好了，大明被大清替代，中原已经被真正的夷狄所统治。所以不再是中华了，你们变成夷狄了，我们日本这边保留着最精粹的儒家文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日本这种说法，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有，他们国内也都有说法认为自己才是中华，大清这边是夷狄。但是对日本来说，这套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倒在某某种意义上放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因为这种看法仍然是用儒家的秩序观来解释日本和中原的身份。

8.1.3 南柯一梦的大东亚主义

随着近代世界和西方人的到来，日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可能性。西方在把大清和日本都收拾了几次之后，看上去像是更高级的文明。何况大清也开始推行洋务，要向西方学习。日本如果能够比大清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就意味着日本比大清更快更好地踏上了文明之路。那就终于能够俯视中国了，这一千多年来一直仰视中国的日子终于要结束。日本国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土相对狭小，问题简单，政策容易聚焦。不像大清那样，有汉、满、蒙、回、藏各个族群需要平衡，有各种需要考虑的问题，政策太难聚焦了。因此日本的转型之路比大清顺畅得多。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转型更快。终于通过甲午战争打败大清，一下子掀翻了一千多年来的东亚秩序。十年后，又一举打败了俄国，正式加入列强的队伍，日本感觉自己彻底扬眉吐气了。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著作，深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向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来学习西方。有大量的现代中文词汇，都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借用过来的。而这些词汇最初被译成汉字，并不是中国人翻译的，都是日本人的工作。比如像服务、组织、纪律、政治、政府、干部、方针、政策，这些词都是我们从日语里借鉴过来的。日本成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日本有些思想家骄傲地说，我们曾经从中国汲取文化千年之久，受益甚多，现在也该反过来向中国输出些东西了。

日本自认为摆脱了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但是很快就发现又落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压制当中。日本拼命努力，打败俄国加入列强，之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本想着在巴黎和会上能够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日本拿出一个提案，要求把“种族平等”这一条加到国联的章程里。当时日本的这个提案，中国也坚决支持，但是西方列强直接拒绝了。日本就此埋下了要和西方一决高下的野心。日本就重新定义了和西方人之间的斗争，这将不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战争，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终极对决。通过一场战争，来彻底推翻西方白人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统治。既然是和西方人对决，那就只能用东方的文化，于是日本人把儒家的理念改造一番用了起来。创造了“大东亚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在“大东亚”的理念下，日本认为东亚的儒家秩序该由它来主导了。而要想真正主导儒家秩序，以及为了有效地把大东亚整合起来，必须征服中国。

8.1.4 挑衅的关东军

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农产和矿藏的丰富而著称。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一直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沙俄从前在东北的权益，更加助长了它的野心。随着 1910 年吞并朝鲜，许多日本人“顺理成章”地

把东北看作下一个征服目标。关东军是日本军事建制中颇不寻常的一个单位，而它的缘起可追溯到 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作为和约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沙俄在东北的铁路及经济权益。关东军效法俄国人以“铁路护路队”名义驻扎下来，在东北站稳了脚跟，1928 年将其司令部从旅顺迁到了沈阳。关东军基本不受日本国内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自行展开从中国抢夺东北的使命。关东军的这一自我设定的使命，在 1928 年 10 月石原莞尔中佐及 1929 年 7 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到来后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两个谋略家很快便成为关东军的灵魂人物，完全架空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板垣和石原公开宣扬占领东北，声称要将东北用作对抗苏联南进的缓冲地带和一旦与美国开战时的补给基地。

此外，东北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缓解日本的人口过密和资源不足，提供商业机会并减轻国内的失业难题。那段时间，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忙于国内事务，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关东军认为 1931 年行动时机非常有利，因为中国正深深地陷入内部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困境。在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困难的不祥之兆，在萧条冲击之前就不断显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获得巨大发展的工业正承受着生产过剩的影响，导致了企业失败和失业增加。1927 年，包括台湾银行等大银行在内的三十五家银行倒闭，而在 1929 年 7 月到 1930 年 6 月之间，约有六十六万人丢掉了职业。许多扩张主义分子利用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鼓吹征服东北将可使国家摆脱困境。这些言论得到了陆军和财阀的赞许。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九一八事变很快就发生了。

8.2 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8.2.1 九一八事变

1931 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点，一枚炸弹在沈阳郊外的南满铁路路段爆炸。事实上炸弹的损害微乎其微，并没有中断正常的铁路运营，但日本巡逻队声称爆炸过后中国士兵从野地里开火，所以别无选择，只得还击“自卫”。至翌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沈阳城墙遭攻破，该城被占领。9 月 19 日长春被占，20 日安东和营口被占，21 日吉林被占。东京知道这次蓄谋已久的入侵阴谋，但没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听由关东军的战地官佐掌握了日本的命运，并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征服和最终败亡之路。

许多人认为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干什么，在剿共，在内战，蒋介石制定的战略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对日本就采取了妥协、不抵抗的政策。事实上，日本的进攻在中国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1931 年 9 月 11 日，蒋

介石告诫张学良不要与日本人交战，9月15日，驻沈阳的东北军主力被调离开。当9月18日冲突爆发时，病倒在北京的张学良再次请示，但再一次受命不作抵抗。

深深陷入内部争斗的蒋介石经不起一场对外战争。于是他决定向国联呼吁，尽管他完全明白国联没有力量实施干预，但他找不到其它任何办法。他指望通过向这个国际组织呼吁来拖延时间，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反而寄希望于等待日本国内政治发生有利于他的转折。这种政策我们把它称作不抵抗政策，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国联就是我们今天的联合国的前身。当时国联的量很弱，只会谴责，结果日本在受到谴责之后，很嚣张的宣布退出国联。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我们也假设一下，如果当时国共两党能及早的达成合作，停止内战，是不是日本就没那么嚣张了，极有可能也不会有其后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918爆发之后并不是没有反抗，一方面来自东北人民自发起来的抗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很多的游击队。但是共产党当时的力量无法领导一场全面的抗战，只有国民党能做到，但是他刚开始并没有去做。

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国际制裁和中国方面协调一致的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在五个月裹席卷了整个东北。东北人民零星的、缺乏协调的抗日运动最终都没有能抵制住敌军的侵略。在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征服以后，日本人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定年号为“康德”。

8.2.2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首相经常换，今天也是，但是当时不是经常换的概念，是经常暗杀。谁干的呢，少壮派的军官，这些人信奉军国主义，觉得文人政府无法领导国家走向辉煌，所以就是杀，杀了之后换一拨人，发现还是一帮文人，怎么办，继续杀，直到杀到代表少壮派利益的军官政府上台才停止了暗杀。结果，1936年广田弘毅上台了，他是一个忠实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上台之后制定了新的侵华战略，制造了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自九一八之后，日本在华北策动了政权特殊化，开展“防共自治运动”，策动了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那么为什么要策动华北事变呢，其实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华北拱卫着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北京，它是希望把北京孤立起来，为其进一步侵略打基础。北京在历史上，是很多王朝的首都，谁拿下了北京就很容易拿下中国，所以呢，日本就先把北京周围的各个省份都真空化了，顿时让北京的门户大开，以便在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能够长驱直入。

8.2.3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1937年的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战争，7月下旬就开始攻打北京，国民党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很快北京沦陷。接下来就是经济中心了，上海。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上海很快也被攻破。接着就是南京，当时的首都。南京拿下之后发生了不分清红皂白的大屠杀。国民政府迁往了重庆。接着是徐州，徐州的在台儿庄附近国军与日军激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徐州后来还是被攻破。接着是广州、武汉。

此时，抗战的第一个阶段结束，我们用空间换来了时间，日本也被深深的拉入了我们的腹地，不可自拔。这时候日本也改变了策略，开始将重点放在了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同时拉拢国民党，扶持伪政权，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最有名的傀儡政府是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建立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在敌后战场，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苏联参战，日本已成强弩之末，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最终取得胜利。

8.2.4 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

日本在其占领区进行了残暴统治，台湾人民、东北人民、关内占领区人民深受其害。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台湾被日本直接统治达50年之久。在占领区，日本采取了靠傀儡政府来维持占领区的政策。1931年侵占东北后，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洲国”为傀儡国，在完成了东北的征服以后，日本人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尔和绥远建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内蒙古的德王为前台的统治者。12月14日，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为前台人物，管辖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和山东五个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形式上的首领，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华东三省。但这三个首领都没有获取统一所需的全国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紧寻找一个名望更大的人物。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在日本的扶植下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

2011年台湾上映了一部电影《赛德克·巴莱》，讲述的就是台湾原著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发生的历史“雾社事件”。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让原住民学习日语，改变原始的生活方式，强制驯化他们。男人不准打猎须服劳役，女人不准编织帮佣陪酒，他们根本不把原住民当作人看。台湾赛德克原住民在日本统治下，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信仰。遭受三十年的殖民压迫后，忍辱负重的马赫坡部落头目莫那·鲁道，决定先在雾社公学校运动会时带领族人发起反抗，1930年为了部落的尊严与自由奋勇反

抗，三百多名勇士对抗日本三千大军，用生命换来部落民族灵魂和信仰。

8.2.5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在南京 30 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辜殒命。日军虐待中国劳工、掳掠和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强制推行奴化教育。1937 年南京沦陷后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约有 30 万平民遇难，同时还有难以计算的妇女受辱。这个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向国内公众隐瞒了真相。当真相最终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揭露出来后，日本人民都为这种暴行感到羞耻不已。但是到今天，右翼势力影响下的日本政府却倒行逆施，修改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使得两国人民无法正视这段历史。

2018 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因反思日本侵华历史和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引起中国读者关注。村上善于描摹青春情怀、以小资情调著称的村上春树，在中国拥有大批读者，最为知名的代表作包括《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等。《刺杀骑士团长》被各界公誉为他的转型之作。该书以一位遭遇中年危机的 36 岁肖像画家偶然得到二战时期日本画家雨田具彦的遗世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展开故事。与画作相关的二战史实影影绰绰、逐渐浮出水面。村上春树在作品中谴责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残害地下学生组织的行径，更直接点出“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些备受日本右翼攻讦的真实历史事件。村上春树在这部小说中尤其详细叙述了画家雨田具彦的弟弟、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参战后在南京被要求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砍杀中国俘虏，退役后受到战争心理创伤而自杀。作家由此反思战争与人性之恶，认为战争对于人们内心的摧残足以击垮一个本性纯真的年轻人对于生活的所有向往。

2019 年 5 月在日本从平成跨入令和的历史时刻，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在这篇文章中，70 岁的村上春树讲述了自己父亲的生平以及家族的历史，并提到了父亲就是一名侵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可能参与杀害中国战俘。文章呼吁日本民众正视历史反思过去。面对村上的反思，日本民众的反应是冷嘲热讽，有人说竟然说他是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故意讨好中国人，好像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颁发的一样。

《拉贝日记》影片取材自德国人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拉贝日记》。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始末。影片讲述了德国西门子中国分公司负责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故事。拉贝是德国纳粹党人，曾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他选择了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 20 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南京！南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由陆川执导。影片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执导的一部战争史诗电影，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电影的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 1937 年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南京，在一个教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一个为救人而冒充神父的美国人、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女学生、14 个逃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他们在危难的时刻放下个人的生与死，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鬼子来了》是一部由姜文执导，姜文主演的电影。影片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

8.3 西安事变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枢纽？

8.3.1 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这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墙上的一段文字，清楚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委。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三省迅速沦陷。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它也是东北人民的家园，国民党军队虽已悉数撤出东北，但东北人民的抵抗没有消亡，因为他们无路可退。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抗日战争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1931 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战争的开始，但日本政府可没有宣称自己发动了侵略战争。1937 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依旧没有宣战。这个阶段国内统一的反侵略抗击力量已基本形成，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日宣战，一直到了 1941 年 12 月 9 日，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因为前一天美国对日宣战，这是基于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 1932 年 4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对日宣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有不少，有以马占山为代表的不愿意放弃抵抗的正规军，有警察大队，有游击队，我们把他们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虽然也在顽强抵抗，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战术又以正面战为主，很快就被日军各个击破，到 1933 年左右，义勇军就已基本溃散。在这危机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先后赴东北开展工作，抗日游击队就此在东北各地崛起。随后，

各地的抗日游击队经过多次整合和改建，1936年2月，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12月组建完毕，共11个军，鼎盛时期达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抗战期间，东北抗联在东三省各地发起战斗，大大小小数万次，巅峰时期牵制日军76万之多。东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我们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事迹，基本可以窥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二。杨靖宇生于1905年2月13日，河南确山县（今驻马店市）人，身高至少1.9米，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他原名“马尚德”，“杨靖宇”是到了东北之后根据工作需要改的，“靖宇”在朝鲜话里有“驱除外敌”之意。杨靖宇于1923年就读于河南省立开封纺织工业学校，期间秘密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回到老家开展农运工作，领导了豫南农民起义。

1929年，受组织派遣，前往东北开展工作。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6月第一、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打仗的特点是灵活多变，多采用游击战，“敌进我退、敌乱我打”，这样的战术让日本关东军伤透了脑筋，杨靖宇的名字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噩梦。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一批叫“肉弹十勇士”的牌位，也就是当年发动自杀式冲锋的10个人，而据日军当时的记载和学者的考证，围剿这支关东军的部队就是杨靖宇率领的部队。

为了“剿灭”杨靖宇的队伍，日本关东军从1938年开始调集6万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宗旨很明确，遇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只打抗联，放过其他队伍，遇到杨靖宇的队伍和其他抗联，只打杨靖宇的队伍，放过其他抗联。足以看出日本关东军对杨靖宇的仇恨有多深。日军吸取了教训，改变了作战思路，通过断绝了老百姓与抗联的联系，遇到抗联队伍穷追不舍，招降和优待抗联叛变分子的方式，最终将抗联和杨靖宇的队伍逼入了绝境。杨靖宇的牺牲也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残忍的割下了他的头颅示众。为了破解日军的谜团，杨靖宇到底是靠什么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能存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与日军殊死抗争，日军剖开了杨靖宇的胃，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棉絮、稻草、树皮。

8.3.2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从1936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而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中国共产党突入西北孤地，蒋介石急切地想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于是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督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对中共发动进攻。但战事无所进展。思念家乡且厌恶内战的东北军官兵越来越受统战宣传的影响。中共代表开始渗透到东北军的军官训练团，到1936年夏季，张杨两位统帅也被招揽到了统一战线一边。12月3日，蒋介石飞抵张杨驻地西安，希望稳定那里的不安局势，并加强剿共力度。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和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发动了兵变。蒋介石被囚禁，张学良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各党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将领。4、释放一切政治犯。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6、开放民众爱国运动。7、确实执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2月14日，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队组成了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委员会主席。

西安事变和绑架蒋介石震惊了中外。国民党右派立即决定进行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展示实力。中国再一次处在了内战的边缘。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周恩来从幕后现身前台进行调停。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也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张学良同意释放蒋介石，但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回南京。蒋介石在机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条件重申了一遍。蒋介石一离西安，态度就发生变化，扣留了张学良，调集中央军直逼西安，并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了下來，这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在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谈到：“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结束了他的动摇。西安事变，开始了这些任务的完成。”

尽管蒋介石坚持不会以获释为条件而签署任何协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诺，只要共产党答应支持三民主义，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抗日战争。剿共停止了，但国民党对西北红区的封锁仍然继续。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帮助统一了国家，也停止了内战。蒋介石不再被看作是抗击日军的绊脚石，中国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面对1937

年的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开始了全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战争。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因此我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9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9.1 为什么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9.1.1 正面战场的四个阶段

正面战场是中国人与日军对峙交战的主战场，这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称，战争可以在两个月内结束；日本陆海军制定的作战目标是计划在三四个月内结束战争。当时的欧美国家也对中国抗战持悲观态度，认为国民政府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抗战很快会失败。没想到英勇的中国军人在装备低劣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与日军抵抗，仅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就持续了三个月，不但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也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原有的看法。

第一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进行战略防御。在这一阶段，由于日军企图迅速击败国民党军主力，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因此，这一阶段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第二阶段（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虽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因此，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整体上抗战仍然比较积极努力。

第三阶段（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战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军事上相持。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频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作用开始下降到次要位置。

第四阶段（1944年至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举行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态。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则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隅。

9.1.2 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

正面战场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哪些作用？在抗战初期阶段，正面战场发挥了重

要作用，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 70 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多次组织战役进攻，妄想歼灭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甸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是抗击日本军队的重要战场。

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正面战场爱国官兵英勇抗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从而为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创造了条件。

1937—1945 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 22 次，重要战斗 3117 次，小战斗 3.89 万余次，击毙击伤日军 85.9 万余人，自己付出 322 万多人的重大伤亡。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他们违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愿望，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9.1.3 敌后战场发挥的作用

敌后战场，是指在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战场，由共产党领导，以开展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打击日伪军。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夹击日军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体现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即使正面抗战失利，中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亡国而放弃斗争。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固支撑，没有敌后战场，抗日战争就不能坚持下来。敌后战场对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抗战初期，敌后战场便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了日军不能全力西进的态势。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后，便挺进山西，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并以少数兵力开展群众工作，为敌后战场的开辟打下了基础。在华北，太原失陷后，“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在国民党军丢失的国土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在华

东，新四军各支队挺进苏南、皖南、皖西和皖中地区，活跃在大江南北，打击了入侵华中的日本侵略军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浪潮。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战的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八路军开辟的华北敌后战场，它的持久战，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也使敌人没有稳固的后方。而新四军坚持华中、华东敌后战场的抗日斗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以解放区为依托，抗击着侵华日军总兵力的64%，最高时达到75%，最少时也占其54%，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人民武装，通过对日伪军的艰苦作战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自卫反击，由几万人发展到200万人，创建了拥有近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

1944年初，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会战中溃败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却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为取得抗日战场的战略反攻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敌后战场变成了解放区军民举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出发点。1937—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创建了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解放区，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1.4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

相互依存体现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需要以共产党为主开辟的敌后战场，因为没有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打击、牵制和对日军战略要地的袭扰对日军交通补给线的破坏，日军将以更加优势的兵力及武器投入正面战场，正面战场很难支撑下去。反之，敌后战场也需要正面战场，因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展开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相互配合体现在对日作战的战略协同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始终以各种军事斗争方式不断支援正面战场的作战，防止其崩溃。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打击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战中不断壮大，本身就对日军起到了战略牵制作用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军自始至终不得不出相当大兵力用于后方守备，这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虽屡遭失败，但始终支撑着正面战场，且淞沪、武汉、太原、台儿庄等战役也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客观上支援了敌后战场。

相互补充体现在两个战场形成的抗战合力。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大大优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在抗日的勇敢作战方面，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在游击战方面，都不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政治素

质好，作战勇敢，与人民有密切联系，具有打游击战的经验，但数量少、装备差，不具备与日军打正规战的本钱。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所形成的两个战场正好相互弥补了不足，并在弥补中形成了一种抗战合力，使日军既受到正面正规军的抗击，又受到敌后游击部队的打击，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相互渗透体现在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及角色转换上。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为减轻正面战场压力，有意识地派一些正规部队赴敌后抗日。这样，敌后战场实际上也有国民党军队参与作战，减轻了敌后战场上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压力。在敌后战场中，许多战役也表现为正规的作战形式。在忻口、娘子关会战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作战，实际上是直接配合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实际上是正规兵团的作战行动。这就从另一侧面表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两个战场的角色互变，相互渗透。总之，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有一种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二者不可或缺，失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支持抗战到胜利。

9.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9.2.1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屡战屡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国似一盘散沙，不能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而日本之所以一再挑衅欺负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缺乏民族凝聚力，难聚全民之力御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捐弃前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本应当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起的但没有起的指导作用，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有过合作，也有血海深仇。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放下仇恨，促成国共合作。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义无反顾投身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中国由“散沙一盘”凝聚成了“磐石一块”，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抗日的民族团结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成为日本侵略者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9.2.2 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持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两党的抗战立场一致了，但两党的抗战路线却相反。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总动员，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国民党由于阶级立场使然，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表现，打了像血战台儿庄那样著名的战役；另一方面又只主张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武装民众，十分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大仗，但有些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而且到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还出现大溃收。这除了有战略部署不当等原因外，不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充分配合和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国情，在科学分析抗日战争基本特点的同时，认识到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战争伟力是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力量。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把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是凝聚人民战争伟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认为中日战争会是持久的，这不是共产党的独家认识，但提出持久战理论却是共产党的独家创造。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日本虽横行一时，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但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缺乏，经不起长期消耗，最怕持久战。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指导方针，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9.2.3 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把游击战争第一次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形成了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的战略态势，为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支持东北爱国官兵和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派出大批干部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使敌人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克服严重困难，采取“敌进我进”方

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威震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次，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人，其中日军 52.7 万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兵力，给予正面战场有力支持，同时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

到 1945 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族根据地在内，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 100 万，民兵 220 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总之，在抗日战争中，代表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肩负历史重任，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钢铁意志和模范行动，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列，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9.2.4 埃德加·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

1936 年 7 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辗转进入了陕北延安，采访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还采访了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还有娱乐生活。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后，1937 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他此行的采访、见闻、日记、游记。没想到，这本书刚一问世，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一个月之内至少印刷了三次，几星期就卖出了 10 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后来这本书在翻为中文的时候，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为了避免书名在政治上过于敏感，最早的翻译者就改了一个比较中性的书名，《西行漫记》。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斯诺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斯诺在西北的经历，同他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完全隔离开来，自成一体，仿佛时空穿越。

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新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斯诺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会的农民自信、开朗，完全不是胆怯的典型中国农民；红军战士是真正地快乐。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的人民，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共产党身上凝聚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虽然红军的人数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少很多，但斯诺认为红军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红军中各省的人都有。其他中国军队常常按省划分，比如东北军、西北军，而红军则

打破了省之间的界限。

在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观察家眼里，重庆和延安是两个极端。重庆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延安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一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

9.3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为何影响深远？

9.3.1 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幅油画展示的是侵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二郎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投降书。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9.3.2 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一面展墙，上边记录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4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抗战期间，日军的死亡人数为155.8万人，其中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9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2万余人。

9.3.3 民族自决的新高度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这一天，中国人民终于开展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它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面前，如果国家民族没有前途，根本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这种人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事实，比别的千言万语更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为什么那么多志士仁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奋斗？原因就在这里。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它所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在

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战斗中，像火山般喷发出来。这是抗日战争能够顽强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源泉所在。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从来就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不区分你是汉族还是满族、蒙古族、回族、壮族、彝族、苗族等。中国各族人民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单靠哪一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日本侵略者。正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高度的民族自觉，是中华民族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地坚持下来，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源泉。反过来，经过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深深扎根于人民脑海中的民族自觉，成为抗战结束后鼓舞无数优秀儿女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无形动力。经过十四年浴血抗战，最终取得完全胜利，又一扫不少人在长期半殖民地境遇中造成的自卑心理，极大地增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

民族自觉的提高，使人们在付出血的代价后，思想境界变得大大开阔，超越过去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小圈子的狭隘眼光，更多地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股巨大的无形凝聚力，成为鼓舞人们万众一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自觉和推动力量。

9.3.4 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

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民主传统一直极为缺乏。只有“奉天承运”的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握有一切大权。百姓被称为“子民”“蚁民”。被一些人大肆吹捧过的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头两条便写道：“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被编织得异常精密的“三纲五常”那套意识形态所网罗，从小就灌输在一般人头脑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 20 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变化。但事实上，国家主权依然没有“属于国民全体”，先是北洋军阀，随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尽管搬用过一些西方的政治名称，其实哪里谈得上什么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因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是实现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抗战期间民主对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引力，并被赋予新的更广阔的含义。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敌后环境中站住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实行了民主政治，同民众建立起不可分离的鱼水情。敌后建立的根据地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往被人瞧不起的劳苦大众如今抬起头来自己当家做主。八路军和新四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这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兵力财力物力已大大损耗，难以再发动以前那样规模的攻势。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压力已明显减轻。于是，

他的反民主的独裁统治日益加强。其中突出的是特务横行。在国民党特务政策统治下面，在路上走的人有被抓去的，在家中坐的人有被抓去的，甚至坐在办公室的公务员有被抓去的。抓去的方式，不依任何法律手段，不公开，被抓到什么地方去拷问和监禁，没有人知道。人民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哪还有什么民主可言？这种愤怒越积越深。到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垂败的日本侵略者在1944年向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短短八个月内先后攻陷中国二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如果人们对其他有些问题还可勉强忍受的话，那么，抗日战争在军事方面出现不应有的大溃败就使人无法忍受。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的集中大暴露。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便风起云涌般以空前的规模掀起新的热潮。许多大学教授、文化界人士、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民主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深刻地改变了众多人的生活态度，抛弃那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消极心态，不再满足于对旧社会秩序做些枝枝节节的改良，期待着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9.3.5 中国共产党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在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主要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严密封锁和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一般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较多的认识 and 了解。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武汉、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同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和外国友人广泛接触，坦诚相待，增强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就是经他介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的。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其中包括不少的大学生。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高中以上百分之十九，高中百分之二十一，初中百分之三十一。他们很多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学习，毕业后奔赴前线，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种子，许多人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同盟各国的对日作战将进入决战阶段，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战场的全盘情况。在中国，以往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或者远处敌后，或者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不容易了解它的具体情况。这时，在各方面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二十一人到这些根据地采访，其中包括美联社、合众社、美国《时代》杂志等六名外国记者。1944年6月9日，他们到了延安。有些人还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他们所写的大量报道

和评论，在大后方和国外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成为轰动一时的事情。这些报道和评论，是大后方许多人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使他们看到一个过去并不了解的天地，感到耳目一新，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新的希望。

许多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对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当局强烈失望，转而对以往还比较生疏甚至抱有若干怀疑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寄以信任和期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中国的两大政党，而且越来越多的同情在倾向共产党。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9.3.6 抗战胜利后的局势

战争对中国、日本和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国际威望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与此相对，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

虽然老牌的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国家在战时被日本赶出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从前的殖民地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都吵闹着要独立。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主义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这一转折预示着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始。

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相当比例的日本军队，令他们不能投入到其它地方。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在中国的战事耗费了日本战争总开支的35%，即340亿美元中的120亿，另外还有近40万名日本人战死，伤亡人数达150多万人。而中国的代价更高，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而且还招致了巨额的战争债务，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的新形势。

国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计，就一直受连年的赤字开支的困扰，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长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量从1937年时的19亿元法币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亿，1945年时的1万多亿。

滥发纸币的后果是暴升的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尽管通货膨胀是维持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战后时期便成了一种祸根，损毁了政府根本的经济基础。

在耐心地忍受了 14 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内战的阴霾再一次不祥地笼罩了神州大地，令这个筋疲力尽的民族之未来继续充满了动荡。当这种起码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民众脆弱的心理就会将矛头直指造成这种状况的国民党政府。

10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0.1 从底层逻辑看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何不同？

10.1.1 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国民党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全都吸收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还很机械，试图把苏联的革命经验不加改造地移植到中国来，结果就失败了，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之后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线，下面农村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产党却因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为什么国共两党在沦陷区的表现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因为它们的组织机制完全不同。一个组织要想能够存活和发展，有两个重要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就散架了；二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性，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要达成这两个要求，就需要有组织内部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确保组织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执行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机制很不一样。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共产党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面对组织任务，国民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共产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国民党的外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有效运转，有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了，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产党的内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地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只要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就算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就算各个基层组织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共同的信念基础也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驱使，每个组织成员对事业都有着巨大热情，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正是因为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差异性，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产党员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就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就都会变成共产党人的抗日根据地。

10.1.2 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政治困局

10.1.2.1 民族主义在民族整合上的困局

要想统一中国首先是要将国内各个民族都整合起来，国民党直接从西方借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多元、高度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搞不定的。针对民族问题，民国的基本原则是“五族共和”，就是说汉满蒙回藏加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但究竟什么是“大中华民族”，它仅仅是汉族的延伸，还是一个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呢？如果仅仅是汉族的延伸的话，那就不应该说“五族共和”了，直接就说大中华民族等于大汉族不就得了？可是这样大中华民族就没有道理统治满蒙回藏这些地区了，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

所以“大中华民族”应该是个超越于汉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那么这个更大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呢？这得说清楚，把道理说通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才会愿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民族主义里面有一种理论预设，要求所谓的“民族”得是一个内在无差异的群体，也就是说，大中华民族应该是内在无差异的，可是汉满蒙回藏是有差异的。国民政府要用民族主义来整合中国，在这就遇到了困境，这个困境在历史上导向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解释不清那些差异，索性把中华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延伸，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就是汉化，这样就会在未来消除掉差异。但这很难让少数民族接受，于是又会导出第二个结果，少数民族索性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分离出去。当然了，这不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就一定能够分离出去，但是一定意味着国民政府在那里的统治会不稳定，如果刚好此时还有不怀好意的外国在这里捣鬼，那么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对这种地区失去实质性的统治。之所以有这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的理念是没法真正用来整合内在多元的中国的。

10.1.2.2 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困局

民族主义下狭隘性会让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没法恰当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例子来看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格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闹变扭。1942年底宋美龄访问美国，希望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战，在国会演讲之后又在全国发表巡回演讲，极受美国民众欢迎，大获成功。英国国王于是发出邀请，希望宋美龄访英，但是宋美龄给拒绝

了。不仅如此，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好在美国，宋美龄也拒绝见丘吉尔，反倒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英国释放被软禁了的印度领袖尼赫鲁。

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看着宋美龄的这些做法极为无奈。他在无奈之中只能再提醒宋美龄，既然已经都这么做了，也没办法了，但是既然不去访问英国，那就千万别去访问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否则对英国人的侮辱就太大了。宋美龄根本不听，偏偏就到加拿大转了一圈。宋美龄这种级别的人物，具体的活动安排肯定不是由着自己个人的性子，而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决策。这一系列糟糕的决策，反映出的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最高统治者难以获得足够的视野与格局，作为一个弱国，在急需国际盟友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居然会赌气行事，完全无意义地得罪英国，意味着国民政府无能力真正地理解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

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极力主张下，正式把中国拉入与美国、英国、苏联相并列的地位，说这四个国家在战后将是世界四大警察，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并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战区都划归中国来统筹。多少年来一直受尽屈辱的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毕竟是在国民政府艰苦卓绝的战争努力下获得的，所以国民政府在国内的正当性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准。但是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格局太小，并没法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不知道孰重孰轻，之后又与英国、苏联、甚至于美国发生了一些没多大实际意义的争执，以至于这个机会被它浪费了，没能把自己由此获得的超级正当性转化为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因此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后来的败局。

10.1.3 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普世格局

10.1.3.1 共产主义有效整合民族力量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率，还给它提供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让共产党在面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了国民党根本打不开的思路，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在民族问题上，共产主义把民族主义的建构属性给挑明了，进一步提出，人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身份，其他所有身份都是从属性的。回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从族群的角度讲，汉满蒙回藏当然有差异，但是从阶级的角度讲，不仅仅满蒙回藏的概念没有意义，汉族的概念也没有意义，汉满蒙回藏的被压迫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共产党因此就对少数民族问题给出了一种复合结构的解决方案，既承认了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论证了它们的统一性。而国民党为了确保统一性，就只能否认差异性。两相比较，自然共产党的方案更能获得少数民族接受。

10.1.3.2 共产主义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再来看共产党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更是展开了一种国民党无法想象的世界主义格局。1946年夏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提出战后的世界基本秩序是美国领导的反动阵营和苏联领导的进步阵营之间的对抗关系。美苏两国之外，包括欧洲、日本、澳洲、亚非拉等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没有自主性，或者归属于美国阵营或者归属于苏联阵营。中国毫无疑问也属于中间地带，而且应该归属于进步的苏联阵营。

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在各种谈话中多次谈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延续着1946年的意思。但是到1962年，毛泽东的说法变了，他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是一个。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新说法，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闹翻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强国成为敌人，这让中国的外交格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

到了1971年、72年，基辛格、尼克松陆续来访华，开始构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海陆两大帝国之外第三力量的地位。这种地位也在毛泽东在1974年全新阐述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中获得了完整表达，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美苏各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由于中国作为海陆之外第三力量的存在，不管中国在如何表达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它都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因为全球的力量博弈格局决定了这一点。这种格局，带着民族主义的眼镜，是不可能打开的，正是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结构，才能够把这种格局撑开。

10.1.3.3 不发军饷的军队

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且战且退，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到了江西永新县，找到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沟，可以暂时摆脱敌人追击休息一下，这就是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主持了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看着都是正确的事。但是深想一层，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把军队变成一支不领军饷的军队，取消了军饷，改为供给制，不发钱只提供基本吃穿，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好处是，军队对资金的依赖减少了。坏处是，很多人都很怀疑这是否行得通，担心会出现军队的哗变和溃散。

那怎么解决呢？首先，党支部建在连上，强化政治领导。第二项，那就是实现军内政治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官不允许打骂士兵。要知道，当时其他军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还有，实行经济民主，虽然没有军饷，伙食也差，但是伙食账公开，士兵参与管理，军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吃空饷、喝兵血、中

饱私囊。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破天荒头一次。从来都是被军官严格、粗暴管理的士兵，一下子有了和军官平起平坐、当家作主的感觉。士兵的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对部队有了很强的责任感。要知道，尊严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

三湾改编之所以在军史上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次改编把传统的旧军队改造成了一种新型军队。旧军队完全靠利益吸引人，靠军饷和暴力来管士兵，但是，三湾改编之后的新型军队激发了官兵内在的精神力量。经过三湾改编，当时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甚至很寒酸的红军，实际上已经和国内其他军队迥然不同，拥有了远超出其装备水平的生存力和战斗力。它突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既定模式，突破了雇佣式旧军队的既定模式。

10.1.3.4 不搞暗杀的“特科”

地下工作的特点是危险性极高。这种环境通常会让情报机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是个例外。共产党从来不用暗杀这样的手段。对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共产党从未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共产党内部对此有着明确的禁令。

1927年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中央特别行动科，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特科”。特科确实搞过暗杀，但此暗杀和彼暗杀，大不相同。特科暗杀的，不是敌方领导人，而是本方的叛变人员，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创办特科时，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一、不许搞绑票一类活动；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人，就不要打；三是不许搞暗杀活动。

周恩来创办特科时的这些严格规定，后来成为共产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绝不能“为达目标不择手段”。

为什么明明有效的方法，却不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是双刃剑，如果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反过来，也会严重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中共当时本来就力量弱小，如果内部再涣散堕落，很快就会被消灭。如果乐于用金钱、美色等手段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本方的情报人员也会习惯于声色犬马的生活，渐渐腐化堕落。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当时可能效果慢，开展难，但持之以恒，却能真正激励人心，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国民党后来经常感叹，很多其内部的高级人员都是共产党的内应。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往往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

这些人位高权重，富且贵，他们投向共产党，肯定不是为了升官捞钱，而是因为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无能难以容忍。但是，如果共产党是江湖帮派式的会党组织、或者是乱杀无辜的恐怖组织、或者内部同样腐败堕落无恶不作，这些人即使离开国民党，也绝不会投向共产党。共产党也就不可能通过他们获取宝贵的情报。

10.1.4 从两场货币战争看国共两党的对决

10.1.4.1 国民党的“法币”

1935年，国民党推动了法币改革，所谓“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简称。法币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法币改革，中国的货币逻辑就此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迁，从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本位货币，历史上第一次转化成了不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而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也就是说政府担保你拿着这些纸，出去就能买东西回来。

人们是否信任这个货币，全在于人们是否相信这个政府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人们觉得政府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货币，它也就成废纸了。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军阀的不对称财政优势，进一步消除了地方势力的自主性。这算是某种意义上中央对地方的货币战争了。

但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法币改革的时机不好，改革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结束后又继续打了四年的内战。这些都让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只能滥发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是连带关系，货币破产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着破产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让中央政府获得一些统治上的好处，但也让它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信用货币对国家能力的要求，远远高过本位货币。

10.1.4.2 共产党的“北海币”

抗战时期，日本只能控制占领地区的城市 and 交通线，下面的乡村什么的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毕竟日军人数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领土，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统治多数瓦解了，而共产党则有办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位于山东半岛的胶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做北海银行，它所发行的货币就被叫做北海币。根据地政权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永远存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发行信用货币，因为人们不会接受的；它只能发行本位货币，可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担保，那要以什么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呢？

北海银行很有创造性，它以农业物资储备作为担保，来发行北海币，只要你拿着北海币，随时就可以用它兑换根据地政权所储备的农业物资，只要这种兑付

承诺是真实的，人们就可以接受这种货币。北海银行进一步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并且依据物价涨跌的情况，安排根据地的工商局吞吐储备物资，来回笼货币或者投放货币，调整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这一系列做法非常成功，北海币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伪币，成为强势货币。根据地的经济官员还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摸索出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打起货币战争来得心应手。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而农村的传统经济受外部世界货币经济影响较小，法币的恶性通胀在这里带来的冲击也小得多；北海币的货币机制与农村的传统经济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据地这种小区域当中运营经济，环境相对简单，物资与货币容易形成匹配关系。但是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并要在全国大区域当中运营经济，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国民党的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了，一方面，没法深入影响农村传统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冲击最严重的地方。这样，国民党既无法主导农村，又丢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终就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10.2 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失败？

10.2.1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

造成国民党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国民党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严重迟滞。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军阀”和派系政客的挑战，当日本侵略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令国民政府焦头烂额之时，它还未解决好新军阀和派系问题。国民政府动员了它所能动员的全部能量、资源和技巧来规避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因此国民党没有多少意愿来应付经济公平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非常根本，却对它来讲似乎并不太紧迫。不仅是民生主义原则，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从未得到实现，就连较为温和的减少地租的承诺也并未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终只是镜花水月而已。当抗日战争爆发，军事就占据了最优先的位置，进一步把长期耽误了的社会改革降低到附属的地位。

尽管有这些难以扭转的环境，但也可以确切地说，国民政府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南京政府以远离内地的沿海地区为根本，依靠海关关税和城市商业税来维持生计，因此对农村问题甚少关注。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

10.2.2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急速的通货膨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这在抗战时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战后则完全失控了。这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滥发纸币，流通纸币从 1937 年 1 月的 13 亿元狂升到 1948 年年底时的 2 兆多亿元，结果是在 1945—1948 年间，物价以每月 30% 的幅度递增。仅在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4 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 4000 多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 13 多万倍。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人民大众不仅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甚至还期盼改朝换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10.2.3 政府威信和民心的丧失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人民苦苦等待了 14 年，盼望国民政府的重返，但却遭遇了残酷的压榨和轻蔑的对待。国民政府官员以征服者的姿态回来，轻蔑地对待沦陷区的民众，好像民众都曾是汉奸和叛徒似的。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最糟糕的是，他们强行以 200:1 的比率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日伪货币兑换成法币，而比较适当的兑换率应该是此比率的一半。民众的存款和现金积蓄就这样突然骤减了，他们的直接反应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为几年前伪政权曾以 2:1 的比率强迫他们将手头的法币兑换成了伪币。这两次兑换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将人民的现金积蓄沦为废纸一般！国民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对国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同时也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

10.2.4 美国对民国政府援助的失败

抗战胜利后，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但它没有选择积极阻止中国内战，最后对国民政府的有限援助也导致了它的溃败。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通过外交对中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机会。第一，如果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 1945 年 8-10 月毛泽东访问重庆期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或许就能说服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临时协议”，从而避免内战的直接爆发。这个大好机会却被毫不在意地放弃了。第二，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如果给国民政府施压要求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战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当 1948 年春国民政府处于大溃败之际，美国还有最后一次实施军事干预的机会，但它也没有选择这样做。

10.2.5 徒有其表的军事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军斗志上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国共较战局的结果。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

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支军队在抗战最后阶段已经显示出了疲倦的迹象，只是靠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盟军即将胜利的憧憬勉力支撑着。日本的投降给了这些部队一种解脱感和一种完成使命的情绪，他们期盼着放马南山。对他们来说，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虽然奉命作战，但士气却很低落，体力也很虚弱。相反，共产党的军队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信心。

国民党的军事战略也是其失败之处。蒋介石本可以集中兵力守卫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却不听美国的建议，将大批部队派往东北，这些军队最后成了瓮中之鳖。攻占延安追击转战陕北的中共领导人战略意义并不重要，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决策，为此消耗了四十万军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指挥不当，再一次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兵员损失。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短时期内，国民政府损失了一百多万部队。政府军队的锐气烧毁殆尽，余下的部队再也无力作战了。

国民党军队人多势众，他们为什么不打游击战呢？按说，他们人数更多，装备更好，组织更健全，如果能到敌后打游击战的话，应该更拿手才是。实际上，国民党也想打游击战。为了训练部队打游击战，1939年蒋介石在湖南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叶剑英率领一批八路军教员前来授课。

游击战的经验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组织，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比如八路军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还要做到军民紧密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敌后民众的力量，等等。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听了之后都叹气，说自己的部队根本做不到。别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也不可能做到和士兵生活一样。至于发动民众，更是不会做，也不愿意做。果然，后来国民党的游击战确实搞不下去。要知道，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特殊之处就在于内部严格的等级和纪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所以，树立军官的权威，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甚至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所以，官兵不平等，这在当时看来，反而是通行的正确做法。

共产党军队讲究“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官兵平等，发挥基层士兵的革命觉悟和积极性，强调发动群众，这反而是不正常的做法。共产党还特别非常重视对基层官兵的教育，参军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扫盲、学知识。行军路上都要看识字板。到了宿营地，往往也要把士兵们组织起来上课。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多文盲士兵就能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比较起来，虽然军官的学历等硬指标不如国民党，但说到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共产党军队反而占优。正是因为这样，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才有了组织上的基础。小股部队，不仅能够骚扰敌人，还能发动群众，同时能够灵活地隐蔽自己。这就要求一线官兵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即使脱离大部队的支持和协作，照样能够完成任务。

10.3 历史是怎样选择的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10.3.1 中间势力的建国方案

在国共两党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及中国革命的前途时，中国社会活跃着支重要力量——中间势力，他们所提出的建国方案，对中国政局的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决定了中间势力的建国方案行不通。最终，他们明大势，顺时势，毅然选择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到执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社会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而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国的问题，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除了国民党的宪政承诺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之外，中间势力提出，“中间派也是中国人，对于国内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国是问题，绝对不是国共双方的问题，而应该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领袖和无党无派领袖，都以人民代表的地位，来共同解决问题”

民盟一大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两个文件，集中体现和阐明了民盟的建国主张“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成为中间势力的共同奋斗目标。中间路线代表人物所代表的党派不同，提出的建国方案也不尽相同，但是，中间势力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还是一致的，都赞同和平和民主，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总之，中间势力认为应该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即“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因此，中间派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的，不赞成独断或独裁”。然而中间势力试图建立的民主制度，“既非国民党的路线，亦非共产党的路线，既非英美的路线，亦非苏联的路线”，而是“在英美资本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寻找一条新的路线”。事实上，中间路线只不过是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在战后的一定时期，中间势力的建国方案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历史的发展最终没有让中间势力的建国方案变为现实。

10.3.2 中间势力的分化和中间道路的破产

中间势力在和平民主建国的旗帜下“集结”起来，试图寻求与国共两党不同的“第三条道路”，总体主张表现出“比较大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之外的差异性亦不容忽视。纲领和主张的差异，反映着中间势力思想认识的不同取向，这是盟友间彼此走向分化的重要原因之。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

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例如，在经济主张方面，青年党主张保障私有财产制度，反对过多的国营和国家干预，而民社党更多地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干预，民盟则同时对民主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存有好感。

中间势力联盟组织的松散，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恶化，再加上内部党派的政治立场存在分歧，中间势力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代表性力量中国民主同盟发生分裂逐渐分化。尽管中间势力一再强调自己的中间立场，但在国共对立的现实政治中，他们必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国民党对民盟采取了分化瓦解策略，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国民党对它的压力。1946年12月民盟主席张澜在民主团体欢迎会上讲道，民盟自成立以来，“虽然努力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然而，向我们利诱的，向我们威胁的，向我们施以迫害，分化，企图摧垮我们的，已经是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是，青年党和民社党退出民盟，选择跟随靠拢国民党，而以民盟为代表的其他党派势力逐步加强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并最终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民盟一直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国民党撕毁重庆政协会议决议，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残酷打击和迫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命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办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在此前后，其他民主党派也相继被迫停止公开活动。民盟的被迫解散，宣告了中间势力试图寻求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的破产。在别无选择之际，中间势力果断做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协商建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抉择。

10.3.3 多党合作与各党派协商建国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的客观依据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多党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国家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主观条件则是多党合作关系的各方拥有合作意愿和能够达成合作共识，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领导是否正确，其次取决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当然，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会议的共有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邀代表 662 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区域和人民解放军，包括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社会团体，以及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等各个方面。这样的代表阵容，展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社会基础的广大，更展现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

这次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 1 日为国庆节；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元纪年；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9 月 29 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共 7 章 60 条，内容分别是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建国理想。《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实现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自由，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的局面，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1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1.1 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何只是一个过渡期？

11.1.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又不能一步到达社会主义，而是必须分“两步走”，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待条件具备时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社会主义因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居于领导地位，并在不断增长和壮大。在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中，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只有资本主义因素在与社会主义因素进行较量，影响着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日趋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长时间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必然随着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和最终取得胜利，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

11.1.2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人数众多，整个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据统计，同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相比，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与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有人对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产生怀疑，甚至根本就不相信中共能把经济管好，说什么“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

恐怕要得零分”。但毛泽东认为，我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在经济上，人们最关心的是人民政府能不能把物价稳定下来。为了对付开国后不久的那次物价飞涨，在陈云主持下，经过周密准备，从全国范围内调集大量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把物价平抑下去，给投机商人以沉重打击。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物价终于稳定下来，结束了中国人多年来在旧中国饱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

农村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时已在约有一亿一千九百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但在约有二亿九千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地区尚未进行。1950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土地改革使我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原来占农村人口7.9%的地主、富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8.6%。广大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社会方面本着“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要求，除旧更新的民主改革全面展开。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废除了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度。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取消包办婚姻，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再嫁，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在严厉取缔妓院、清除鸦片烟毒、打击流氓和黑社会势力等方面，也迅速取得令人拍手称快的效果。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首先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三个多月内，中国就同十一个国家建交，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期间，又有十三个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七个国家，经过谈判，在1950年10月底前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并且在中国境内享有驻军、内河航行、海关管理、自由经营、领事裁判等种种特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领事裁判等特权随之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收回外国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对外侨持有的武器和电台，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和封存。更使人兴奋的是，建立了人民海关，使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人民政府通过大量的工作，使中华大地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的景象。1950年9月30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满怀豪情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11.1.3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过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又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进行了新的思考。

关于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一个“先建设、后改造”的初步设想，即先经过10~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等到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城市和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土改后的农村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要求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三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基于上述中国经济内部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改变了此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把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正式提上了日程。

在反复酝酿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对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首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做了系统阐述，并对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9月2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其中，“一

化”是主体，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两翼”，分别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翼”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11.2 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的？

11.2.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早在 1949 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已做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是，由于 1949 年尚不具备召开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于是便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制定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到 1952 年年底，随着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特别是人民群众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普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通过一部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但是，中共中央在主观上却倾向于推迟召开人大和制定宪法，究其原因，就是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要考虑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中共中央希望，等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再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部正式的社会主义宪法。显然，这比起在各方面尚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就急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部带有过渡性质的宪法，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一想法很快就因斯大林的建议而发生了改变。

从 1953 年下半年起，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全国 21 万多个基层选举单位、3.23 亿多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566.9 万余名。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由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少数民族行政单位，以及军队和华侨单位共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1226 人。其中，中共党员 668 人占 54.48%，党外人士 558 人，占 45.52%，妇女代表 147 人，占 11.99%，少数民族代表 177 人，占 14.44%，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极为广泛的代表性。

与此同时，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也在抓紧进行。1953 年 6 月，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提出后，对宪法起草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即“不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全面地、规范性地确立人民民主的原则，还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原则，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并保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逐步过渡的任务相适应，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制定一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宪法”。据此，从1954年1月起，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随后，宪法草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据统计，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共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了52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几乎涉及宪法草案的每一个条款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据此对宪法草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充分筹备，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后，依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大会选举和决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9月28日，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圆满闭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此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状态，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起来并开始实施。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仅在宪法中得到正式确认，而且走进了亿万人民的政治生活，为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11.2.2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被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而且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底子极其薄弱，技术力量、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一些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项目，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制定1953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简称“一五”计划。

1955年7月，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的“一五”计划，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

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根据这个方针，“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完成 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的 156 项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建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计划，总投资大约 766.4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7 亿多两黄金。

从 1953 年起到 1957 年年底，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五年的艰苦奋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特别是主要工业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据统计，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784 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 1952 年增长 128.6%，平均每年递增 18%。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57 年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5.5% 上升到 45%，轻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则由 1952 年的 64.5% 下降为 55%，开始改变我国工业总产值中以轻工业为主的局面。

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一大批旧中国所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的制造工厂等。这些新兴工业的建立，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一五”计划期间，为了平衡工业地区布局，国家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放在了内地，例如，苏联援助建设的 156 个重点项目（实际施工 150 项）中的 106 个民用工业企业，部署在东北地区 50 个，中部地区 32 个，44 个国防企业，部署在中西部地区 35 个，其中四川和陕西两省就占了 21 个。由于一大批工矿企业建在中西部地区，初步改善了旧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

“一五”计划期间，新中国工业建设所取得的上述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 100 年，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极为难得和少见的。这虽然只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它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2.3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因此，随着“一五”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即开始。这既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任务的迫切需要，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必然要求。

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其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做法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逐步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粮食生产，但当时认为靠小农经济潜力有限，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短期内又难以办到，因此只能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以提高粮食产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作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大重要措施并紧密结合起来，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由此在短时间内急促完成，较原计划大大提前了。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对手工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1—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在方针上，应当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组织形式上应当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应当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应当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到1956年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0.4万多个，社（组）员达到3.9万多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1.7%。除某些边远地区外，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

与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此，毛泽东曾在1953年7月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包括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包括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其中，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阶段，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

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和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 1/4，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则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原工商业者定额利息，一般是年息 5%，期限 7 年，后又延长 3 年，共计 10 年。

1955 年下半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在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加入农业合作社，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形势下，资本家已不可能自由地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除了接受进一步的改造别无出路。到 1956 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2%，分别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提前完成。

11.2.4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 年年底，随着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这说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以此为标志，我国已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些原本早已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因素，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据此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历史经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既定目标。更为难得的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基本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反而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并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这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变革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从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这场社会变革总体上是成功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宣布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是因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定，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属于“一体两翼”的关系，需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但在实践中，属于“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提前完成了，而属于“主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五”计划期间才刚刚起步，距离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对新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对原来的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需要不断加以调整、改革和完善，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面对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恐怕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确立，就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1.3 社会主义为何会从理想变为现实？

11.3.1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直有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产”，属于“历史的误会”。因此，中国应该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补上资本主义的课。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所决定的。首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其次，封建守旧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但竭力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血腥镇压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改良和革命运动。最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打击，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既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又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更不可能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然也就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严酷的历史事实面前，最终连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为之奋斗的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而逐步抛弃了这一不切实际

的幻想，毅然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既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那么中国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早在 1881 年马克思就针对俄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列宁不但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在俄国变成了现实，而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1.3.2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不懈追求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性质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从而公开否定了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开始领导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尽管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所发展，但社会主义因素已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日益巩固；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已经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思想文化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些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无疑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条件，并成为必然趋势。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据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不忘初心，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11.3.3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期待

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不懈追求，但更离不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可、期待和支持。因为正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使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获得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引导下，中国人民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高度认可和热切期待。首先，工人阶级为了尽快摆脱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自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衷心拥护。为此，许多私营企业的职工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尽快将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其次，广大农民通过对总路线的学习，逐渐认识到：“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如果不对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就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后，民族资本家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对社会主义改造心有不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逐渐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乃是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因此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配合乃至支持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包括工人、农民乃至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配合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得以顺利完成，从而使古老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1.3.4 “冷战”格局下国际环境的影响

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由上述中国的各种内部因素所决定的，但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冷战格局下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当时，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及其对待新中国的不同态度，进一步扼杀了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益加剧。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不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也彻底断绝了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此

相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仅在政治上承认和支持新中国，在经济上也给了新中国巨大的援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与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萧条相比，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蒸蒸日上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苏联由此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当时中国最响亮的宣传口号之一，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此外，苏联在主观上也希望新中国尽快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由此可见，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背景下，正是来自苏联的帮助、示范乃至督促，使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而且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由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单一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更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经历一些曲折乃至走过一段弯路。但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已经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12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探索中的曲折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也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过去的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现在的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模式，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2.1 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

12.1.1 探索中的理论认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问题都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针和观点，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

些重要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对我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形势下，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此后，毛泽东又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若干正确的理论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取得的这些重要认识，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宝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特别是中共八大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毛泽东还最早觉察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要求党员干部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和各种消极现象做斗争。为此，他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员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2.1.2 探索中的经济建设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防科技建设，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 1953 年“一五”计划实施到 1976 年的 20 多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从 1952 年到 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 119 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316 元；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也有了飞跃发展，钢产量从 1949 年的 16 万吨，发展到 1976 年的 2046 万吨。

这一时期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主要是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一五”计划开始，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这一时期，我国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 20 多万千米的防洪堤坝和 8.6 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建设，灌溉面积比例由 1952 年的 18.5%，大幅提高到 1978 年的 45.2%，基本保证了 10 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

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现代工业只占 10%左右。到 1949 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也只占 17%左右。而这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技术基础又非常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并且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烙印。旧中国几种重要工业产品的最高年产量，钢只有 92 万吨，煤炭只有 6188 万吨，电只有 60 亿度，棉纱只有 44.5 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当时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特别是 1971 年 9 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进行第二次核还击的能力，这成为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有力的“撒手锏”。

在旧中国的废墟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中国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1.3 探索中的社会文化建设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力推进思想文化、医疗卫生、群众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

这一时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 1949 年前的 20% 左右，迅速增加到 1976 年的 97.1%；成人文盲率由 1949 年的 80%，急剧下降至 1982 年的 22.8%。特别是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 6 倍，初中生人数增长了 55 倍，高中生人数增长了 62 倍。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也比 1949 年增加了好几倍。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的普遍开展，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全国人口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76 年的 7.25‰；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75 年的男性 65.34 岁、女性 67.08 岁。从 1956 年到 1976 年，我国运动员先后有 123 人次打破世界纪录，中国永远地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当时我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 1978 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

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了国际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局面。党和政府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赞誉，也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过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我国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由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1965 年有 49 个，1976 年增加到 111 个，仅 1970 以后新建交的国家就有 62 个。这为后来我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12.2 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哪些失误和曲折？

12.2.1 事与愿违的“大跃进”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进一步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在“快”字当头的思想指导下,在“跃进”口号的引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修改原订的发展计划,制订各自的“跃进”计划,提出了新的高指标。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还提出了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要求,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各地普遍开展“拔白旗”和批判“观潮派”、“算账派”的斗争,“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大跃进”在农业方面的集中表现,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各地竞相放高产“卫星”。1958年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达到3.69万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多斤;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发射”的最大一颗水稻高产“卫星”,竟然宣称亩产高达13万多斤;8月22日,粮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1958—1959年度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预测,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长4000多亿斤,比原定1958年计划3920亿斤增长一倍以上。一时间,报刊上响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口号,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甚至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并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反过来又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的进一步发展。

“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以钢为纲”,不实际地提高钢产量指标。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设想,就是他极其重视钢铁生产的表现。他当时设想:十五年后的中国钢产量可达到4000万吨,而英国可能在3000万吨上下,所以中国超过英国是完全有

可能的。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相当严重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但没有作任何努力来纠正，反而加以支持，正式确定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钢，从而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由于当年前八个月钢的生产只有400万吨，所以北戴河会议提出由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一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口号下，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土高炉，办起炼铁场。

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为了改变祖国落后面貌所迸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使很多人认为只要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中国也许真的可以打破常规，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像邓小平后来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然而，以高指标、浮夸风为特点的农业“大跃进”，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导致事与愿违的局面：全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12.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中共党内、政府内，文化等部门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些论点后来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错误斗争，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中央很大部分权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稍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在全国制造大规模混乱。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

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并与林彪、江青等人展开斗争，却被试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压制和打击。不久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党政机构几乎全被夺权或改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1970年至1971年9月，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粉碎了政变。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全国形势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但被毛泽东否定。中共十大继续中共九大的“左”的错误，并让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全国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全国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作出错误判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12.2.3 曲折和失误造成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主要是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在认识处理主要矛盾问题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这虽然是历史发展的支流，但不容忽视，更不能回避。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

级斗争，二是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在 1957—1966 年的十年间，多种复杂因素导致中国共产党在这两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失误且相互影响，从而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党的指导思想也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及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种是错误的趋向，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些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十年探索中，两种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严重失误和曲折？这里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而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成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此时已不能照搬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时间短，缺乏治国理政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思想理论准备，对客观规律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更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党内的民主制度不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遭到破坏，党内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国家的法制也不健全，某些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未能肃清；三是革命胜利后，党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四是外部不利环境造成的压力，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不准确的判断和过度的反应。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还需在新的探索中继续完成。

12.2.4 正确看待曲折和失误

正确看待党在这一时期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 30 年的探索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

在 90 多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区分主流和支流，全面客观地分析出现曲折和失误的原因。

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中国共产党在这 30 年的探索，尽管经历了失误和曲折，但总体上说，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 年至 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8.2%。就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讲，农民从 1952 年的 62 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125 元，城市居民同期从 148 元增加到 340 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30 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较大进展。例如 1967 年至 1976 年的 10 年间（1966 年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故未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4.9%。对于数字的可靠性，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除动乱最严重的 1967 年、1968 年有大幅下降外，其余各年份的数字均为正增长。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没有被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了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切绝不是“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不发生“左”的错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 30 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从国际环境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原本就存在很大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我国施加了巨大压力。从国内条件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全国范围执政时间不长，对快速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经验。上述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面对各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出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党的探索从 1957 年下半年以后，出现了失误和错误。

第三，对失误及错误的性质、内涵和层次要进行深入分析。从失误和错误的性质看，主要是“左”的错误，也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愿望超

越了现实条件。从失误和错误的内涵看，“左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高速度，急躁冒进，乃至发生像“大跃进”那样不顾客观条件的反科学的浮夸蛮干，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害；二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急于求成、过于求纯，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结果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三是在涉及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使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从失误和错误的层次看，有局部错误也有全局错误。局部范围的错误，如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和 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1964 年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大批判和“四清”运动等。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一是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二是 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第四，面对失误和错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实现了拨乱反正。在这 30 年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正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党员干部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及时总结历史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在这 30 年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出现失误和错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纠正，如庐山会议前期长达九个月的纠“左”努力，1961 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和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九一三”事件后干部政策的落实 1975 年的全面整顿，1976 年粉碎“四人帮”，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的党，是一个能够在挫折中奋起、在前进中不断开辟正确道路的党。中国人民也从党不断纠正错误的努力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一系列实际行动中，从党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错误的真诚态度中，认清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敢于接受人民监督、勇于对人民负责的党，从而一如既往地信任和拥护党。

12.3 正反两方面的探索带给我们哪些经验教训？

12.3.1 探索中的经验与教训

能够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从而正确总结历史教训，防止重犯类似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之后，积极推进拨乱反正，最后在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的经验教训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总结为十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三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五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六是按照民主和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是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八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九是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十是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是对改革开放前一时期历史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升华。这十个方面，从正面讲是经验，是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较成功的地方；从反面讲则是教训，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不够成功，甚至是失误或犯了错误的地方。对丰富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对沉重惨痛的教训，则应当深刻记取。

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经验和教训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前进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还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学习改革开放前一时期的历史，必须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既充分肯定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和错误，而是对其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吸取经验教训。

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应具有的思想品格，也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具备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经历过严重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吸取教训，发扬经验，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开辟并接续发展的

1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开创的？

13.1.1 真理标准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继续按照“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走下去的封闭僵化的老路，一条是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一条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新路。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此时，党内仍有人继续坚持“左”的方针，阻挠对过去的“左”的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鉴于一些批判“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来信总是依据“毛主席语录”评价文章的现象，人民日报社编辑部也感到有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并开始就这个问题组织文章。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当天，新华通讯社将文章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七家报纸转载了该文章。随后，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党报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正所谓“中国上百台印刷机转动，不同的报头之下，出现了同一个标题；校园的阅报栏前挤满年轻的面孔，无数学子闻风而至，阅读同一篇文章；千百人重新铺展稿纸，千百支笔重新抖落尘埃，准备书写同一个主题；被一种沉重的沉默笼罩的中国大地，随着第一声响动，忽然爆发出轰鸣”。

这篇文章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由此，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冲破了压制，在全国广泛展开。

真理越辩越明，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讨论

会达 70 余次，报刊上发表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达 650 多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为人民所接受和肯定。这场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理论准备，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也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为改革开放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制度革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13.1.2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全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12 月 22 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全会实现了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实现了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沿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错误观点。

全会实现了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大历史是非的问题，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3.1.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七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党内和党外有些同志就对社会主义和我们党产生了一些疑惑，对毛泽东的一生功绩和思想的正确性也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所以，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

1980年6月27—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如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共中央认为，对于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历史决议》共分八个部分：一、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二、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四、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六、伟大的历史转折；七、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八、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集中表述了党的指导思想。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历史决议》是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而它本身也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通过这个《历史决议》，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步骤。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想法，甚至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论之中，在继续前进中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步伐。正如《历史决议》最后总结所言：“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

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该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二大于 1982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探索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13.2 为什么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

13.2.1 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

谈起改革开放，大家都不陌生，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改变。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谈到：“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那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这是我们理解它的起点。我们先从字面理解一下，改革是用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以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开放更多的是认知层面的事情，如果没有开放的胸怀，开放的市场，即使改革了也没有用武之地啊。可见，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改革开放是广义层面的改革开放，是战略层面的考量，但我们要谈的是狭义和具体的改革开放，是对战术层面的考量，因为你不理解战术层面的做法，我们也很难理解战略层面的重要性。

什么是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也就是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到底在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直接亮出答案——工业化。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一直在进行着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在完成中国的工业革命，而正是改革开放引爆了中国的工业革命，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

影响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第一个因素必须经历原始工业化阶段，并完成原始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工业化步入正轨之前的那个阶段，通过原始工业化能够逐步从内部改变一个社会的消费偏好、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为引爆工业革命打下一个基础。中国是如何完成原始工业化的，其实我们并不陌

生。我们靠的就是上个世界 80 年代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的乡镇企业。他们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生产的产品繁荣了中国的初级制造业，同时增加了人们的收入。这种从底层生长出来的经济繁荣，遏制了生育需求，人们从积累人口转向了积累消费品等物质财富，就此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原始工业化，每个想要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得经历，没有完成就没法顺利推进本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顺利进行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需要构建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原始工业化，构建了大规模市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奠定了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基础。第二，我们有一个特别给力的市场创者，就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官员。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抵触，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抵触，我们要说，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看得见的手就没有看不见的手的出现。工业化需要的足够的市场规模，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成本及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创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法负担。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

最后一点，工业化要顺利进行，必须要遵循正确的工业化顺序。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们实现了原始工业化，在 90 年代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机器来生产产品，在 21 世纪初正式进入重工业建设阶段，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目前这一阶段进展顺利。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底子上，一开始就搞重工业，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前做的那样，注定不会成功，切换到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爬楼梯，不跳级，才能顺利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能够进展的如此顺利，必须要归功于踏实有序的发展战略，而这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行为。

13.2.2 改革开放的关键招数

改革开放的关键招数，指的是改革开放我们到底具体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主要有两点，我们构建了完善的供应链网络，这是腾飞的能力，我们进行了财税制度的改革，同时遇上了世界订单，这是腾飞的机遇。

我们都知道上世界末发达国家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的外包。那谁才能成为承包方呢。第一，你得有效率，也就是专业化程度很高，这样才能高效完成订单。第二，你得有弹性，需求一直在变，没有弹性，你也接不到订单。有效率，就要专业化一些，专业化意味着没有弹性。这是一组天然的矛盾。怎么克服，用完善的供应链网络。就是有一波上下游紧密联系的企业，各负责一环，相互配合来完成需求各异的订单，需求一旦变化，整个供应链随时调整，有效重组，共同完成新订单。这个能力谁有，中国。那这个能力我们是怎么练就的，靠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整装待

发的工业园区，这为完善供应链的构建提供了保障。城市化为什么快于工业化，这又归功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卖地，换来的资金可以投资工业园区建设。而土地财政政策又是在中央财税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就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央开展的分税制改革。再加上中国加入了 WTO，几个因素叠加，我们顺利承接了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外包订单，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力和机遇的碰撞，这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招数。

13.2.3 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基本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们向发达国家输出制成品，发达国家向我们输出服务业，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消费能力下降。别着急，我们还有这条线，我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制成品，他们向我们输出初级产品。这两个循环构成了中国今天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不过你会发现，今天我们遇到了新的挑战。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在下降，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多大的能力消费。怎么破，我们做了几件事情，首先，我们给发达国家借钱，就是买他们的国债，让你们继续买得起我们的产品，只要有消费，我们这就可以维持生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在向发展中国家借钱、搞投资，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以便他们能够消费更多的中国产品。有同学说我们自己老百姓都不富裕，借钱给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搞投资不划算。我们可以算一笔经济账。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总量世界第二，占全世界的 18%。我们假定中国经济能够按照每年 6% 的速度增长，再过 40 年，中国的 GDP 大约能增长 10 倍。而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 3%，扣除掉中国的贡献，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增速只有 2.34% 左右，这样增长 40 年，只能增长 1.5 倍，那时中国的 GDP 大约占到全世界的 50%。这时候矛盾就出现了，中国以外有全世界 4/5 以上的人口，总的财富仅仅和中国一样多。那时，全世界都没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中国不断制造的产品和不断提供的服务。这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和经济增长，另一个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后者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于是借钱给其它国家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当然中国可以换得一些战略资源，同时让世界其它国家也维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以便它们能维持购买力，并且还得起钱，就是中国不得不做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一带一路”要实现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一带一路”。另外，我们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在搞创新经济，就是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以便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赢在未来。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关键招数，发展前景，即工业化、能力遇上了机遇、世界经贸双循环。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

开放具体做了哪些，以及改革开放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回答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一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处体现的都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实际，总结为一句话：我们是在一个强大的政党和有为的政府的带领下，立足于自己的实际，着眼于世界的形势，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了自己该做和能做的事情，这才造就了中国经济 40 年的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13.3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辩证统一的？

13.3.1 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13.3.1.1 新中国 70 多年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些成功的实践和伟大的成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和主线。

在这一奠基和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既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结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又要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偏离方向。从 1956 年开始，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体现在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中共八大文献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著作，创造性提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形成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发展商品生产等正确的理论认识。但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党却犯了“左”的错误，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来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点，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又坚决抵制各种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在总结历史教训、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在新的探索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必将再次书写新时代的辉煌。

13.3.1.2 新中国 70 多年发展历程的连续性

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奠基和艰辛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并取得辉煌成就，贯穿着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70 多年来，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始终不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坚持不懈，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虽历经曲折，仍能不断走向辉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论及改革开放发展新路由何而来的问题时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发展新路由何而来的谈话，为我们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脉相承的历史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性，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前两句话，强调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开辟出来的。后一句话，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既要继承前人，又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不断超越前人，进行新的探索，实现创新和突破。这段谈话，清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发展性，深刻揭示了这一发展新路同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奠基和探索之间的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又进一步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联系起来，做出了两个“继承与发展”的精辟概括，指出：“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精辟概括，体现出一种深邃宏大的历史观，不仅指明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一脉相承性，也充分说明了新中国整个 70 多年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

13.3.2 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13.3.2.1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中难免要经历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此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到 1956 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起来，这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理论和经验的不足，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和失误。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仅用 3 年时间就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巨大的胜利使全党上下都难以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准备一鼓作气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良好的愿望脱离了基本国情，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虽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因此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后又在发展战略和目标上提出通过“两步走”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构想，但总的来看，还没有形成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认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受国际“冷战”格局及

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的影响，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政治生活与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党的领导人转而从上层建筑领域入手，希望通过“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又在认识和处理社会政治关系问题上，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全局性错误。

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不出现曲折反复的激烈斗争；每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经历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其成长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崭新课题，加之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中难免要经历曲折。

历经曲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善于从曲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减少主观盲目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党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达到成熟并走向胜利的。善于总结和学习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探索中实现新突破的一个重要保证。

13.3.2.2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前进中不断走向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立足于搞好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条件。从 1953 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也得到健全。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成为生产关系领域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其间出现了严重失误和挫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而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一是基本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医疗、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三是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

步事业的目标，努力改善国际环境，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四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若干重要原则，为党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做了理论铺垫。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吸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深刻教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要在发展中实现，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二是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出发，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三是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新判断，抓住历史机遇，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四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写入宪法，确保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实现这些突破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指明了新时期党和人民前进探索的方向。中共十三大科学判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完整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日程，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

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就会一帆风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风险，并在实践基础上接连取得新的重大理论突破，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探索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13.3.3 必然性与能动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中国共产

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但认识上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没有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在 1960 年所指出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正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这一新的探索，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从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广大人民的新要求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四大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政治上的成熟首先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自觉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从而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显示出勃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的历史，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间也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也是坚持不懈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并成功迈入新时代的根本原因。

14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革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14.1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14.1.1 中国梦的提出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及其实现条件，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动员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就从三个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维度明确了中国梦的内涵。从国家层面讲，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民族层面讲，就是要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从

人民层面讲，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就表明了中国梦的主体、实现力量以及所惠及的对象。

中国梦既不是传统中国话语体系中的词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汇，而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国际特色的词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崭新内涵。

中国梦切实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性与参与感。中国梦之所以能够凝聚共识、激励人心、引领未来，是因为它既是国家的富强梦，也是人民的幸福梦。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有个中国梦。这就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象化为每一个个体的成就，中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壮志具象化为每一个个体的自尊，从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效能感。

14.1.2 中国制造 2025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仍大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开始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英国提出了“高价值制造业战略”，日本提出了“产业复兴计划”，法国提出了“新工业法国”，等等。制造业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关键。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也需直面这场竞争，以大国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2014年12月，“中国制造2025”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2015年3月25日，李克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也正是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制造 2025”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作出的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提出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任务、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

14.1.3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大任务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并确立了 180 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全面从严治党的八个基本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4.1.4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我国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一个什么“体”？概括地说，就是“五维一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就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就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就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就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就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与自信，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与期待，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际上有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些舆论的产生，一些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或误读，一些是出于焦虑，一些则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问题。要树立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要让世界了解、理解中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必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让人信服的对外工作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用合作共赢的新思路

代替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你输我赢的旧思路，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更加明确，更加深入人心，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为世界更好地发展奉献了中国智慧，指明了前进方向。

14.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14.2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

14.2.1 中美贸易摩擦

在 2019 年前后发生的贸易摩擦，这一轮贸易摩擦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回归到底层逻辑，贸易摩擦其实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秩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西方世界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之后，所引发的一种反馈。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西方国家在面临社会内部财富分配问题时，采取的一种对外的政治手段。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新一轮创新周期。这次创新经济和以往的工业革命都不同。不同在哪儿呢？美国的创新能力开启了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但是它需要与中国的生产能力相结合，才能规模化生产。换句话说，这一轮创新经济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展开的，而是跨国性的。于是，新一轮创新经济带来了巨额财富，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摧毁了很多传统产业，同时拉动出大量的新产业，主要就是配套这一轮创新经济的新制造业。然而，拉动出的新的制造业并不出现在西方，而是出现在中国，表现为生产流程的大规模外包。中国就在这个过程中踩上了风口，成为世界工厂。而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本土的创新部门虽然获得了井喷式财富，但传统行业却大量衰落，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从宏观的角度观察，我们看到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进入到一种去工业化的节奏，那些最能吸纳就业的产业部门和产业环节逐渐流动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之中。

历史上的发展节奏从未像今天这么快，在过去，产业结构的迭代和新老经济中心的交替可能是四五十年时间当中完成的，老的工业中心有时间来消化掉各种问题。而中国真正的经济崛起是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实现的，太快了，美国根本来不及消化社会问题。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美国因为创新经济而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是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迅速扩大，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衡，引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美国草根阶级的利益在新一轮创新经济中受损，

这一问题又无法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来解决，因为越发展，就越拉动中国的制造业，美国的问题就越严重。于是政治手段就会在美国被提上台面，去对冲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这种政治对冲的做法，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结果，一个就是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另一个就是我们在 2019 年看到的大规模的贸易摩擦。

本来用政治手段是为了对冲经济领域的问题，结果经济危机一爆发，问题更严重了。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越来越不满意，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府采取本国优先的政治立场，排除掉移民的竞争，排除掉外国商品的竞争，保障本国人的福利，等等。于是我们就看到，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政府近年开始出现保守化转向，这就是第二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问题。最近这几年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气质很强的领导人被选上台，都是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的政治反映。而这种政治变化在经济政策上的反映之一，就是“贸易摩擦”。这种政治手段之所以会出现，根源还是在于经济。在今天，世界经济的现实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在非常深的程度上相互嵌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想要用政治手段去人为地制造障碍和割裂，带来的后果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从更宏观的视野去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这件事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现实与世界经济治理秩序之间的错位所导致的。现有的几大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WTO 世界贸易组织、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它们都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前设计出来的。而中国经济在最近这 20 年的高速成长，已经深刻改变了现实中的全球经贸结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和它所要治理的对象之间已经严重不匹配了，这就会引发很多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就比如中国在几大经济组织当中因为发展中国家身份，可以获得很多优待，可是今天中国力量如此强大了，很多国家就不满意了，要求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是中国确实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规模。所以取消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也不合理，但仍然保留这个身份也有些说不过去。究竟应该是什么身份，从而拥有什么样的贸易权利，没人能说清楚。争执的各方都搞不清楚，就会发生贸易摩擦。这也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必须发生某种变革和升级。这种变革和升级究竟要向何处去，现在没人能完全说清楚。

14.2.2 制造业的转移？

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便宜，而是在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同时兼具弹性和效率两大优点的、规模极其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就越深，越有

效率；同时，因为里面的中小企业多，那么它们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整个网络也就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变动能够抗衡的。到了这一步，这个供应链网络就会从全球吸纳那些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而中国在规模这个事儿上独步天下，这就是为什么，但凡是对供应链需求比较高的制造产业，几乎都在往中国这个方向转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看到的所谓“制造业转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数据。如果制造领域的产业真的转移了出去，那么中国就得从东盟来进口这些制成品了。但实际上，中国和东盟贸易的主要内容不是制成品，而是半成品和零部件。这意味着实际上，东盟和中国是在同一个供应网络之内一起来生产。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扩张到了东南亚，这个网络的规模变得更大了。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全球贸易品的结构，就会发现，全球的制造与贸易逻辑都在发生改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贸易里面 70% 都还是制成品贸易；但是到了 2018 年，制成品贸易的比例下降到了 30%，剩下的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这样的中间品贸易。这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贸易，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衬衫换飞机、产品换产品的逻辑，而是中国和美国一起造飞机，或者更可能是，中国、越南、日本、美国等等一堆国家一起造飞机，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多的不再是交换商品，而是共同参与到一系列生产环节之中。这种情况是过去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

所以，所谓中国制造业的转移，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究竟是产业在转移，还是生产环节在转移。经常有人说什么，手机产业转走了，制鞋的产业转走了，我们本能地会以为是整个产业转走了。过去确实是这样，但在今天越来越不是这样了，转走的仅仅只是手机产业当中的某个环节。这种生产环节的转移，本质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供应链网络的扩张。而且能够转出去的，往往都是一些特别低技术的环节，比如最后的组装环节。这是我在越南调研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所谓的“转移”，实际上是一种“溢出”。

14.2.3 打造新的世界工厂

中国在全球经贸双循环中所占据的“枢纽”地位，实际上是由多层产业秩序构成的一种多层级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最底层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在这一层，中国本身就能够大致占据枢纽地位。

中间一层，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在这一层，中国与东南亚一起构成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占据了枢纽地位。中国在其中有比较强的主导

性，这来自于中国供应链体系的规模优势，以及中国的重化工产业优势。

最上一层，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影响力还来自于中国在电子硬件制造领域的优势。

在信息技术产业中，中国的这两条优势都处在从属性的地位。首先，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最核心的动力，技术创新，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创新，优势仍然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其次，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会推动国际规则发生一系列演化，这种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而美国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也有着很强的优势。中国要赢在未来必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尤其是在产业政策有所作为。

首先，重化工业方面，这是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但是自身利润率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这个行业很可能更应该体现出一种公共服务导向。那么，对这个产业的政策就应该是守成性的，如果太过用力发展，反而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

其次，电子技术产业，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依托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但是电子技术产业也已经落入到了平均利润率的阶段，它能够带来正常的经济回报、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但我们很难设想它能够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

接下来就是信息技术产业，它正在高速发展、高速迭代，这会反向拉动电子技术产业的重构，让电子技术产业也高速迭代，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梯次产业间的联动效应。而这种快速迭代的特性，又要求这两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有足够高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唯有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出来的民营企业才能做到有竞争力。

而且，信息技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传统边界的穿透，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的分隔，现在都无法阻隔信息技术的传播。那么，传统的集中式组织技术也就都无法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需求了，与这种技术更相适应的，可能是一种分布式的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技术的演化天然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

所以在电子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这两个产业中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更富于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让民间力量更多地站到台前，给予民间力量更多的生长空间，在现实中生长出具有真实活力的经济组织秩序。

不同梯次的产业有着不同的经济逻辑，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解，需要分层次、分位阶地展开。所以，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政策也应当是要分层次、分位阶制定的，不能一刀切。但是，现在的中国很微妙地处在

一种政策惯性的风险中。中国在过去靠着国家意志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会形成一种政策惯性，让人觉得似乎电子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也都可以仿照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而获得成功。这种想法很显然就忽视了，不同产业秩序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政策需求。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策逻辑，无法匹配信息技术时代的需求，当然，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逻辑，也不能适用于重化工业。中国需要的产业政策，是要建立在对于不同梯次产业秩序的恰当理解之上，它可能应当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加复合性的政策。这样才能打造新的世界工厂。

14.3 新时代青年如何担当大任？

14.3.1 谈爱国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养成高尚品格。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

2014年5月3日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

2013年5月2日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14.3.2 谈使命

2020年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

2015年7月24日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当代中国青年要在感悟时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14.3.3 谈奋斗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项职责中见精神。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

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

2015年7月24日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

14.3.4 谈学习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努力提高人文素养，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广大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

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生的黄金时期在青年。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

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14.3.5 谈创新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要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精神，勇于开拓实践，勇于探索真理。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用。

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2013年11月8日致2013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组委会的贺信：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

民生的重要途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人民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刻苦学习，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在创新创业中展示才华、服务社会。

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

15 为什么说疫情防控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5.1 疫情防控如何检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强大优势，并就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作出了重要部署。

我们在谈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这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就更加能够得到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一次的疫情防控正考验着，实践中也检视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15.1.1 疫情检验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和救治能力

新冠肺炎是一个经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传染病控制的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如何做到需要在三道防线展开工作。

第一道战线主要是在医院，在于临床医生和医院的管理者。这里面有四方面的意识特别重要，第一个意识是传染病的发现意识，每一个临床医生都应当要具备一定的传染病的发现意识。第二个是及时防护的意识，强调一点，医务人员对自身的保护不仅仅是对自身健康的尊重，也是对病人和对人群的负责。第三个是及时隔离的意识，一定要把疑似的传染病人，安排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当中。第四个意识是及时报告的意识，一定要及时报告当地的疾病防控中心，这是传染病防治法当中所规定的。四个意识能够把发现病人的时间尽可能的缩短。

第二道战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体是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和公共卫生医师。这里面当中有两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第 1 个是实验室的病原检测能力，尤其是对于未知病原的检测能力。这方面能力要加强建设，同时要有实验室的网络，这边检测不出来，尽快找到实验室网络当中其他有能力的实验室，在国家的调配和指导下，迅速的把这个病原能够检测出来。第二个能力就是流行病学的调查能力。我们要尽快找到源头，病毒的源头或者病菌的源头，以便尽快的发现潜在的感染者，我们现有的大数据库建设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方

说现在的手机定位系统能够清晰的通过手机定位来展示一个感染者他在过去几天当中的行动轨迹，在这个行动轨迹当中，我们就能够警示公众。

第三道战线是政府，主体是政府的公务员。政府的公务员面对传染病必须得有早期控制的意识，传染病越早被控制越好。当发现几个传染病病人或者说几十个传染病病人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早期控制，全部收治，我们的医疗资源能够承受得起，这种情况下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新冠肺炎，曾经经历过这么一阶段，这个阶段直到什么时候才好呢，我们的专家组到武汉去建设方仓医院，把该收的病人通通都收进来，彻底的把局面扭转。早期控制意识非常重要，越早越好。政府的公务员还应具备统筹全局和统筹决策的能力。

总体讲我们的卫生医疗系统抗住了压力。习总书记在这次新冠疫情的时候，首先讲的是打阻击战，然后再讲打人民战争，要用人民战争，来取得这次疫情的一个胜利。政府负责协调各个部门，协调卫生部门，积极组织治疗，隔离了潜在的感染者。协调医保部门，支持免费医疗，免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样就会使患者尽快到医院去，尽快的获得治疗，这是消灭传染源的最重要方法。政府协调食药监，大力推进药物研发和疫苗的研发。政府协调公安，控制人群的聚集，控制人群的出入。政府协调了财政，无论是医院的救治也好，还是防御物资的调度也好，都需要资金支持，财政要及时拨款。政府协调民政，让老百姓待在家里不出去，这个工作谁来做，是需要我们的基层单位，我们的居委会，我们的村委会，我们基层的干部去动员，去做这项工作。政府协调商务部门，我们的口罩，我们的防护服谁来生产，只有加强防护物资的生产，才能源源不断的支持前方的抗疫。政府协调海关，守好国门。另外，我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有着独特的一些优势，我们有一整套系统严密的网络体系，从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当中，配有4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构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网络，国家有着非常强大的社会动员体系，一方有事八方支援，这体现的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15.1.2 疫情检验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能力

为了遏制疫情，全国经济几近停摆，损失不可估量，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不得不提上日程，面对国外疫情的蔓延，经济社会何去何很是纠结。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产财富效应。就是本来我们对这些资产比如股票，比如房产，比如某一个项目，对它未来的增值水平是有一个预期的，这个预期的财富水平就是这个资产的财富效应。然而疫情突然爆发，那么这个财富效应是短时间之内就会受到严重的折损，到底这个损失费该怎么评估，有多大的规模，在各个行业其实

是不一样的。

供应链的完整性。强调供应链，这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一个部门受损不仅仅影响这一个部门，还有与它上游下游相关的其他一些部门。因为没有哪一个生产部门可以完成全部的生产过程，完成全部的销售服务过程，因此我们考虑损失如何要考虑它的供应链的损失。疫情发生之后，供应链也变得不完整了。

消费的连续性。消费影响生产，需求影响供给，当消费变得不连续的时候，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就断裂了。所以我们看疫情之下的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要联系消费是否连续来看。

看就业的稳定性。人口大国就业的压力首当其冲，所以国家实行的公共政策也叫做就业优先的政策。GDP 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对我们国家就业规模的影响是 150 万到 170 万，平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么根据这么一个情形测算，如果疫情影响经济增长，如果影响一个百分点它就会减少多少就业岗位。因此我们制定公共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到就业优先，那么一定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长，这个是从就业这个规模和就业质量的提升来考虑的。

应对两项国家既定的重大收官任务。全面完成小康这个任务，全面完成脱贫攻坚计划，这两个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在即使发生疫情的情况下，也要坚定不移的加以完成。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短时间之内高度密集出台财税政策，货币支持政策，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放松的行政管制，优化公共服务，落实放管服这个体系。再就是面对多任务，公共政策如何精准有序有效，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如何精准有序有效，这是我们制定并实施公共政策，不仅现在而且为了中长期要考虑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在考虑到种种负面影响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不经意之间出现的新经济。

大健康经济。不是说我们需要用大型的公共卫生事件来培育我们的产业，但一旦这个大型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它客观上会拉动，会催生一些过去没有或过去比较弱的一些产业。比如医用物资设备，当我们感觉医院物资设备严重短缺，构成我们公共卫生防御体系严重短板的时候，大家首先复工复产的就是这一部分，而且国家在一系列的应急配套政策，让它满负荷运转。

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大国人口这么多，如果爆发大规模的公共医疗事件，我们用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来进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新型的职业和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兴健康产业。有了这个强烈的需求，将来会有供给，关键如何克服这个短板，如果寻求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如何多部门联合攻关。

因此我们说，疫情考验了我们社会治理能力，考验了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能力，也考验了我们全民族、全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集体协作能力和配合的能力。

15.1.3 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越性

面对这次信管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听取汇报，召开专题会议，组成领导小组，调配人员财务积极应对。我们看到在这一次防疫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国家治理体系的很多方面，确实发挥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效也得到了呈现，这种强大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使疫情防控工作处惊不乱，有序展开。在疫情这种情况下，正是需要有一个站到更高、更为权威的组织来分析事态，统辖力量，并以此来稳定局势，有秩序、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治理体系当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是何等的重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不渝的坚持群众路线。在所有的工作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也唯有打牢这样的根基，才能真正体现人民至上的宗旨，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防控疫情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既定，再通过广泛的发动群众，通过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治和协同，才得以使防控工作顺利展开。

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尽管武汉的防治资源全面吃紧，各地的防控压力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就发挥出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中央各个部委各司其职，从各个方面调整政策调配资源，全国各省市也都纷纷行动，奔赴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支援当地的防治工作，后来又经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协调，采取了对口支援的办法，使湖北防治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医药物资得到了必要的保障。

总而言之，在这一次的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的疫情和疫情防控也检视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些不足和缺憾。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实际上可以使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它能够在今后的各个方面得到更好的完善和发展。

15.2 加强党的领导为什么是打赢战“疫”的政治保证？

15.2.1 战“疫”当中的党的领导

面对此次疫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进行了整体动员，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作用。正月初一那一天，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再动员再研究再部署，提出要开展一场阻击战，建立联防联控的一系列的机制。同时，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各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所有的党员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在岗位上。在最艰难的岗位上，在最关键的时候党员干部先上，党员先上，发挥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员就是这样子的一群逆行者。在这样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的作用中，在关键的岗位，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有人顶着，使得这场阻击战得到很好的推进，很好的落实。除了党组织和党员之外，党中央还要求各群团组织，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身的工作的职能，有效的去联系相应的对象，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围绕着疫情防控来展开工作。比如说妇联组织围绕着基层的防控工作，围绕着家庭防线的构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紧急动员，发挥了妇联“联”的工作，以及群众工作的一个优势。共青团也如此，这次相当多的90后青年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到了一定的时候，又提出要进行复工复产，做好全年工作的安排和有效的衔接。因此，疫情防控作为一场阻击战，它既是一个人民战争，也是一场总体战。在这里面，我们党发挥了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体领导的功能，同时也发挥了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传统优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党在领导人民不管是在日常性的工作过程中，还是在紧急应急性条件之下，都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

15.2.2 加强党的领导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这是其他国家是学不来的。有人说了，不就是个政党吗，有什么学不来的，你还别说，还真学不来，因为党和党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政党体制，一种叫竞争型政党体制，一种叫非竞争型政党体制。美国、英国、德国等的政党是竞争型的政党体制，非竞争型的政党体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像共产党这样稳定执政、没有轮换的政党。竞争型的政党关注的是部分，非竞争型的政党关注的是整体。

比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工党最早是围绕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组建的，推崇经济上的平等；保守党的早期成员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推崇自由市场。从选举上看，两党也有各自的优势选区，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国家内部的不同部分间的竞争。这种政党体制，是符合“党”字本来的意思的。

不过，20世纪，出现了非竞争型的政党体制，比如前苏联共产党。在这类政党体制中，通常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和上面说的政党不同，它是内嵌在国家整体中的领导者，和整体不可分割。如果它不再执政了，国家的国体也就变了。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就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工党、保守党通过选举轮流掌握国家权力，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选民群体。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全国人民，是国家整体持续的领导者。换言之，虽然同样有一个“党”字，但这个“党”字在工党、保守党那里，和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是完全两回事，但我们平时经常以为它们是一样的。

当然，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同样可以存在多个合法政党，而且是以部分身份存在的政党。我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就属此例。但在这样的体制中，像九三学社、致公党、民主同盟这样的参政党，它们的正式称呼不是“民主政党”而是“民主党派”，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间也不是竞争，而是相互协商、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关系。所以即便在突出“整体性”的政党体制中，依然可以有以部分身份存在的党，但这种部分和竞争型体制中的部分，毕竟还是两回事。

竞争型政党，它们必须争，不争就没得玩了，因为它们天生就代表特定的群体。不争，就得听其他群体摆布，所以要在争吵中达成妥协，哪怕选举失败别人上台了，自己也不至于吃太大的亏，实在不行，还可以在选举中下次赢回来。有了这个竞争的机制，任何一个党派都要尽可能争取选民的支持，选不上的要选上，选上了的怕下台，制度完备的党争，是能够增强政治的活力的。

但是，宪法政治不必然需要党争，你若是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就有大一统传统的国家，党争就意味着分裂，所以他不可能存在多个党轮流执政的。首先，从历史上来看，竞争型政党的出现也才 200 多年，那以前的历史呢，西方以封建制为主，中国以帝制为主，它都不是竞争型的。再从原理上看，也不一定。一党执政的体制当然不需要党争，因为执政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就不是“部分”人群，而是整体人民。宪法设立党派竞争是为了防止权力垄断，保护公民权利，但不这么做，使用非竞争的政党体制，也可以做到防止权力垄断，保护公民权利。

怎么做到呢？要满足两个前提。第一，尊重宪法；第二，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能力。第一点和竞争型政党是共通的，第二点就有自己的特色了。既然执政党不参与竞争，那要避免国家的权力不出问题，就必须剔除机体内与国家人民不合的杂质，防止自己从“整体”变质成“部分”。换句话说，它需要的不是党争的规矩，而是治病的规矩。看上去很普通，但我国近些年政治动作的背后逻辑，其实就是这两点。像“依宪执政”、“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样的政治话语，以及最近一次修宪，在国家机构中增设国家监察委，都是这两点的反映。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加强党的领导是打赢战“疫”的政治保证。

15.3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如何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5.3.1 战“疫”中的依法防控

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总书记相继在 2 月 5 号、2 月 14 号、2 月 23 号，在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以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三次重要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用法治去应对这次疫情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去应对这一次疫情，或者说要公共卫生事件。

从防控目的来讲，就是要提升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的保护水平，这也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目的和价值的共识。所以回到这个防空目的来讲，应该说是和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高度契合。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疫情爆发以来，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来看可以体现出法治国家的法治的实践能力，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考验。

新冠疫情的防控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治理。这种治理和应对的水平，有的时候往往比常态条件下的治理更能够彰显一个国家制度在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

所以回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构的逻辑来讲，回到我们讲的考验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这个角度，我们必须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法来应对这次突发事件，越是在突发事件的时候越要看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这一次疫情应该说是对国家法治的一次考验，也是法治在中国社会成长的一次契机。作为一次考验，毫无疑问是检验我们国家既有的国家自己的体系，积极的应对能力和应对的这个水平。作为一次法治在当代中国社会成长的契机，我们可以真实的通过这一次公共卫生引发的问题，去检验国家，政府、社会在法治问题上有没有共识和有没有实践能力的问题。

15.3.2 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

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很简单，因为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标配。在我国这样一个非竞争型政党领导制度之下，依法治国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让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在现代国家还没有出现时前，全世界国家基本都是一种形态，就是王朝国家，我们国家有 2000 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王朝国家的特征也很简单，每个国家，不管叫皇帝还是女王，都有个君主。王朝国家曾经很强大，但是在这二百年里，

基本就绝迹了。因为它有根本性的两个大问题没解决。

第一个，是君主的能力问题。君主能力强，国家就能正常运转，要是君主平庸昏聩，国家就会出问题。国家需要强悍的君主，可是王朝只按照血统继承权力，爹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国运好不好，有特别大的随机因素。这是第一个死结。

第二个，是没法动员民众。因为国家是君主一个人的家，其他人都是给他打工，那民间的老百姓，当然对国家没什么感觉。鸦片战争的时候，百姓看着英国人把清军的炮台炸飞，不但不难过，还觉得很过瘾，在旁边起哄“再来一个”。你不能怪他们没有主人翁意识，在整个王朝国家的时代，民众对国家没有感觉，国家也不敢动员民众，因为一旦把民众动员起来，管理和保障做不好，民众就会成为活火山。秦始皇动员民众筑长城、修宫殿，隋炀帝动员民众挖大运河、出征高丽，最后都超越了动员临界点，激起了大规模反抗。平时还相安无事，一旦遇到国家级危机，不动员是等死，动员是找死。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这种拧巴的关系，是第二个死结。

到了近代，依靠宪法，王朝国家的天花板被捅破了。当政治摆脱了血统和世袭制以后，国家最重要的核心权力的行使和传承，就可以任人唯贤，即使核心权力的运转出了问题，也可以随时调整。在整个国家层面，因为政府更加开放，群众基础也扩大了，权力行使更加规范，整个社会运行也更加有条理。从上到下，没有人觉得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和我自己没有关系，也就避免了王朝国家和民众互相疏远，又容易决裂的状况。

自从宪法造就了现代国家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地走上了这条赛道，世界从此具有了统一的方向。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无论过去怎么样，现在都被纳入相同的时间系统来衡量。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还说我这个国家没有宪法，不采用法治，就和自称野蛮人差不多。所以我们说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15.3.3 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

那你要说了，不就是依法治国吗，所有国家不都是一样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何不同呢。我要说的是，还真不同，此法非彼法。首先，我们得知道，依法治国，依的是哪个法，对宪法，也就是说依法治国，首先得依宪治国，但我国的宪法和西方的宪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听说我国的依宪执政不是西方的宪政。讲的就是我们宪法和西方的宪法的不同之处，这体现的也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之处。

那么，我国的宪法和西方的宪法到底不同在了哪里呢，一句话，我国的宪法既是母法，也是公法。我们解释一下，说它是母法，所对应的是子法，说它

是公法，对应的是私法。

母法，是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宪法还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来源和标准。刑法、商法、合同法、婚姻法，甚至还有水污染、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现行法律 200 多部，还包括几千条司法解释，一条也不能违背宪法。出现冲突怎么办？先参照宪法。所以说，宪法既是公法，也是母法，这反映了宪法的两种属性。

公法和私法，说的是法律的范围。公法与公共权力有关，比如宪法和行政法，而私法呢，调整私人利益，比如民法和商法。

15.3.3.1 西方国家：公法背后的弱政府-强社会

刚刚说了，公法与公共权力有关，更深入地说，公法就是管官的法；政府怎么组织，议会怎么召开，领导人怎么选举，都由公法来管。而老百姓之间做买卖遵循什么规则，一个小伙子在路上把老人撞飞了该怎么赔，离婚时孩子跟他爹还是跟他妈，这些事呢，就由私法来管。

可是，当官的能愿意被公法管住吗？对不起，在这件事上，当官的还真的没有办法。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中世纪，西方是封建制社会。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区分得特别严格；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贵族身份也是要往下继承的。这样的社会让一小部分人享有特权，而让绝大部分人非常压抑。到了近代，西方人觉醒了，起来推翻这种秩序，把个人的平等自由当作首要原则，再也不允许政治特权了。这就导致在价值观念上，西方人在立法的时候，把国家和政府放在第二位，当作手段，把个人和社会放在第一位，当作目的。手段要为目的服务，国家和政府是为了个人和社会服务的。

所以，当西方人用“公法”这个概念来描述宪法时，是把宪法当成约束政府和国家的工具。在这背后，有一种“弱政府-强社会”的价值追求存在。比如，我们时不时会听说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国会不拨款，这个机构那个机构又关门了。联邦政府关门，人们照常干自己的活，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当，好像联邦政府可有可无似的。这是由于美国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刚刚说的“强社会”，政府偶尔关门几天，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关系。这是西方学者说宪法是“公法”的现实根基。

15.3.3.2 中国：母法背后的强政府

西方人不会用“母法”这个概念。类似“宪法是根本法”这种说法，在西方也很少见。把宪法称作母法，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法学界，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种表达。宪法是母法，意味着法律是一个由宪法和许多普通法律一起构成的一个等级体系，其他法律必须依据宪法制定，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子法。

我们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时，也会把黄河叫做“母亲河”。我们也常把祖国比作母亲。那么，当宪法被看作母法时，就相应地有两层意思。第一，宪法是地位崇高的；谁要反对宪法，谁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第二，宪法是其它一切法律的根源。民法、商法、刑法什么的，都从属于宪法，继承了宪法的血脉和精神。

“母法”这个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非常清晰的画面。宪法就像一只老母鸡，那些具体领域的法律，就是老母鸡羽翼下面众多的小鸡，宪法率领和保护着它们。在这个慈祥、温暖的画面背后，蕴含的是宪法的最高权威和统帅作用。而更深刻的寓意，则是一种国家主导社会、政府支配个人的法权模式。和公法的“弱政府—强社会”不同，母法观念里，包含了一种“强政府”的诉求。

宪法是公法这个理念，起源于西方，到了中国，就又生长出母法这一层含义。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文化因素以外，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的历史。回顾整个近代史，宪法是传入的，不是自发生长的。而伴随着宪法观念一起传入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固然也用宪法来改造国家，可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人要追求的国家，和西方人的国家不同。对于近现代中国人来说，好的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要能抵御外国侵略、捍卫民族生存权。要建立这样的国家，就一定要求有强大的政府。如果说西方的立宪主题是保障自由，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立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革命者和政治家在这点上非常清醒。他们都知道西方宪法非常好，但也知道，西方宪法一旦完全搬到中国来，没办法对症下药。那么，既要学习先进理念，又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这种诉求下，用哪个字来概括宪法的定位呢？我们的前辈们就选择了“母”这个字，宪法是母法这个概念，也就渐渐流传开了。

公法概念的诉求，是弱政府、有限政府；而母法概念的诉求，是强政府、有效政府。这是宪法在两种处境中的不同呈现。当一个西方政治家呼吁人们捍卫宪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要保障自由，限制国家权力。而当一个中国政治家呼吁人们捍卫宪法时，他的意思是说，要严肃国家法纪、巩固中央权威，反对一切自行其是的举动。西方的宪法政治，和中国的依宪治国，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15.3.3.3 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机制

基于中西方的区别，西方搞三权分立，防止公权力滥用，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因为我们最担心的不是权力滥用，而是权力消失后国家的四分五裂，但同时，我们也要搞权力制衡。

在西方有人认为权力制衡，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体

制。只要让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互相制衡，国家和政府就能永葆活力。这肯定是不对的。权力制衡不等同于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是宪法的目标，而三权分立，只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并且还只是手段之一。

其实最开始，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只是英国的一种地方知识。这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英国相对于整个欧洲大陆，位置很特殊。英吉利海峡是天险，外敌入侵难如登天。所以，英国基本不需要太操心国家安全，也就不需要依赖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府。一直以来，英国这套权力制衡的体制就这样默默运行着，他们也从来没觉得这套体制有什么先进之处。因为这套体制，不是靠顶层设计，而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一方面，它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它又没有任何理论模型，难免非常杂乱。三权分立的理念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它的前景，在当时也不乐观。为什么？因为这种知识和理念实在是太“英国”。其他国家用了之后，最后水土不服，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在文化上和英国没有隔膜，又是从零开始，他们把三权分立的理念运用到建国的过程中，不但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建国以后国力还发展得飞快，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美国这一成功，当然也就没人质疑权力制衡的理论了。美国实施得非常彻底，三个权力不仅各自分立，而且是真正的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有时候严格到会让人难以理解。当然，同样因为美国的国力强大，让三权分立成了一个神话，成了一种万能药。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很多人忘记了，到这个时候权力制衡依然没有摆脱“地方知识”的范畴，它对应的只是美国的现实，也只是在美国取得了成功。

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照搬外国的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在民国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例子，并且还发生过不止一次。结果怎么样？失败的分权制衡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几乎把中央政府搞散架了。

辛亥革命以后，制定了民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它规定，总理可以在权力上制约总统，总理不签字，好多政策法规是不能发布的。这样总理和总统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和冯国璋成了两个巨头。段祺瑞为了压制冯国璋，就宣布恢复旧约法，自己当总理，让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的初衷，是用没有实权、受到制衡的黎元洪，来压制有实力的冯国璋；可是，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又笼络了一大批人，段祺瑞本来要利用黎元洪，反而被黎元洪利用了。最后僵持不下，引来了张勋复辟，民国的政局，又一次破裂了。

为什么权力制衡在英国和美国玩得很好，到了中国，就玩砸了呢？因为权力制衡的基本意思，是说要把国家权力分成不同的体系，相互之间形成制约，

从而避免国家在某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闷着头走到底。但是，确实也有潜在的风险，会引发严重的派系斗争。

其实，分权制衡只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方面。在“分”的同时，也还有“合”。什么是“合”呢？大体上，它包含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博弈各方起码得认同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要不然就是鸡同鸭讲，各争各的，分权就变成分裂。二是规则意识。博弈各方得尊重规则，不能搞那些逾越规则的行动，比如暗杀、暴动、引来外国势力干预等等，应该有愿赌服输的精神，一旦输了就要认账。

那也就是说，权力制衡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它的具体机制，而是它包含的内在价值。把国家权力划分成不同的部分，让它们相互制衡，这只是手段；而目的在于让国家权力受到正当的约束，不使它被误用、滥用。说白了，权力制衡最终要实现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在权力制衡这个话题上，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东西。关于如何做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正在进行时，我们拭目以待。